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深化改革：目前中等收入主流群体形成的关键 田雪原 (005)

反全球化的逆流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陈宗胜 康健 (018)

制造业回归：拯救香港经济的唯一出路

——关于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的建议 李罗力 (042)

• 国际经济 •

必须高度警惕的几种致命陷阱 黄志凌 (049)

特朗普经济政策实施的概率及其成效分析 谷源洋 (06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战：理论分析与中国应对策略

柯建飞 于立新 (071)

推动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建议 张影强 (085)

• 名人观察 •

房地产两极分化与“城镇化”战略再思考 樊 纲 (096)

• 宏观经济 •

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展望 李 娣 (098)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智库信息 •

中国创新城市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京沪建设国家创新城市专家研讨会综述

王日玥 徐晨阳 方子娴（111）

肩负起智库专家学者的责任使命

——简评徐洪才新作《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

王晓红（117）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9）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6）



CONTENTS

Deepening the reform: the key to the formation of middle – income mainstream groups
Tian Xueyuan (005)

The counter tide of anti –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en Zongsheng and Kang Jian (018)

The return to manufacturing: the only way to save Hongkong’ s economy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 border economic corridor
of emerging industries of Hong Kong and Shenzhen
Li Luoli (042)

Several fatal traps must be highly vigilant
Huang Zhiling (049)

An analysis on the prob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rump’ s econom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Gu Yuanyang (061)

Trade wa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hina’ s countermeasures
Ke Jianfei and Yu Lixin (071)

A proposal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cyberspace governance system
Zhang Yingqiang (085)

Polarization of real estate and rethinking of “urbanization” strategy
Fang Gang (096)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Li Di (098)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Wang Riyue , Xu Chenyang , and Fang Zixian (111)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hink tanks
Wang Xiaohong (117)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深化改革： 目前中等收入主流群体形成的关键^{*}

田雪原

摘要：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8102 美元，步入中高收入阶段中期，是中等收入主流群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前最重要的是全面深化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推进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农民工融入城市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基础的形成，要突破传统发展方式，实现从需求侧向供给侧改革为重点转移。农业流动人口流入城镇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年来城乡收入扩大的势头有所收缩，但是差距依然较大，基尼系数仍处在偏高状态，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关键词：深化改革 中等收入主流群体 人口城市化 收入分配制度

作者简介：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社科研究专家咨询委员。

在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个收入演进阶段中，中等收入主流群体主要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过渡，尤其在中高收入阶段形成。201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 744127 亿元，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 6.6423:1.0 计算，折合 112029 亿美元，为人均 8102 美元，步入中高收入阶段中期，也是中等收入主流群体形成的关键时期。^①那么，如何推进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的形成并发挥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

^{*} 本文为“改革开放 40 年”专题约稿。

^①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2017 年 3 月 1 日以下简称《统计公报 2016》）。

流砥柱作用？笔者以为，尽管中等收入主流群体形成的条件和原因颇多，但从中国实际出发，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全面深化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农民工融入城市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一、经济基础：深化转方式调结构改革

考察已经实现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的国家，大都早已完成向内涵发展方式的过渡，包括瑞典、挪威、芬兰在内的北欧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中等收入群体即占到总体人口 60% 以上，成为左右社会运转的主流人口群体。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既没有特别贫穷的社会群体，也没有特别富有的社会群体，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成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中坚，起到“稳定剂”的作用。社会经济基础呈现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过渡到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经济发展转变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基本特征。这是中等收入主流群体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二战后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个大趋势。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迎来全球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发生了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包括新材料、新能源、宇航、海洋、生物工程等新技术革命。当前，这一新技术革命推进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包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微电子技术等取得新的飞跃，知识爆炸、技术爆炸、人力资本积聚增强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推动社会经济达到一个新高度。在这一发展竞争中，一方面，发达国家多数完成由传统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中等收入阶层形成主流人口群体。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出现分化：一部分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形成追赶之势；另一部分由于内外多种原因，或者仍停留在低收入水平，或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举步维艰，中产阶层始终难以成为主流人口群体。因此，要造就中等收入主流群体，就要在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经济基础上下功夫，努力完成传统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变，建立起相应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每个产业内部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这是普遍的发展规律，中国也应这样做。

从中国实际出发，当前加速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基础的形成，坚持深化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改革是关键。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开放历经 38 年，GDP 以平均高出 9.0% 的速度持续增长，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也付出了资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发展方式滞后、产业结构失衡、边际投资效益下降、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造成产能过剩等代价，使发展变得不可持续。与此同时，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到 74.5% 峰值，越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呈下降趋势，宣告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这就意味着，以海量投资、海量资源消耗和海量劳动力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已经走到尽头，回归到中高速—中速增长新常态是必然的合乎客观规律的

发展。近年来，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2012—2016 年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率比较如图 1 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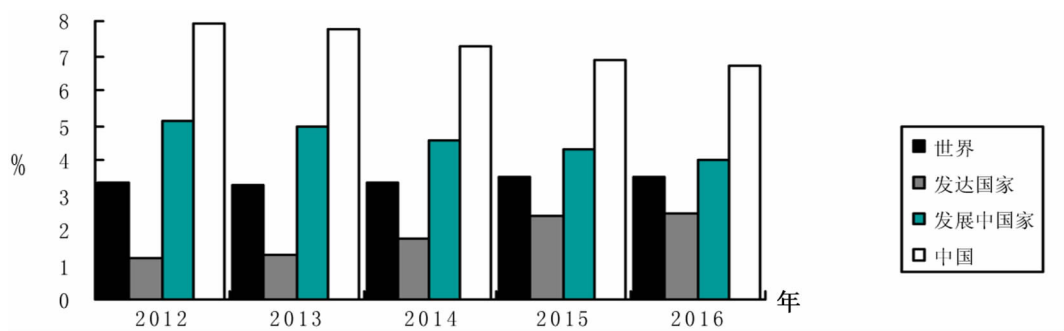


图 1 2012—2016 年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率

毋需多加赘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与国际社会新常态比较，既有相近的表象，也有本质的不同。重要的一点在于，要认识新常态在失去以往高速度增长同时，也走到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时间节点，迎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发展的窗口期。如同司机开车进入弯道要踩一踩刹车，要想转方式、调结构改革顺利进行，就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转入中高速—中速增长新常态。这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需的。以往转、调之所以收效不大，总是悬挂在高速增长上下不来，一下来便赶紧启动追加投资把速度提上去，已经成为应对经济下行驾轻就熟的一项“法宝”。其实，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在平均利润率作用下长期亏损企业理所当然地要被淘汰，产能过剩当随之化解。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尽然，僵尸企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处理，产能过剩很难从本原上铲除。原因何在？不是市场经济规律出了问题，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问题，市场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到位。譬如，水泥、钢铁等过剩产能在城市化住房建设运行中，奏出生产—交换—消费“体外循环·三步曲”，就是典型一例。第一步，政府以公用名义出面征购土地，付给农民土地出让金。第二步，政府在拍卖市场上出让土地，开发商中标得到土地并给付政府土地出让金，进行开发建设。第三步，开发商建房并出卖商品房，购房者付给房地产商购房金，并缴纳房屋购置税。如此，农民获得土地出让金，占小头；政府获得土地拍卖金、房屋购置税，占大头；开发商获得房屋出让金，占次大头。开发商还可因此而获得抵押贷款权，进入下一轮投标、建房、出售新的循环，把“次大头”做大。如此，我们看到“农民—政府—开发商—购房者”四方各得其所，一套完整的循环。如果购房者

^①资料来源：国际部分引自 IMF 数据，参见《全球化》2015 年第 2 期、第 5 期。中国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 2017 年 3 月 1 日。

出于本身住房需要，那么这是正常状态下的体内循环；如果购房者不是出于自身需要，而是为了投资、投机，将购房变成倒房、炒房，就变为脱离实际需要，消耗水泥、钢铁等过剩产能的“体外循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外循环”在房价不断飚升中愈演愈烈，致使房地产泡沫持续增大，独立于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基础之外运行。究其原因，同政府速度偏好、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高休戚相关。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失去决定性作用、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

在当前形势下，转方式、调结构重点落实到供给侧改革上。因此，铸造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经济基础，就要突破传统发展方式需求侧改革局限，实现从需求侧向供给侧改革为重点转移。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外贸出口“三驾马车”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多年，也曾对此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边际投资效益下降、消费疲软和出口受阻新形势下难以为继，改革的重点、策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调整到供给侧上来。改革重点由需求侧调整到供给侧，是经济发展由以外生变量为主向以内生变量为主的转变，是新常态下做出的理性选择。所谓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在人口和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发展等内生变量方面进行改革，以激发经济内在发展的活力、潜力和动力，开辟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发展道路。具体说，供给侧四大要素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是：

其一，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改革。贯彻“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完成第二步向以提升人口素质和调整人口结构为重点的转变，推进后人口转变向全方位适度人口过渡。包括启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大力提升人口体能健康素质、智能科教素质和文明素质，调整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城乡人口等人口结构的改革，为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的形成提供适宜的人口数量、素质和结构。

其二，土地制度改革。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同供给侧人口和劳动力改革同步，土地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当前，要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加速农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改革。一方面要保住 18 亿亩耕地不被侵占，守住“米袋子”供给这条“红线”；另一方面要盘活土地资产，在节约土地尤其在节约耕地前提下，为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发展需要的土地供给。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扩展中等收入群体。

其三，资本要素改革。资本要素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改革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降息改革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进一步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通过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权限、加快补齐发展短板、适当加大投资力度、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改革等，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其四，创新发展改革。新常态经济发展不是不要需求，而是需求有了某种质的变化。中国大妈到国外买电饭煲、马桶盖，女士买高档化妆品、整容，送子女到欧美上名牌大学、读研究生等，就是最好的证明；或者这些产品在国内买不到，或者虽能买到而质量不济，以至于将消费需求转移到国外。供给侧改革就要有针对性地去过剩产能、补短板、提质增效。要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健康发展，为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不断增强的内生动力。

二、城乡结构：深化人口城市化改革

城市化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依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1975—2015 年世界城市化率由 37.9% 提升至 53.7%，年平均提升 0.4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由 26.8% 提升至 48.6%，年平均提升 0.55 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由 69.6% 提升至 80.0%，年平均提升 0.23 个百分点。中国由 17.34% 提升至 56.0%，年平均提升 0.97 个百分点，高出世界 0.57、发展中国家 0.42 个、发达国家 0.74 个百分点。2016 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 57.35%，由原来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上升到高于世界 1.3、发展中国家 8.1 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差距大为缩小，由 1980 年相差 52.0 个百分点，缩小到 2015 年 24.0 个百分点（参见图 2）。^①

图 2 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驶入快车道，取得显著成绩，博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有专家认为可同 21 世纪美国高科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主要指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造成农村凋敝，没有像拉美一些国家那样落入城市化陷阱。但也要看到，经过 38 年的快速推进，特别在城市化率超过 50% 达到 S 曲线中部挺起阶段以后，许多问题积累起来、暴露出来。不仅对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收入构成和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的形成。

其一，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大市小”矛盾突出。按照城市化 S 曲线三阶段理论，1949—1978 年城市化率年平均提升 0.3 个百分点，走出一条徘徊曲折轨迹。改革开放伊始，1978—1987 年年平均提升 0.6 个百分点，1987 年城市化率达到 25.32%，标志着第一

^①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1 Revision Data Tables and Highlights*, 2002, P6;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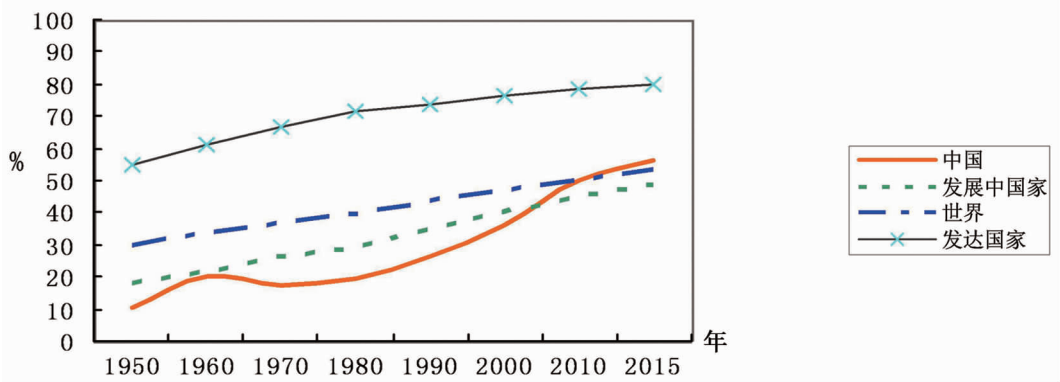


图 2 1950—2015 年中国与世界城市化率变动比较

阶段的终结和第二阶段的开启。2015 年达到 56.0%，其间城市化率年平均提升 1.1 个百分点，呈加速增长态势，致使“城大市小”矛盾突出出来。城市化是什么？从人口学角度阐释，是人口城乡结构变动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阐释，是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一种趋势；从劳动就业角度阐释，是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改变；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是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空间结构上的推演。由于迄今为止中国城市化主要依靠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推进，成为水泥、钢铁等过剩产能的主要消耗者，一不留神造出不少空城、鬼城，失去应有的产业支撑，“城大市小”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

其二，土地城市化超前，人口城市化滞后。以 1990—2012 年为例，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12856 平方公里增加到 45566 平方公里，增长 2.5 倍，年平均增长 5.9%。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 11608 平方公里增加到 45751 平方公里，增长 2.9 倍，年平均增长 6.4%。^① 同期城市人口由 30159 万增加到 71182 万，增长 1.36 倍，年平均增长 4.0%。^② 相比之下，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不仅比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低 1.9 个百分点，更比城市用地面积增长低 2.4 个百分点。形成土地城市化超前，人口城市化滞后的局面。这是政府土地财政重要的收入来源，构成独立运转的体系，相当一部分演变为独立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之外的“体外循环”。

其三，城市规模盲目扩张，城市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速度过快、方式粗放和土地超前愈演愈烈，必然导致城镇规模盲目扩张，从而妨碍着功能的正常发挥，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城市化“摊大饼”式向周边蔓延、向高空伸展，在平面扩张同时，掀起一股“垂直城市化热”。而自来水、下水道、煤气、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医院、学校、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版，第 421 页。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版，第 95 页。

托儿所、幼儿园、老年公寓等配套设施不能随着跟进，终使一些城市变为彰显政绩的形象工程，失去作为区域经济中心、辐射、引导的功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其四，城市化资源瓶颈收紧，环境质量堪忧。以追求速度、规模为主要目标的城市化，往往重速度、轻效益，重规模、轻成本，重投入、轻产出，致使习惯性高投入、高消耗外延粗放式扩张成为一种新常态。本来已很稀缺的土地、淡水、能源、木材、矿产等自然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噪声等的污染加剧，已逼近上限临界值。

上述城市化发展的诸多弊病，特别是发展方式粗放、城大市小、土地城市化超前形成“体外循环”等，直接造成人口城市化相对滞后局面。这里列举的城市化率数据，均按城镇常住人口（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人口）口径计算，其中包含着大量农村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2016 年城市化率只有 41.2%，比按常住人口计算低 16.15 个百分点，相当于 2.23 亿人。^① 与国际城市化水平比较，比世界总体水平低 12.5 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 38.8 个百分点，甚至比发展中国家还低 7.4 个百分点。目前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 2.92 亿，流动人口为 2.45 亿，其中绝大部分为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按户籍计算的城市化率并不科学，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率也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问题在于我国特殊的二元城乡人口结构，城镇人口中有 2.23 亿农业人口，占 31.3%，无疑偏高许多。实践证明，2 亿以上农业流动人口流入城镇是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他们在城市建设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主力军角色，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改革的方向不是驱逐农民出城，而是使他们融入城市，变进城农民为市民。目前，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在一些行业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就学等方面，仍然受到程度不等的限制和歧视，有失社会公平、公正。而就营造中等收入主流群体而论，2.23 亿人不是一个小数目，放到世界国家人口排位席上，可排在中、印、美、印尼之后，名列“第五人口大国”。这部分人口以及依附于他们居住在农村的大量留守人口长期不能跨进中等收入群体门槛，即半数左右人口群体被拒之中等收入群体门外，中等收入人口何以能够成为主流群体？！因此必须进行改革，进行变进城农民为市民的改革。方向和重点是：

一要给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地位和权利。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所受限制有所减少，但是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还是设置着一道道门槛。如一些招工限于本市户口，将农民工拒之门外；买房尤其是经济适用房要职工单位出具证明，农民

^①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2017 年 3 月 1 日。

工被排斥在外；青少年入学限于本街道常住人口，农民工子女被剥夺进入城市国民教育体制的权利等。然而居住、劳动就业、上学等是人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进城务工农民不能享有这些权利，很容易被边缘化。

二要给农民工更多的居住和就业的机会。居住和劳动就业是农民工进城最基本的两大诉求，也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拉美城市化陷阱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农民进城后，由于收入低或者长期失业，租用不起城市一般的住宅，只好强占山头或公共用地，用废旧砖瓦搭建起简易住房，形成缺少安全用水、缺少公共卫生设施、缺少必要的通讯设备封闭或半封闭式的贫民区，成为犯罪率高甚至成为黑社会窝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要防止拉美式贫民窟现象发生，就要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即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两种机制，帮助农民工解决居住问题。居住同就业密切相关，就业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为居住问题的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解决不好就很难保证住有所居。当前尤为突出的是，由于一般农民工文化教育素质较低，没有受过专门的技术训练，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城市在出现有活无人干“民工荒”的同时，也出现农民工无活可干的尴尬局面。因此必须把农民工就业放在重要位置，通过职业培训等方式，尽力为农民工就业多创造一些机会。

三要为农民工来去自由开辟绿色通道。拉美贫民区形成和扩大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是农民进城后彻底失去了土地，断了他们的归路。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的急剧扩张，已经造成为数不少的失地农民，成了必需依靠城市为生的准城市市民。有鉴于此，城市化建设要尽量少占用农业耕地，要为进了城的农民保留一段时间的责任田，一旦他们在城里无法生存下去，还可以返回故乡重操农耕旧业，保持一定期间内的来去自由。城市化征用土地，对失地农民必须做出妥善安排。一要给予合理的补偿，不能采取不等价交换剥夺农民；二要安排好失地农民的就业，要签订劳动就业合同，确保失地农民在城里有较稳定的劳动就业岗位和较稳定的收入。

四要把农民工生产生活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政府在制定规划时，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照顾到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需要，使他们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成为合格的市民。当然，变进城农民为市民应有一定的条件，如果没有任何条件，进入城市便有房子、有工作、有社会保障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暂时做到也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这个条件，主要是进城农民要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半年）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相对固定的住房和没有刑事犯罪。满足这三个条件，即可取得市民资格和待遇，确定为该城市的居民。超过限定时间又不具备上述三项条件者，就要进行收容和清理整顿，请他们回到流出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如果让长期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和扰乱社会秩序

者盲目流入城市，继续留在城市而又无所事事，这些人就容易聚集起来，发展成为类似拉美贫民窟式的棚户区，切断城乡协同发展的纽带。如果长期流入城市的农民找不到适当的劳动岗位和比较固定的住所，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要对这样的流民进行必要处置的。这样做不仅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使不能留在城市的进城农民及时回到农村务农，保证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的供给。这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是负责任的表现，引导和帮助他们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就业，也是提高他们收入水平和打造中等收入群体的需要。

五要加强转移农民流出地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推进城市发展同时，兼顾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当前，要特别注重解决农村“386199 部队”（妇女、儿童、老年）留守人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参与等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土地确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革和发展规模经营，开辟新农村富裕之路，促进一部分人率先进入中等收入主流群体。

三、缩小差距：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考察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过程，大多经历收入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一段历史。目前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将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形成以高端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结构。一般性的劳动就业机会减少了，因而失业率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收入下降了。同时，高端制造、金融服务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增强了，相关劳动者的工资率提高了，与一般劳动者工资率差距拉大了，贫富悬殊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怎样呢？由于地理条件、自然禀赋等自然资本、工业化程度等产出资本、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相差很大，因而承接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的成本差别也很大，造成发展的不对称、不均衡，形成落差很大的发展高地和发展沼泽地，相应的工资率高地和工资率沼泽地。国内外对于中国收入高地与收入沼泽地认识和评价有较大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人口五等级分组（各占 20%）计算出的人均收入结构，见表 1。

表 1 表明，2000 与 2013 年比较，城乡居民收入变动呈现较低收入户占比下降、较高收入户显著上升、中等收入户呈徘徊并且略有下降的局面。就变动趋势而论，尚属正常；就结构变动来说，则有差距扩大的倾向。

其一，较低收入户占比下降。2000 年城镇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收入户合计占比为 24.0%，农村为 18.4%。2013 年城镇下降到 20.9%，下降 3.1 个百分点；农村下降到 16.6%，下降 1.8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城镇比农村下降更多一些。

表 1 按收入 5 等级分组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构成 单位:%

	年份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城镇	2000	9.7	14.3	18.2	23.1	34.8
	2006	7.4	12.7	16.4	22.7	41.1
	2013	8.0	12.9	17.1	22.6	39.2
农村	2000	6.6	11.8	16.4	22.7	42.6
	2006	6.1	11.4	16.2	22.0	43.5
	2013	5.3	11.3	16.3	23.4	43.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4》第 161~167 页数据计算而得。

其二，较高收入户占比显著上升。2000 年城镇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合计占比为 57.9%，农村为 65.3%。2013 年城镇上升到 61.8%，上升 3.9 个百分点；农村上升到 67.1%，上升 1.8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城镇比农村上升更快一些。

其三，中等收入户占比徘徊并略有下降。2000 与 2013 年比较，城镇中等收入户占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农村下降 0.1 个百分点。虽然城乡下降幅度有一定差别，但均在略有下降、变动不大之列（参见图 3、图 4）。

比较图 3、图 4 发现，原本当居民收入提升到中高收入阶段以后，理应向着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过渡，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户占比缩小，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变动；高收入户占比上升突出，2013 年城乡均达到 40%左右，却有悖橄榄型变动趋势，使收入结构变得头重脚轻：收入越高，占比越高；收入越低，占比越低。结果，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差距拉开，使向橄榄型结构过渡受阻。在城镇，2000 年低收入户平均收入为 3132.0 元，高收入户为 11299.0 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 3.6 倍；2013 年低收入户平均收入增加到 11433.7 元，高收入户增加到 56389.5 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 4.9 倍，差距扩大 17.9%。在农村，2000 年低收入户平均收入为 802.0 元，高收入户为 5190.0 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 6.5 倍；2013 年低收入户平均收入为 2583.2 元，高收入户为 21272.7 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 8.2 倍，差距扩大 26.2%。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城乡收入扩大的势头有所收敛，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依然处在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水平。

对于中国的基尼系数变动，国内外有不同的声音。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 2012 年《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中，报出 2010 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61。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中，报出 2012 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 0.73，顶端 1%的家庭占有全国 1/3 以上的财产。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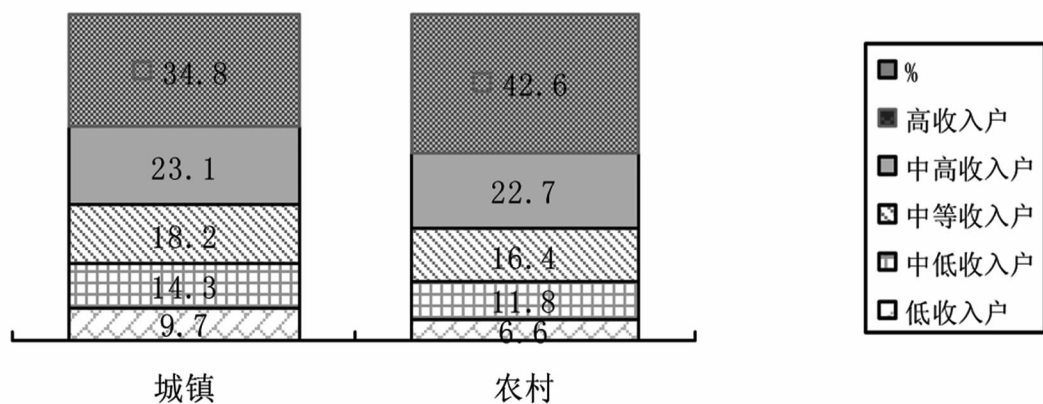


图3 2000年城乡按五等级家庭户收入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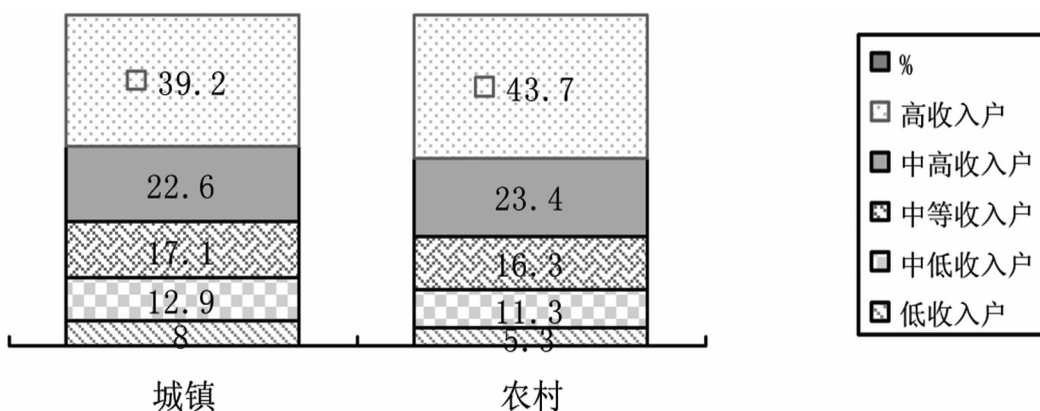


图4 2013年城乡按五等级家庭户收入结构

国密歇根大学在一项研究报告中称，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国家之列，2010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55。^①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相对合理、0.4~0.5为差距较大、0.5~0.6为差距很大、0.6以上为差距悬殊。上面几家给出的数据，表明中国处在差距很大上下。笔者也曾做过一点儿考证，发现一些媒体引用的数据经不起推敲，或者相关抽样调查设计不规范，或者调查的样本量不够、不具代表性，或者以点盖面、用局部数据代替总体。来自统计部门的数据质量要好一些，较少存在这类问题。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变动的情况是：1981年0.288，1985年0.2656，1990年0.343，1995年0.445，2000年0.412，2005年0.485，2008年0.491（峰值）；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2014年0.469。如此，以2008年峰值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基尼系

①资料来源：《争辩基尼系数，中产阶层兴致最高》，《环球时报》2014年1月21日。

数呈不断攀升之势；在此之后则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① 超出一条抛物线轨迹。不过从总体上观察，基尼系数仍处在偏高状态，必须改革。

一要进行提高全体居民收入、适当向劳动倾斜的改革。目前我国城乡收入总体水平还不够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根本的性质，也是造就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经济基础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工资率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相对经济增长来说增长还不够快，应当保持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工资增长率。衡量工资率高低，最重要的参照是劳动生产率，工资率的提升要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科学的做法是，既要纠正工资率和收入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不利于打造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偏向；也要防止工资率和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引发通货膨胀、最终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的扩大。当前的主要倾向，还是工资率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建立与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工资增长制度，促进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的形成。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过刘易斯拐点出现下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增值和工资率上涨窗口期已经打开，一次分配适当向劳动倾斜政策出台正逢其时。

二要推进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改革。上面关于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做了较多分析，解决的根本之策，在于二次分配时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力度，逐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仅要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还要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求助等方面，出台相关倾斜的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求助本身，即带有向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弱势群体倾斜性质。现实中倾斜政策不够，除了制度之外还同掌管和执行制度的人相关。要提高他们一碗水端平、秉公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使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政策落到实处。

三是加大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的改革。北欧诸国之所以很少有特别贫穷和特别富有阶层，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对个人收入实行累进税率较高的征收政策。收入越高、征收税率越高、征收税额越多，有效地缩小了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从税制上促进和保障中等收入主流群体的形成和壮大。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吸收了包括北欧等国的做法和经验，已经建立起累进的税率制度。但是笔者认为，累进税率的档次划分和拉开的距离不够大，因而起到的作用有限，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加上一些有背景的大款、大腕、富豪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避税，可谓暴富有方，致使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中国亿万富翁人数上升到全球之最。这与低

^①王志平：《基尼系数公布：值得欢迎》，《文汇报》2013 年 1 月 21 日；中国历年基尼系数统计（1981—2014）最新版，百度文库。

收入阶层形成巨大反差，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塑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枷锁，实行过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实效，提升并改变了居民的收入和构成，促进了消费和经济的成长。如今 30 多年过去了，收入分配不公、高收入与低收入差距过大、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缓慢等问题突出出来，共同富裕急需提上议事日程。形象的说法是：改革开放前 30 年，主要是把蛋糕做大；后 30 年在继续做大的同时，更强调切好和分好蛋糕。除了实施向劳动、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分配政策外，还应在税收上实施力度足够大的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的制度改革。以及慈善事业减、免征税，实行某种奖励政策的改革。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2. 《习近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 年 5 月 2 日。
3.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4. 欧阳松、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5. 田雪原：《在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14 日。
6. 田雪原：《大国之路——21 世纪中国人口与发展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7.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8.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New York, 2009.

责任编辑：沈家文

反全球化的逆流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陈宗胜 康 健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一直低迷的经济形势下，一些发达国家结构失衡严重及阶层利益分化加剧，催生了当前的反全球化逆流。全球化面临严重的挑战，不确定性加剧。但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长期趋势不会逆转。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技术、资本、劳动、制度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流动、整合形成互动，共同形成驱动全球化的动力源泉，必将推动全球化向不断深化的方向前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军者，在新形势下应当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基本战略举措包括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等等，同时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反全球化 新兴经济体 “一带一路” 对外开放战略

作者简介：陈宗胜，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康 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16 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堪称多事之秋。其中，英国“脱欧”公投成功，以及特朗普以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立场当选美国总统等震动全球的“黑天鹅”事件，标志着新时期反全球化逆流的迅速抬头。然而，本文分析表明，从全球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近期虽有反全球化逆流出现，但全球化不断深化的长期趋势不可能逆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①

英美两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开启并领导经济全球化浪潮，同时也受益于经济

^①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2017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

全球化而先后成为霸权国家。然而，作为历史上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英美两国却成为新一轮反全球化逆流的策源地，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显著特征。以往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现象更多是一种社会思潮或底层民众运动，而本次反全球化浪潮的特点在于：经由广泛的政治参与及合法程序的表达，最终完成了对主流政治的构建，进而直接影响国家最高政治决策和基本国策制定。因此，本轮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烈度将远甚于以往，甚至有可能裹挟其他政治议题，进一步向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极端思潮转变，恶化国际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同时，不应简单地将英国“脱欧”事件和特朗普上台视为孤立事件，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触发一连串连锁反应，诱发其他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比如德国、意大利大选），并造成“脱欧”扩大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一系列反全球化现象，政治动荡不安或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因此可以说，经济社会全球化已进入更加深化与反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在当前严峻形势下，认真而严肃地解析、研判世界经济全局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特点与未来发展趋势，无疑对中国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一、反全球化逆流与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一）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引导了反全球化浪潮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终结了全球经济长达 20 多年的“大稳健时代”（Great Moderation），并开启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期，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依旧缓慢。世界银行预计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和全球贸易增长率分别为 2.3% 和 2.5%，两项指标都创下金融危机后的新低。与贸易增长疲软相一致的是国际投资增长的停滞，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预计 2017 年国际投资较 2016 年下降 10%~15%，与 2016 年剔除发达国家巨型跨国企业并购重组后的投资水平基本持平。从全球债务结构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债务总额已居于历史最高位，且有可能导致经济不振阻碍去杠杆化进程，债务高企又将加剧经济减速的恶性循环（Gaspar et al., 2016）。从金融稳定性方面看，美元进入加息周期，欧盟、日本仍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可能引发资本回流美国和主要国际货币竞相贬值，导致资产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有所加大。以上迹象均表明，全球经济整体仍处于金融危机以来的调整阶段。

从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看，发达经济体增长动能有限，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长期潜力依然可期，但短期面临调整（见表 1）。美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得益于金融危机以来果断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页岩气革命、新兴产业的带动，美

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但世界银行预测其 2016 年经济增速放缓至 1.6%，与 2015 年 2.6% 的增长率相比下降幅度惊人。而且，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和特朗普正式执政，又将增加世界经济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欧盟区经济复苏态势缓慢，且风险加剧。欧元区货币政策一体化和各经济体主权独立、财政政策独立的制度性矛盾，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难民危机的冲击以及英国“脱欧”事件对欧盟经贸形势和信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着新一轮的“脱欧”危机风险加剧，未来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探的可能性加大。日本经济在既有的低迷轨道上持续疲软。安倍经济学短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定的提振效果，但“新三支箭”经济政策短期内无法抵消人口老龄少子化等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未来几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仍将持续走低。

表 1 2014—2019 年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及预测值 单位：%

年份	发达经济体	美国	欧盟	日本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巴西
2014	1.9	2.4	1.2	0.3	4.3	7.3	7.2	0.7	0.5
2015	2.1	2.6	2.0	1.2	3.5	6.9	7.6	-3.7	-3.8
2016	1.6	1.6	1.6	1.0	3.4	6.7	7.0	-0.6	-3.4
2017	1.8	2.2	1.5	0.9	4.2	6.5	7.6	1.5	0.5
2018	1.8	2.1	1.4	0.8	4.6	6.3	7.8	1.7	1.8
2019	1.7	1.9	1.4	0.4	4.7	6.3	7.8	1.8	2.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17 年 1 月 10 日。
注：2016 年数据为估计值，2017—2019 年数据为预测值。

2008 年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同时也步入经济调整期。中国通过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在内的各项结构性改革，近年来仍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保持中高速增长，未来经济走向有赖于经济增长动力能否顺利实现结构性转换。印度通过全面市场改革释放了经济增长潜力，2015 年经济增速首次超越中国。受其激进货币改革措施影响，2016 年增长率略微下调至 7.0%。未来经济潜力能否兑现，同样取决于能否推进稳健有效的改革。金砖国家中作为资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巴西，由于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陷入经济衰退，在 2016 年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带动下，俄罗斯经济减速收窄至 -0.6%，但巴西经济由于政治动荡仍深陷泥潭。随着美俄关系解冻，巴西走出政治风波，未来几年两国经济将缓慢复苏。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仍没有走出漫长的再平衡调整期。2015 年以来，新兴经济

体面临较大的短期调整压力，但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改革派仍表现出了足够的韧劲和活力，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发达经济体整体上延续了金融危机以来低迷的经济形势，未来前景也不容乐观。两相对比，更加凸显了发达经济体当前难以纾解的困境。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期和产业转型期内，持续低迷的现状和仍不明朗的前景激发了部分发达国家内部对于全球化的质疑，成为引导反全球化现象兴起的外部因素，带来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回潮。

（二）反全球化逆流的回潮有一定社会基础

本轮反全球化逆流的回潮，本质上是社会经济议题在政治维度上的表达，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阶层利益分化的不断加深。阶层利益严重分化的格局奠定了反全球化逆流回潮的社会基础，成为反全球化现象兴起的内部根源。英国“脱欧”公投成功与特朗普逆袭当选，涉及议题和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暴露的深层次问题却具有内在一致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阶层分化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引起经济议题在政治上意识形态化，并在客观上阻滞经济全球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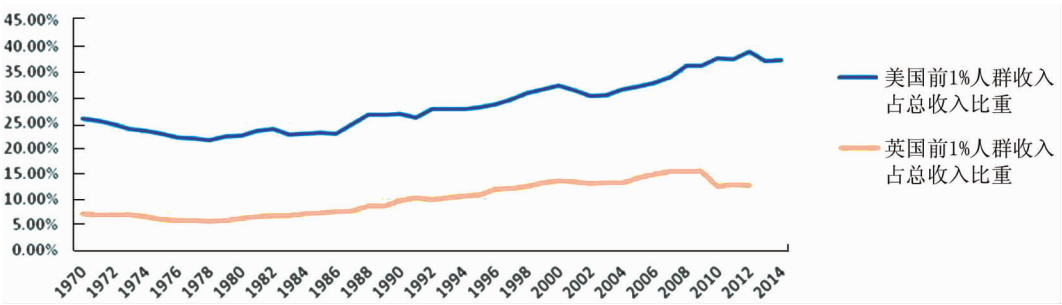


图 1 1970—2014 年英美两国最富裕 1% 人群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财富及收入数据库（WID）。

数据显示（见图 1），截至 2014 年美国最富裕 1% 阶层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达 37.24%，且过去几十年一直呈扩大趋势。与美国相比，英国最富裕 1% 阶层的收入比重并不高，但进入 21 世纪后已经比 20 世纪 70 年代增长了一倍，增长幅度远超美国。以上现象表明，虽然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绩效的增长，但英美两国内部各群体并没有均等分享全球化的红利，高收入阶层占有了全球化更多的机会和收益。产业资本全球化的收益主要为高知识、高技能群体获得，不能适应全球化分工要求的发达国家劳动力被工资水平更低的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挤出市场，而跨境人口流动的冲击进一步加重了失业现象。与经济利益分化相伴生的是价值观冲突的加剧，拥有资本、高知识技能的精英阶层获取了经济全球化的大部分红利，并成为自诩具有更开放、更先进普世价值观的世界公民；而广

大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遭遇相对剥夺，成为秉持保守主义理念的“沉默的大多数”。金融资本全球化催生了金融利益集团，金融利益集团通过金融创新制造金融泡沫获得了远超产业资本的超高收益率，却并未相应承担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最终诱发全球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前，得益于全球化红利，发达国家尚可维持高福利社会制度和金融创新带来的高消费水平，深重的社会分化不至于过分激化而被掩盖。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及经济长期不振的拖累下，发达国家内部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社会阶层分裂和族群对立问题浮出水面。日趋严重的内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激发了英美两国民众藉由民主普选制度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以及对精英政治、技术官僚的不信任和迫切想要改变现状的主观愿望，进而促成了政治上向保守主义、孤立主义转向，造成的客观结果则是新一轮反全球化浪潮的抬头。

（三）全球化进程面临的不确定性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面临严重不确定性，而这一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以中国古代智慧来描述便为“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三个方面：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动能仍在酝酿，新时期地缘政治争端和文明冲突加剧，特朗普在其任期内政策的不确定性。

产业革命开启和结构性改革完成尚需时日，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动能仍在酝酿。从历史长周期来看，世界经济处于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的下行阶段，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尚在发轫时期（贾根良，2016），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仍然蓄势待发。当下大量炙手可热的新概念、新技术不断涌现，然而真正重大的技术突破和产业革命仍在襁褓之中。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还在长期探索和攻关；3D 打印、虚拟现实（VR）、基因测序等新技术尚处于技术萌芽期和产业化探索阶段；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等相对成熟的新技术有待商业模式创新和新市场形成。技术演进自有其客观规律和生命周期，与产业、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也漫长、复杂且具有不确定（黄阳华，2016），技术进步在混沌中孕育机遇，量变引起质变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或许就在前方不远处。从中期看，在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之下，着眼于恢复和构筑经济长期增长动能的结构性改革陆续被各国纳入政策体系，并成为二十国集团（G20）2016 年增长框架下最为核心的议题。^① 各国致力于推行鼓励创新、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但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效果显现也有待时日。因此，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动能仍在酝酿，未来增长前景挑战与机遇并存，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不确定性。

^① 杨盼盼：《G20 结构性改革的进展与评述》，《国际贸易评论》2016 年第 5 期。

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来离不开地缘利益格局的重构与演变（金碚，2016）。“二战”结束以来，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一直在多方博弈中主导着地缘利益格局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引领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框架的“二战”后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以“大稳健时代”为标志的“冷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了美中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开启了新一轮地缘战略调整，即在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策略和在西亚、北非实行“离岸制衡”及“背后领导”（王鸣鸣，2014）。全球再平衡的战略部署造成了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生态复杂化，局部退出引发的中东地区权力真空为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的蔓延提供了空间，并经由难民潮涌入欧洲，在发达国家内部制造了更为直接酷烈的文明冲突。特朗普上台后的亲俄态度、强硬的对华立场以及全球战略收缩的政治主张，将引发美中欧俄四大政治集团新一轮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和地缘利益格局调整。历史经验表明，新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必将加剧地缘政治争端和文明冲突。由此造成的政治动荡、社会分裂为反全球化情绪的孳生提供了温床，将加重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执政政策及其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特朗普政治立场的根本特征是实用主义，摒弃“政治正确”，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的主张都是其基于“美国优先”理念和实用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未经从政经历锤炼、不按常理出牌的作风，使其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激进且充满不确定性。就经济政策而言，特朗普在竞选阶段所秉持的减税、扩大基础建设、贸易保护三大重点政策能否实现，又如何落地，仍然有待观察。但是，特朗普上任伊始随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或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任命以激进对华立场闻名的经济学者 Peter Navarro 执掌国家贸易委员会，甚至主张对墨西哥和中国的进口产品分别征收 35% 和 45% 关税的极端政策，都表明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倾向。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已经深度依赖且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完全的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政策既无可行性也不符合其根本利益。而且囿于特朗普的非建制派背景，虽然共和党同时拿下了白宫和参众两院，其过分激进的政策主张仍可能在美国政治体制掣肘之下施展空间有限，而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也会制约其振兴制造业的政策效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必将利用国际政治议题和在国际经贸谈判中的左右逢源，力图实现其基于“美国优先”理念的单边主义利益诉求。虽然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度和难度将因国际博弈的加剧而上升，但摩擦加剧不会升级为全面对抗。特朗普秉持实用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样为新时期的国际合作创造了新空间，这未尝不是寻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契机。新时期全球化面临政治和贸易摩擦加剧的挑战，同时也蕴含新秩序建立的机遇，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

（四）反全球化的浪潮可能带来全球化的深化

反全球化的浪潮虽然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剧，但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趋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将在曲折中前进。反全球化现象并非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其内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每当全球经济进入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必会大规模显现。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反全球化现象，并厘清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以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首先，反全球化所针对的部分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往往被反全球化的观点张冠李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G20 峰会上指出的，当前全球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已达到 0.7，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 0.6 的危险红线。不处理好财富分配差距问题，不仅世界经济将会陷入长期衰退困境，而且可能会引起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倒退。反全球化的观点正是将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部归咎于全球化的结果，这当然是不客观的，因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正如 Acemoglu（2002）指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就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和经济推动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皮凯蒂（2014）基于资本主义 300 年历史进程的研究表明，财富不平等的根本动因在于资本收益率长期超过经济增长率。经济全球化同样也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推动的结果，因此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政策并没有指向引发问题的真正根源，不是改变失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有效途径。解决失业问题的长远之道在于建立更广泛、更高效的教育体系，促进人力资本更有效地积累和优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贫富差距的改善则有赖于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分配机制（然而，特朗普经济政策主张中几乎没有涉及收入调整和再分配政策）。因此，新时期下全球化的深化离不开各国对内推进国内治理和经济改革，对外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群体，将是下一阶段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其次，反全球化浪潮中也可能针对一些全球化过程真正存在的问题，比如全球化中出现的异化、僵化因素。特朗普宣示的大量经济政策主张能否实行并成功尚不得而知，但其包含的贸易保护、振兴基础设施的政策指向，恰恰显示美国应当延续奥巴马开始的“再工业化”战略，以振兴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从而包含要优化其失衡的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的合理成分，不啻为美国版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新总统的反全球化政策主张只是表象，其实质并不是从根本上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对全球化的再定位、再修正，以消化全球化推进节奏过快带来的副作用。而引发英国“脱欧”与欧洲新一轮“脱欧”危机的直接原因，除了阶层利益分化这一反全球化的深层次原因外，主要在于对欧盟僵化的经济政治治理体系的反抗。欧盟体制缺

乏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健全政治框架和坚实社会根基，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社会经济结构异质性高，因此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欧债危机”后，欧盟机构对成员国政治决策和经济政策干预空前加剧，加重了与成员国民主政治的冲突，更加凸显其低下治理能力引发的功能合法性危机（金玲，2016）。在此背景下，英国“脱欧”的诉求在于摆脱共同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排斥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冲击，跳出欧盟框架寻求更高的贸易自由度。因此，英国反全球化的现象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因为过早让渡经济主权导致的路径偏差的纠正。美英两国对全球化异化、僵化因素的改革诉求，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经济体利益分化加大，平等参与、充分协商的制度建设重要性愈发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创新以适应当下的新变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泉正在形成，必将引导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从历史发展的长距离看，反全球化很可能是短期现象。纵观世界经济近现代发展史的几次反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可以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1929—1933 年的大萧条、1973 年的石油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等，都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现象的高涨（杨励、韩倩倩，2012），但每一次反全球化的逆流消退之后，都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浪潮。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每一阶段的危机和反全球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纠正了前一阶段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和缺陷；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危机期间都孕育或催生了新的动力源泉，成为推进下一阶段全球化深化与前进的关键因素。大萧条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奠定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美元的支配地位（刘鹤，2013）。美国替代英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也成为 20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大推动者。石油危机催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大稳健时代”的基石，开启了生产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的序幕。亚洲金融危机加速了以日本为首的东亚“雁阵模式”的式微，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亚洲经济重心迅速由日本向中国转移，掀起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高潮。历史经验表明，历次危机后反全球化现象的消退都是因为各种因素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而在反全球化逆流回潮的当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是经济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泉。

进入 21 世纪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深度融入并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不断重塑世界经济版图，新兴经济体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并且是驱动经济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泉。以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之间的对比为例，可以明显看到 21 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实力上此消彼长的变化脉络。在经济总量上，

2001 年 G7 占全球 GDP 比重高达 65.7%，2015 年已经降至 46.25%；而 2015 年中国在全球 GDP 比重大幅跃升至 14.9%，引领了金砖国家的崛起，其他金砖国家在 15 年间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总量占比提升（见图 2）。在增量贡献上，2001—2006 年 G7 比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2007 年成为分水岭，尤其是 2009 年中国成为抵抗全球经济负增长的中流砥柱，此后金砖国家增量贡献基本高于 G7，这一趋势也与中美两国比较的趋势相吻合（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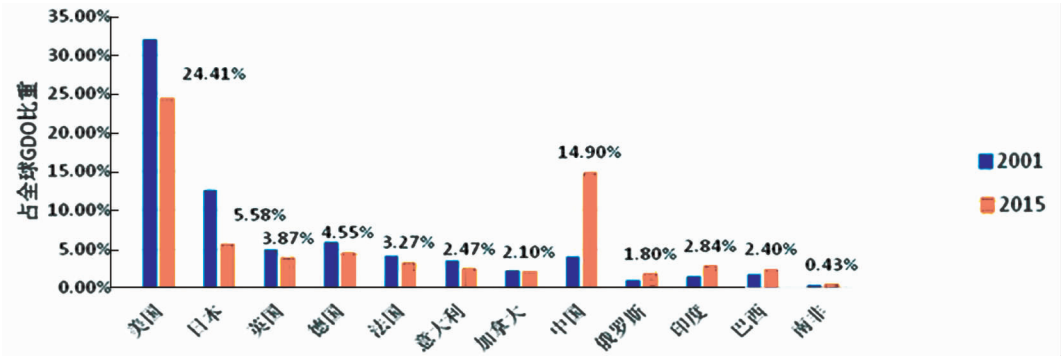


图 2 2001—2015 年 G7 国家和金砖国家 GDP 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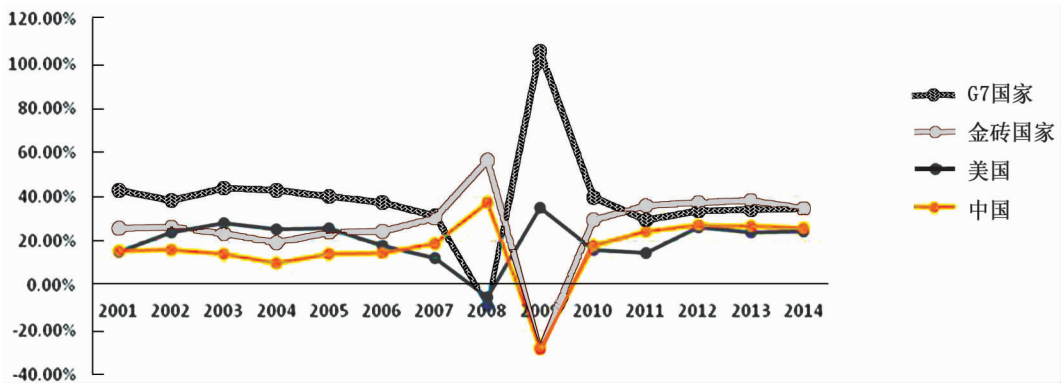


图 3 2001—2014 年 G7 国家和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汇率法）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注：2009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负，故在座标图中金砖国家正增长贡献率显示为负，而 G7 的负增长贡献率则显示为正。

与此同时，2011 年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 2016 年印度或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向亚洲特别是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日渐清晰。这些变化表明，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动力源泉切换的新阶段，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机遇。尤其是

新时期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涵盖 60 多个国家、44 亿人口，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并被互联互通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最为瞩目，也是最为重大的事件。预计未来 5 年，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全球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① 在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带动下，世界经济将加速复苏，经济全球化也将继续深化，作为经济危机的副产物，反全球化现象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逐步消退，全球化将在对反全球化的包容与消解中不断深化与前进，其长期深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任何国家因为反全球化而错失历史机遇都是不明智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内容与基本趋势

总而言之，从全球发展趋势看，虽然近期有反全球化逆流出现，但全球化不断深化的长期趋势不会逆转。制造业生产全球化、服务贸易全球化、商品贸易与资本全球化、劳动要素国内外配置全球化等趋势，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和趋势，而在制度层面上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模式适应全球化不断完善，也为全球化提供了保障。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技术、资本、劳动力、制度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配置、整合形成互动，一同成为驱动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其中，技术进步作为全球化的伴生因素，不但在宏观上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了新动能，也塑造了全球价值链下的全球经济结构和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而后危机时代经济再平衡的实现，有赖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推进结构性改革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同时要求全球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流动性管理和金融治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则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一带一路”将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赖以依托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助力。改革重构中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则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上升的地位，以及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复苏方面不断提升的作用。

（一）技术进步与制造业生产全球化

技术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正是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以及生产工艺和流程的不断标准化、模块化，使得产品生产工序的国际化分工成为可能，直接催生了世界经济体系由国际贸易网络向全球生产网络转变和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形成。在制造业生产全球化进程中，技术演进速度不断加快，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尤其是

^①中国未来 5 年将进口 8 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 6000 亿美元的外资、对外投资达 7500 亿美元、出境旅游达 7 亿人次。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2017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替代了大量简单重复劳动，对文员、生产工人等中低技能劳动力持续产生挤出效应，并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跨国公司充分挖掘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中低技能工作岗位向海外大规模转移，而个人服务业等低技能服务业岗位因为空间限制无法外包得以继续留存发达国家，作为蓄水池吸纳过剩的中低技能劳动力。在技术进步和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双重挤压下，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就业极化（job polarization）和收入差距扩大。^① 与之相对应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下降，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持续提高，经济结构服务化、信息化、金融化趋势不断加深，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空心化现象。^②

一方面，与其产业结构相对应，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优势 and 在国际经贸体制中的主导地位，掌控技术研发创新、关键部件生产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并构筑起知识产权措施等各种非关税壁垒，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发展中国家则凭借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禀赋的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成为能源、原材料供应国或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东道国，占据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低端的位置。全球价值链分布结构在全球经济结构和经济地理格局上体现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形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金融和消费国，以中日韩“东亚制造”和德国为主的生产与出口国，以及俄罗斯、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的资源国，并构成“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循环。与之伴生的则是，消费国与生产国、资源国经常账户收支的两极分化，以及以经常账户失衡为突出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s）。

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除了直接改变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其引致的技术转移、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也提升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加速其工业化进程，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大规模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也是大规模吸纳全球技术资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基础设施、工业体系的日趋完善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改变了中国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的结构，并显著改变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结构。中国逐渐在全球价值链中后来居上，由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向高端位置跃迁，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形成挑战。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以及跨越“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弱化，东南亚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被更深地纳入以中国为中

^①Autor D.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5, 29 (3).

^②胡立君、薛福根、王宇：《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机理及治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8 期。

心、与之产业结构相匹配的价值链体系中，形成更加紧密的整体。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国际贸易版图的重构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的兴起，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价值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价值链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三大价值链区块。^① 在此格局之上，三大价值链区块间的平衡与重组奠定了未来巨型自贸区组建的基础。

纵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技术进步构筑了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动能，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持续变迁，重塑了全球价值链结构和国际贸易版图，也是国家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维持其在既有技术发展路径上的优势，同时探索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的生长点，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产业、新市场，也意在削弱新兴经济体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则力图通过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全球产业转型期和产业革命爆发前夜实现“弯道超车”。近年来，不论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是美德日等传统制造业强国，都持续加大对智能制造、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其中，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战略，试图依托先进制造技术和高附加值制造业，重夺制造业第一强国的地位，实现制造业回归，解决产业空心化和失业问题。中国也以《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为蓝图，力图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跃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以美德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在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布局阶段同时起跑，目标在于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战略制高点和全球价值链高端，在梯次继起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占据中心主导地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重视创新、鼓励创新，通过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是巩固实体经济“压舱石”地位，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与趋势，也成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

（二）技术进步与服务贸易全球化

技术进步带来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另一结果是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随着生产全球化的深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要素资源和协调国际生产网络的能力成为其核心竞争力，并衍生出了跨国生产服务需求。服务贸易应运而生，并成为贸易全球化的新现象。虽然货物贸易仍占据主体地位，但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截至 2014 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达 20.6%。鉴于发达国家 GDP 中服务业占比达 70% 以上，以及全球经济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服务业倾斜的趋势，未来服务贸易潜力依然巨大。

^①全球贸易新常态与经济治理新框架课题组：《“一体两翼、三足鼎立”：贸易新常态、治理新框架、开放新战略》，2016 年 9 月 28 日。

在这一轮服务贸易浪潮中，发达国家依托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先发优势与知识产权的长期积累，确立了服务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主导和控制。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生产全球化带来的离岸服务外包需求也为其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大量生产性服务业工作岗位实现离岸化。为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跨国公司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其中甚至包括金融、研发、营销等高技能、高附加值业务。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则藉此机会成为离岸服务外包的第一、第二大接包国，并通过吸纳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继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建立了相对较大的优势。以中美服务贸易为例，美国、中国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出口国。李俊（2016）的研究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服务贸易逆差加速扩大，到 2014 年逆差已达 281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28%，其中旅游、金融、知识产权使用费项目逆差体量巨大、加速明显。因此，在服务贸易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应当改变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服务贸易结构，继续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降低服务业市场垄断，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以应对当下及未来服务贸易领域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

（三）贸易全球化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引擎，二者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因此探析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现象的根源必然涉及经常账户失衡和资本账户失衡两大主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产业资本持续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开启了本轮以生产全球化为特征的贸易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带来了大量跨国交易与并购需求，倒逼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境流动打开了壁垒。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国（主要是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其中以中国为最）、资源国（主要是石油输出国）长期经常账户盈余并伴随国际资本流入，形成了庞大的外汇储备；相应地，消费国（主要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迅速增长，积累了巨大的外部债务。经常账户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其他重要表征还包括：资本由收益率高的新兴经济体流入收益率相对低的发达国家，即“卢卡斯悖论”（Lucas Paradox）；^① 发达国家储蓄率的不断降低和新兴经济体储蓄率的持续走

^①现象上具体表现为：在经历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开始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防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出于保值目的购买美债，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经济体，而更大规模的金融资本由新兴经济体或其他资本盈余国回流美国。

高，以及全球总体储蓄率和利率水平的长期下降。造成这些“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来源于两方面（Song et al., 2011; Jin, 2012）：一方面是国家内部，同时也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体制、金融深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国家外部，同时也是根本原因，即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所构成的“中心—外围”模式（殷剑峰，2013）。因此，要达成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就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努力与合作，在认清各国间结构性差异以及对差异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既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同时也要推进各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

除了经常账户失衡以外，资本账户失衡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极。相比经常账户失衡，资本账户失衡在引发 2008 年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更为直接和主要的作用。^① 正如 Borio 和 Disyatat (2011) 所指出的，金融危机爆发前，输入美国的流动性 50% 以上来自欧洲，因此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根源并非高储蓄率的新兴经济体。欧洲商业银行和美国金融市场间形成了“短贷长投”型的流动性循环，暗含流动性错配（Liquidity Mismatch）的隐患（Brunnermeier, 2009）。在美国长年宽松货币政策和过度金融自由化的催生下，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导致金融资产的过度供给，吸引“美—欧”流动性循环的不断强化，直至流动性无法再支持资产价格上涨的预期，遂引发资产泡沫破裂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流动性短缺，欧洲商业银行无法获得足够的短期融资，流动性错配引发流动性枯竭，次贷危机扩散为全球性危机。因此，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引发的资产账户失衡，尤其是流行性失衡，而非经常账户失衡，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前车之鉴表明，更为稳健的全球流动性管理和更为审慎的全球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金融危机后，美元进入量化宽松阶段带来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流动性的驱动机制由银行驱动向债券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驱动切换，扩大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Shin, 2014）。国际资本经由各种渠道和机制大规模跨境流动更难监管，隐含的风险更难识别，可能引发货币错配导致脆弱性进一步加剧（Shin and Zhao, 2013; McCauley et al., 2015）。随着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引发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和汇率不稳定，新兴经济体金融脆弱性或将引起金融风险的爆发。因此，在资本跨境流动大幅波动越来越频繁的当下，提高全球金融治理的有效性，特别是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是题中应有之义。

^①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金融治理课题组：《全球金融治理：挑战、目标和改革——关于 2016 年 G20 峰会议题的研究报告》，《国际贸易评论》2016 年第 3 期。

（四）资本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

以上分析说明，应当充分发挥好 IMF、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形成全球性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协调机制，建成更为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以实现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管理和金融治理。但最为根本的，还是要改革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无论是经常账户失衡还是资本账户失衡，根本原因都在于当下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作为主导货币的地位。作为全球货币的执掌者，美国在货币政策制定时必然优先考虑本国利益，极有可能诱发在货币、汇率政策上以邻为壑的道德风险。仅从客观角度看，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和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之间一直以来也存在难以兼顾的矛盾（“特里芬两难”）。不可否认，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资本全球化运行的金融制度基石，美元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锚定作用。但是，美元“特里芬两难”固有内在矛盾也在不断削弱其信用基础，并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动荡的根源（王道平、范小云，2011）。而且，美国凭借美元独一无二的全球主导货币地位独享庞大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陈雨露等，2005），进一步加剧了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等性。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且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制度，已无法有效反映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和利益诉求。

2016 年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迈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对当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可谓恰逢其时。理论研究表明，基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所能提供的强大偿付能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稳定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范小云等，2014）。英国“脱欧”后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这将在客观上强化当下美元主导地位的优势，但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更大的需求。未来人民币将通过国际化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主要储备币种之一，构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五）劳动要素配置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跨国迁徙规模。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 2015 年全球移民总人数约 2.43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 3.3%，其中国际移民占高收入国家人口比重高达 13.6%。这同时也带来了日益突出的移民和难民问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研究，截至 2014 年美国非法移民人数在 1100 万左右，占移民人口的 26%和总人口的 3.5%。非法移民群体作为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虽然带来了东道国经济绩效的增长，但也冲击了劳动力市场，挤占了公共资源，往往混杂文化、族群问题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诱因。而难民问题则涉及到更加复杂的政治伦理，往往使得发达国家在

难民接收议题上进退失据，陷入义利之争的窠臼之中难以自拔。当下移民和难民问题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僵化的劳工体制、刚性的社会福利制度长期困扰其经济发展势头，从低收入国家吸纳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有其内在的必要性，但刚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又降低了社会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面临外来冲击时更加敏感和排斥。因此，严格的移民壁垒在较长时期内都不会消除，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难以实现，或将延续当下的大趋势。

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同样也是劳动要素配置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城市化和国际移民受到严格限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的城市化进程成为全球范围内劳动要素优化配置的最主要途径。伴随产业资本的跨国迁移，劳动就业岗位的跨国配置会引致东道国内部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塑造国家内部的经济版图、产业分布和城市格局。以中国为例，《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显示，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 2.47 亿，占总人口的 18%，且人口继续向东部发达地区和沿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相较于严格的国际人口迁移壁垒，主权国家内部人口迁徙政策具有更大的调整弹性和改革空间，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作用，因此也是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当下推进城市化最大的桎梏在于其薄弱的基础设施条件。^① 世界经济论坛《2015—2016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南亚、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极度落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正是破解这一瓶颈的最有力举措。“一带一路”、亚投行将为沿线国家提供以基础设施、资金、项目为载体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满足沿线国家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将极大地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为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提供新的动能。

（六）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

英国“脱欧”加速了欧洲相对走弱的趋势，美国孤立主义抬头将制造新的动荡，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稳定性随之加剧，全球治理的难度和复杂度都在加大。与此同时，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群像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为稳定当前局势注入了新的力量，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进一步显现为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此背景下，G20 作为当下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平台，其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影

^① 国际移民组织编著，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译：《世界移民报告 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2016 年 6 月。

影响力也将进一步上升。G20 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日益上升的世界经济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扩大的话语权，有利于促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格局。在议题方面，G20 议题涵盖了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构性改革、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等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最为迫切和重大的议题。在治理方式上，以议题为中心建立国家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理模式更加灵活高效，避免了僵化体制的约束。G20 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 G20 轮值主席国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峰会主题，设置了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四大议题板块，为推进全球化提供了全面的战略蓝图和行动纲领，体现了当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流精神。未来 G20 还需要不断创新与完善其长效机制建设，包括设立内部常设机构，建立与其他国际机构工作协调机制，以切实增强 G20 决策的执行力度和落实程度，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世界经济日益复杂多变的诉求。

在国际贸易领域，WTO 多边机制仍然是全球贸易规则的主渠道，但难以有效应对多种利益诉求不断分化的新形势，国际经贸体制的变革在多元化探索中酝酿。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 2001 年启动后久议不决、陷入僵局，历经 12 年谈判才达成 WTO 成立 19 年来的第一份多边协定。在多边协定框架内突破有限的情况下，作为次优选择的双边和区域自贸谈判成为对 WTO 多边机制的有益补充，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石静霞，2015）。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WTO 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达 600 多份，其中 400 多份已生效，平均每个 WTO 成员签署 13 份 FTA，已经有 90% 的 WTO 成员国参与了各种类型的制度化区域合作。^① FTA 的井喷带来的是谈判议题、区域合作、协定方式的多元化，涵盖了更加广泛的经贸内容，近年来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上也超过了 WTO 标准。因此，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成为当下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国际经贸体制变革的主要路径。但是，各类纷繁复杂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也带来了经贸规则体系碎片化倾向。尤其是在英国“脱欧”之后，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加深，有效整合碎片化经贸规则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

近年来，以中美为中心的区域经贸合作呈现出巨型化特征，中美在其各自主导的框架内展开全球范围的布局。在奥巴马任内，美国主推“3T”体系，即 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iSA（全球服务贸易协定），试图以此为框架建立全新的国际经贸体制，形成了对 WTO 多边机制的威胁。其中，美国推进 TPP 的目的，不仅在于

^①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亚太自贸协定：后 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2016 年 12 月。

通过高标准、排他性的贸易规则体系重构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亚太地区经贸生态，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战略支柱，而且试图以此确保未来在国际经贸体制中领导者和规则书写者的地位。然而，特朗普表态退出 TPP，以及 TTIP 推进长期无果，意味着美国主导的“3T”体系胎死腹中。未来美国将转而更加重视保护本国利益，甚至可能采取抛弃多边机制的极端举措。

美国政策转向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以及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投资合作为主轴，与沿线国家签订双边 FTA 和双边投资协定（BIT），非但不排斥相反还倡导补充与整合沿线国家现有的各种多边、双边、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虽然“一带一路”在开放水平和相关议题标准上与 TPP 的高标准存在明显差距，但其最大的潜力及意义在于，将一些因地缘、技术等方面的不利因素而长期无缘全球化进程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纳入了全球价值链，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下一个 10 亿级的市场。另一方面，RCEP 虽然容量足以匹敌 TPP，但其参与国开放程度差异较大为其推进带来了很大难度。中国参与并主导 RCEP 的意义在于，在美国退出 TPP 的情况下，以 RCEP 和“一带一路”为框架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立，有利于奠定中国及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国际经贸体制中规则制定者的地位。美国退出 TPP 也不意味美国对中国主导 RCEP 乐观其成，必然会在 RCEP 的建设上设置障碍。因此，中国既要在推动 RCEP 中发挥更大作用，也要做好准备面对相应挑战，同时还应认识到，未来国际经贸体制的确立有赖于中美两国的共识，并在二者的合作与博弈中共同完成。

三、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机遇与应对战略

概括而言，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和全球化的新形势特点如下：第一，全球经济仍在深度调整阶段，但新技术、新行业、新市场孕育新机遇，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改革积聚新动能，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第二，英国“脱欧”事件带来冲击，美国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政策主张将带来不确定性，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的主流精神，改革重构中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将促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格局。第三，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化发展与反全球化的十字路口，但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引领之下，世界经济在全球化深化中前进的趋势不会改变。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第一，世界经济形势虽然总体低迷，但其中蕴含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间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脉络，世界经济的复苏离不开中国的引领，也需要中国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二，在反全球化逆流回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领军国家，中国理应高举维护和推动全球化的旗帜，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大主导作用。尤其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剧增的当下，世界更加需要中国承担提振经济、遏制反全球化的使命，这为中国对外开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参与并领导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格局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机遇。第三，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短期内将加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但长期看，中国经济未来趋势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动力，并有赖于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当前，中国经济步入经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应对新形势的必然选择。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全球化新形势下，从容面对挑战，紧抓历史机遇，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将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基本态度。对外开放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以创新驱动实现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外贸升级

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初步目标，初步形成创新型经济格局：若干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成长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and 产业集群，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60% 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20%。^① 落实《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推动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等五大工程建设，实现 2020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的初步目标。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创客经济，加快技术、产品、业态创新，培育发展新产业，打造发展新引擎。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推动高端装备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利用自贸区建设经验，在对外服务贸易协定中逐步研究实施服务业外资负面清单准入模式，扩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商贸物流等领域开放。以产业升级和提高效率为导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引导生产企业加快服务环节专业化分离和外包，扩大服务出口，促进在岸、离岸服务外包协调发展。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筑经济长期增长动能

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继续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各项体制改革，构筑经济长期增长动能。积极稳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通

^①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 年 5 月。

过政府有效推动和市场引导，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供需再平衡。“去产能”方面，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等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紧抓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重点，防止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去库存”方面，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将去库存与促进人口城镇化相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去杠杆”方面，降低企业杠杆率，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降成本”方面，推进行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等领域各项改革措施，取消不合理收费，削减简化行政审批，帮助企业有效降低税费负担以及财务、物流、用能等各项成本。“补短板”方面，着力扩大有效供给，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快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通过改革推进结构调整，既着眼于实现当前化解过剩产能和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短期结构调整任务，又注重补足经济发展各项短板，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筑经济长期增长动能的长远目标。

（三）立足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

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主张，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普遍认同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曲星，2013）。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更强调随着全球化深入，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倡导和平与发展，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的主张，消解国际政治中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化解地缘政治冲突和文明冲突，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及能够被广泛接受认同的话语体系。

以发展意识和包容性意识升华全球化观念，提倡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惠及所有国家、所有居民，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和弱势群体。同时，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也要求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失业、贫富差距、环境问题，实现包容性发展。因此，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新形势下融入了发展、普惠、公平的全新全球化发展理念，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正是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能够惠及发展中国家全体普通民众，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其福利水平，在建设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就业也更加广泛，并为今后经济

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性经济规则制定，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以 G20 作为最主要的平台，推进新时期经济全球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加强在国际事务和经济全球化中的话语权，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主动提出并引领讨论全球化发展中的重大议程。继续坚定支持 WTO 多边贸易体制，努力维护 WTO 的主渠道地位，积极推动多哈回合“后巴厘”谈判进程，落实《WTO 贸易便利化协定》，坚定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以亚投行作为主要平台，推进并创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和全球金融稳定机制建设。

积极引导推进区域经贸合作。以“一带一路”为载体，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包括推进与“一带一路”战略平行的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建设，签订双边 FTAs 和 BITs，积极推进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区。利用中国亚太地区大国的优势，积极参与 RCEP 建设，促进 RCEP 破局与落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推进 FTAAP 建设。发挥印度、巴西、俄罗斯、中国在服务与货物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考虑筹划建设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尝试推动金砖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协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共同推动制定适合新兴及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的国际经贸规则与多双边合作模式，争取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大国、主要区域经济集团和部分发达国家建立国家自由贸易区，构建金砖国家大市场、新兴经济体大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市场，逐步建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作为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突破口。“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下中国主动走出去，改变对外开放格局，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重大战略新举措。其战略重要性不仅在于短期内输出产品、产能，更在于以互联互通的模式向沿线及周边国家输出资本、技术，“走出去”吸纳并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全球资源要素，构建以中国经济结构和价值链为核心、与中国产业体系相匹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亚洲板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未来实现工业化后更加庞大的新兴市场容量，也为中国当下的技术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因此，“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统筹国际开放和国内发展两个大局的战略枢纽。

落实“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方面的工作重

点。在政策沟通方面，健全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设施联通方面，依托中国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技术积累优势，逐步构筑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交通、港口、能源、通信基础设施网络。在贸易畅通方面，一方面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为载体，实现对外投资快速增长，优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布局，主动“走出去”参与全球资源要素的优化整合，为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在资金融通方面，以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为平台，妥善解决融资问题，促成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合作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发挥中国在资金方面的优势，将亚投行打造成全球金融体系重要一极，逐渐增强中国通过国际金融组织影响全球事务的能力。在民心相通方面，加强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更多沿线国家认同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发展，也使“命运共同体”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六）推进自贸实验区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发挥好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功能，以自贸区作为试验田，提升贸易、投资、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在自贸区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当借鉴 TPP 的条款，探索贸易投资新规则，为未来可能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创造适应过程。进一步缩小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项目限制范围，并将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推广至全国。利用自贸区作为金融改革方面的试点，尝试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提高金融开放水平与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发挥沿海自贸区和内陆自贸区各自区位优势，以自贸区作为桥头堡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引导自贸区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提供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和金融支持。向条件适宜的自贸区积极推广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等先行自贸区的经验，形成沿海自贸区和内陆自贸区协同效应，形成东西互济、海陆统筹的开放格局，带动国内其他地区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七）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做好金融改革配套工作

继续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做好金融改革配套工作。随着美元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世界各主要国际货币面临贬值预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短期压力。但应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有序稳妥推进才是关键，因此要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的长远规划。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稳定，长期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基准利率形成机制改革，减少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主动倡导并参与区域经济和货币合作，以官方合作方式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以贸易结算和投资计价引导人民币“走出去”。借助“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发挥好亚投行主要金融平台的支持作用，围绕“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发展。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仍坚持渐进、可控与审慎的原则，稳妥推进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发挥好离岸金融市场的作用，为资本账户逐步开放提供缓冲带。以人民币加入 SDR 为契机，继续提升中国在 IMF 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建立风险监控机制，以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确保金融稳定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参考文献：

1. 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1991 年版。
2. 陈雨露、王芳、杨明：《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
3. 王道平、范小云：《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世界经济》2011 年第 1 期。
4. 杨励、韩倩倩：《经济全球化与危机背景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历史脉络、根源与前瞻》，《国际贸易探索》2012 年第 2 期。
5.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管理世界》2013 年第 3 期。
6.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 年第 4 期。
7. 殷剑峰：《储蓄不足、全球失衡与“中心—外围”模式》，《经济研究》2013 年第 6 期。
8. 胡立君、薛福根、王宇：《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机理及治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8 期。
9. 范小云、陈雷、王道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2014 年第 9 期。
10. 王鸣鸣：《奥巴马主义：由涵、缘起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9 期。
11. 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 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12. 石静霞：《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及中国的因应》，《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9 期。
13. 金碚：《论经济全球化 3.0 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 年第 1 期。
14. 黄阳华：《工业革命中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历史考察与展望——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
15.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金融治理课题组：《全球金融治理：挑战、目标和改革——关于2016年G20峰会议题的研究报告》，《国际贸易评论》2016年第3期。
 16. 金玲：《英国脱欧：原因、影响及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
 17. 李俊：《我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问题研究》，《开放导报》2016年第5期。
 18. 杨盼盼：《G20结构性改革的进展与评述》，《国际贸易评论》2016年第5期。
 19. 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20. 国际移民组织编著，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译：《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2016年6月。
 21. 全球贸易新常态与经济治理新框架课题组：《“一体两翼、三足鼎立”：贸易新常态、治理新框架、开放新战略》课题报告，2016年9月28日。
 22. Acemoglu D.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 (1).
 23. Brunnermeier M. Deciphering the Liquidity and Credit Crunch 2007 – 2008.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9, 23 (1).
 24. Song Z., Storesletten K. and Zilibotti F.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 (1).
 25. Borio C. and Disyatat P.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Link or No Link?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2011.
 26. Jin K.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Flo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 (5).
 27. Shin H., Zhao L. Firms As Surrogate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Manuscript,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3.
 28. Shin H. The Second Phase of Global Liquidity and It's Impact on Emerging Economies, *Volatile Capital Flows in Korea*.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4.
 29. Autor D.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5, 29 (3).
 30. McCauley R., McGuire P., Sushko V. Global Dollar Credit: Links to US Monetary Policy and Leverage. *Economic Policy*, 2015, 30 (82).
 31. Gaspar V., Obstfeld M. and Sahay R.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When Policy Space Is Constrained: A Comprehensive, Consistent, and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 Staff Discussion Note 16/0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16.

责任编辑：李蕊

制造业回归：拯救香港经济的唯一出路^{*}

——关于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的建议

李罗力

摘要：香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重振香港经济的根本办法是解决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关键是让制造业重返香港。鉴于香港本土的营商成本已经奇高，且缺乏配置新兴产业资源的前提和基础，建议在深港边界建立类似于新加坡“裕朗工业走廊”那样的新兴产业经济带，吸引包括国内和全球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和新兴产业到这里来落户，发挥香港金融、物流，国际免税港的优势，以及中国国内主要是深圳的资金、人才、科技的优势，把“深港跨境高科技产业经济走廊”建成中国的 4.0 工业创新圈。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是新时期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根本举措，建议把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纳入国家战略。

关键词：香港经济 制造业回归 深港跨境 新兴产业 经济走廊

作者简介：李罗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深圳马洪经济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

一、香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

香港制造业北移珠三角后，香港的制造业逐渐空洞化——目前整个香港才有两万人在制造业领域就业，出现了严重的制造业产业“空洞化”。相比之下，大陆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如此，大陆的制造业正在转型，一水之隔的深圳已经转型成功，成为领先全国的创新转型地区。

^{*} 本文为“改革开放 40 年”专题约稿。

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高端服务业（如金融、高端物流等），但由于高端服务业本身就业门槛很高，对就业的容纳度低，香港真正能够在高端服务业就业的人口数量有限。即使如此，香港的高端服务业也在日益边缘化。就拿金融来讲，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式微，上海、深圳，包括东京、新加坡，都在挤压香港的发展空间。实际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要靠大陆才能维持下去。再拿物流来说，在大陆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香港的港口、物流一直是中国通往世界的主要国际经贸通道和投资通道。而现在，不仅北上广深，而且许多内地中心城市尤其是沿海开放大城市，都已成为内地的主要国际投资和经贸渠道，香港对内地的经贸投资主渠道作用也严重边缘化了。

那么，现在香港大部分的就业人口在哪里呢？大量的就业人口都在零售、餐饮、娱乐、旅游等低端服务业。主要靠什么发展呢？靠大陆的“自由行”。可以说，前些年中央一直给香港送的“大礼包”中，最有用的还是“自由行”。中央给香港送“大礼包”，向香港放开高端服务业，等于是让香港的金融师、会计师、计量师、工程师更方便地到大陆来开业、来赚钱，因为香港的经济中心地位已经式微，而大陆的赚钱机会多，其结果反而会使香港的高端服务业也“空心化”，导致其产业发展日益岌岌可危。“自由行”是把“双刃剑”，虽然提振和刺激了香港低端服务业的发展，为大多数在其中就业的普通香港居民带来了收入，带来了财富，也给香港经济带来了活力；但是，“自由行”抢购了香港居民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例如奶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秩序，一些内地人的生活习惯相对落后，香港人已经培养出一定的现代文明，两者出现冲突。这就导致这几年“自由行”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明显，某些香港人越来越不欢迎内地人去香港采购，许多内地人也越来越不愿去香港“自由行”。另一方面看，如果“自由行”搞不成了，就会直接影响在低端服务业就业的90%香港人的收入和生活来源，使香港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稳定都受到严重威胁。这个矛盾如何解决？香港经济今后怎样发展？显然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香港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深层次的经济矛盾。

另一方面，在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中，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都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转型——从加工贸易产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型为高科技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唯有香港的制造业（包括转移到珠三角的绝大部分港资企业），几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成功转型，往往是看在这个经济体中有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全球著名品牌的产品。韩国有，新加坡有，台湾有。而香港除了金融、房地产和物流业外，在制造业上没有什么世界级的企业，没有什么世界著名的品牌产品，几乎什么都没有。之所以这么强调产业转型，就是因为只有经济转型成功后，才能保证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能够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不断持续稳定地增长，而这种持续稳定的增长，最重要是能够维持每年

新增（也包括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经济的增长能不能满足新增就业和原有就业的水平，对社会的稳定是具有根本作用的。能够满足的，其社会基本是稳定的；不能满足的，其社会就是不稳定的。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当就业出问题的时候，社会就要出大问题了，老百姓就要闹事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没有生活来源了，不能养家糊口了，他们对政府，对社会的各种不满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

香港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就业出了问题。正是由于香港产业没有转型，香港大部分普通民众和普通劳动力还在从事低端服务业，香港普通民众这么多年来收入才没有得到很大的增长；而且随着香港的本土企业不断迁往内地，还在不断失去就业岗位。

总而言之，香港现在社会出现的问题，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就是香港社会越来越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由此导致香港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香港作为我们国家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怎么能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

二、制造业回归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出路

未来要解决香港的问题，就要充分发挥深圳的作用。深圳在经济转型方面在大陆地区一马当先。深圳完全有能力把支持香港重新发展的作用支撑起来，这就是邓小平当时所说的，深圳要在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笔者认为中央应该给深圳赋予特别的权限。

当前解决香港问题要做的核心事情，就是重振香港的经济。重振香港经济的根本办法，就是要解决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而解决香港产业空心化的关键，就是要让制造业重返香港。就连美国都是如此，不仅前总统奥巴马已经提出，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而且现任总统特朗普更是凭着“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和“要让广大失去工作岗位的普通劳动力能够重获就业机会”这样的口号和竞选策略，获得了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选票而当选总统的。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没有制造业是不行的，关键是解决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只有本地制造业发展起来，那些高端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技术产业才能有的放矢的为本地经济服务，才能进一步带动本地的就业和税收，给本地经济带来增长。

那么怎样才能让制造业重返香港呢？鉴于香港本土的营商成本已经奇高，且缺乏配置新兴产业资源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建议在深港边界建立类似于新加坡“裕朗工业走廊”那样的新兴产业经济带，吸引包括国内和全球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和新兴产业到这里来落户安家，既发挥香港金融、物流，国际免税港的优势，又发挥中国国内主要是深圳的资

金、人才、科技的优势。这个跨境新兴产业经济带主要由香港管理，实施特别的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主要安排香港普通劳动力到这里来就业。因为无论多么先进的高科技产业，其产品的制造和装配线都需要普通的劳动力。即使未来，机器人的使用也远不能代替普通劳动力在经济活动中所起到的基本作用。

总之，制造业返回对香港来说绝对是一个好事，而且深圳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制造业重返香港也非常有条件。在深港边界十几公里搞新兴产业经济走廊，对在这里落地的外资和内地企业都有好处。一是香港是国际免税港，在这个特别经济区又可以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对在这里落户的企业来说，税收低是肯定的。二是有利于内地企业产品的进出口。香港直接与国际市场对接，而在香港制造的产品可以规避许多国家对中国大陆制造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限制；另一方面，在香港生产的企业进口，从技术和材料设备进口来说，可以规避巴统对中国大陆企业进口的某些限制，内地企业到这里设厂对其进出口和减免税大有好处。三是对到这里落户的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进入中国市场和占领中国市场。另外，在这十几平方公里，打造新兴产业经济走廊，所有与其配套的生活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运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都得搞起来，实际上就等同于在深港边界建起一座跨境的新兴城市，这等于把香港的高端服务业和普通服务业都带动起来，香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不仅制造业返回香港，而且所有服务业在本地都有了直接服务的对象，这又会为香港带来大批的就业岗位和直接税收。

这个举措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香港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困难，同时也进一步带动香港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和发展，可以让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好处直接普惠到香港的百姓和中产阶级。这样就会缓解香港普通百姓和中产阶级对香港回归多年后仍未享受到回归好处的不满，缓解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施政方针和政策的不满，缓解香港贫富悬殊的尖锐社会矛盾，从而为中央政府在新的条件下解决香港问题创造一个根本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解决好了，中央政府解决香港的上层建筑问题也就有了坚实的百姓拥护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打造这样一个经济产业带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了香港产业的升级换代问题。因为在这个新兴产业经济走廊中所引进的企业，都是代表目前世界产业高端的高科技、低能耗、低污染的先进企业和产业，真把这个经济走廊搞好了，香港事实上也就摆脱了原来的加工贸易型产业，而进入到先进科技产业的行列。

因此，兴建这个深港跨境高科技产业经济走廊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同时现在也是最佳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香港经济真的无路可走了，香港社会存

在各种弊病和问题，也真的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了。其他所有的举措，不过都是小打小闹，既解决不了香港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也解决不了香港社会稳定的要害问题。深港相邻的十几平方公里之间如果真能把跨境产业园区搞起来，能够给香港提供 20 万个就业岗位，那么香港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三、把“深港跨境高科技产业经济走廊”建成 中国的 4.0 工业创新圈

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不仅对香港经济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这个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引进代表当代最先进水平的工业 4.0 企业及其技术。要利用香港在出口、金融和海外市场等方面走出去的优势，引进这方面的海内外先进企业和先进技术，不但要在深港跨境产业区中大量引进工业 4.0 的企业，而且包括 4.0 的工业技术和相关产业资金；同时在这里生产的产品，还主要面向海外市场，要去占领海外市场。

在中国新的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阶段里，要继续让香港发挥桥头堡的巨大作用。通过构建深港高科技产业经济走廊，不仅香港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解决了，香港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了，而且我们国内的新兴产业发展，包括代表工业 4.0 水平的物联网、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生命科技产业等也会得到强劲的带动，并迅速发展起来。此外，在深港跨境产业区搞工业 4.0，不但完全可以利用香港和深圳双方的优势，而且还可以让香港的企业和产业实现升级换代，代表香港产业水平的将不是加工贸易了，而是工业 4.0，这样就可以使香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超过台湾、超过新加坡、甚至超过韩国。如果真能构建起深港跨境高科技产业区的话，香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它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所拥有的巨大人力、资金、科技、市场资源，而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不具有这个优势。

从现实意义来看，目前中国大多数地区产业转型还没完成，还处在产业转型的震痛期。传统产业乏力，新兴产业还没上来，整个经济面都面临很大压力。因此，大规模地搞工业 4.0 在中国内地其实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在深圳呢，经济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已经有了搞工业 4.0 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因此，在深港边界建设这么一个专门搞工业 4.0 的跨境产业园区，既解决香港经济的根本问题，又打造了一个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工业 4.0 产业园区，同时又实施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让中国在这里生产的最好的产品走出去，打开和占领世界市场，一举多得。

四、对“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的初步构想

“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应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及内容？应该如何运作？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一些初步的构想。

第一，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香港要真正能够加入进来。加入进来是什么概念？那就是这个产业走廊真正是在深港两边跨境的，无论香港那边是五平方公里也好还是十平方公里也好，香港都要真正地参与进来，不能像深圳的“前海深港合作区”一样，只是深圳这一头在折腾，香港根本就没有参与。只要香港不进来，这个深港跨境高科技产业区就搞不起来。

第二，在这个园区中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要有金融创新、文化创新。所有产业的创新都加入进来。但是绝对不能搞成房地产。

第三，划入到深港跨境工业里的香港这方面的几平方公里，香港的财政社保、医保必须可以覆盖到，这样香港的人才能过来。

第四，在这个高科技创新产业区中，要大量吸引内地和海外很多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企业，但这些企业都是能够充分吸收劳动力和充分创造就业岗位的企业。当然，这里面不能要落后产能、高耗能、高耗水和污染环境的企业。

第五，这个深港跨境产业区相当于是深港之间的一个特区，产品进出口和人员往来都实行特殊政策。从海关线来讲，海关线应该设在深圳这边，这样才能保证在这个深港跨境产业区生产的产品都算香港产地的产品。从人员往来来讲，两边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是要把住出口。一般来说，香港那边要管深圳这边进去的人，出这个区进入香港的手续视同于从深圳的口岸进入香港。同理，深圳这边要管香港那边进来的人，出这个区进入深圳的手续视同于从香港的口岸进入深圳。但是，也可以实行特殊政策，凡是到这个区域里企业工作的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都可以发一个特殊证件，五年之内可以不受限制地多次往返于深港两地。对于深港跨境产业区所用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和中间产品来说，凡是来自于香港方面的（包括从海外进入到香港的），都不算进口，都是免税产品；但是从大陆方面进入这个产业区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和中间产品都算出口。生产过程一旦完成，产品就直接从香港出口运往海外目的地，相当于从香港出口直接进入海外市场了。这对很多要开拓海外市场的中资企业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一是由于来自海外的原材料、设备和中间产品不需要进口到国内，因而生产成本会低很多；二是税收会低很多；三是从香港出口会便利很多，还会避开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大陆产品的贸易壁垒。因此，很多要开拓海外市场的中资企业会愿意到这个跨境产业区里来落户生根的。同时，

这对于要开拓中国市场的海外企业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是生产成本低，二是税收低，三是在这里生产的产品进入大陆运输成本低，四是便于进入和占领内地市场。

第六，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不仅可以解决香港 20 万人的就业问题，还可以解决香港目前金融产业和物流产业的困境问题，甚至目前困扰香港的住房、养老等问题也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如果在这个跨境产业园区中划出一个生活区，不是搞房地产，不给开发商搞商品住宅，而是政府建保障房，建经济适用房，建廉租房，售租给香港的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不但可以使很多普通民众百姓、甚至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能够获得住房，而且也可以让香港的“天价”楼市价格降下来。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香港目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其实香港人的工资水平与内地人相比还是很高的，但是钱为什么不值钱，是因为生活成本太高。在生活成本中，吃的和用的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住房成本。如果住房问题能够有效解决，就业问题能够有效解决，香港政府的威信也就建立起来，社会怨气也会大大减少了，社会矛盾也会大大缓解了。另一方面，既然在这里建立生活区，那么商业、娱乐等各种配套服务设施都会建立起来，又给香港百姓带来了新的发展商机和发展平台。可以为香港居民搞一个特殊通道。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消费，在这里娱乐。这十多平方公里就成为香港的新兴繁荣区了。

第七，对于深圳来说，这个跨境区主要是吸引企业到那里投资设厂，而不是解决大量人员的就业和居住问题。当然对于深圳这边也会有一些人员就业的问题，但是这边过去的主要是高级人才，是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普通劳动力。我想，甚至可以在这个跨境产业园区设定一个政策，内地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在这里工作，不仅可以拿到香港的高工资，可以拿五年内多次往返香港的特殊证件，而且在服务一定年限（例如五年）后，就可以转成香港居民。这样做就会对大陆的高级人才专业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八，在这个跨境产业区中主要实施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主要是按照香港制度来。但在这里的大陆企业，也可以设立特别的仲裁、法律通道。如何建立这个区内特殊的法律体系，要通过深港两地在合作中协商解决。

五、把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纳入国家战略

构建“深港跨境新兴产业经济走廊”是新时期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根本举措，是党中央“一国两制”战略方针能否得到成功实现的根本举措，也是中国能否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目标，振兴民族大业，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根本举措。想做成这件大事，只靠香港政府

（下转第 60 页）

必须高度警惕的几种致命陷阱

黄志凌

摘要：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有一部分国家深陷泥潭、无法自拔，而一些国家成功跨越陷阱、不断发展。本文从产生条件、作用机制、致命后果以及预防避免等角度深入剖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几种致命陷阱，流动性陷阱是长期通缩积累的极端情景，经济衰老效应不断积累而形成过度福利陷阱，腐败陷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阻碍。通过比较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社会各方达成共识、全面评估、慎重选择、积极引导，才能避免悲剧发生、跨越致命陷阱、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升级。

关键词：流动性陷阱 过度福利陷阱 腐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剧烈波动之后陷入持续低迷状态，大宗商品需求疲软致使价格持续下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困惑。虽然美国经济看似已经恢复、数字抢眼、美元强劲并不断扬言加息，但仍然缺乏坚强的基础支撑，其通货紧缩趋势长期看并不乐观。新兴经济体更是饱受经济下行之苦，要么受到发达经济体通货紧缩的拖累，经济增长严重放缓；要么经济停滞伴随严重通货膨胀。经济矛盾的长期积累，最终必然反映为社会政治的认识分歧与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回顾历史、环顾现实，我们担心有几种最不愿意看到的经济发展情景会重现。在这个特殊时期，有良知负责任的政治家必须调动全部的政治智慧，全面评估、慎重选择、积极引导，避免社会经济发展落入一系列致命陷阱。

一、流动性陷阱：长期通缩积累的极端情景

长期通货紧缩积累，将产生严重后果。通货紧缩一旦成型，解决起来非常麻烦，解决不好的后果是落入“流动性陷阱”，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情景。国际上，日本的教训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这种“日本现象”没有什么不好。

流动性陷阱亦即社会资本陷阱、货币陷阱、通货陷阱、金钱陷阱。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包括负增长）原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国内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但是，当利率降低到一定水平时，投资者对经济前景预期不佳，消费者对未来持悲观态度，人们对货币的投机性需求无限大，此时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相反会选择持有货币，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经济学家称这种状况为“流动性陷阱”。一旦陷入流动性陷阱，在经济层面，其表现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出现衰退和萧条，需求严重不足，失业情况严重，企业部门库存增加，私人部门储蓄率上升。二是物价增长缓慢，长期低位运行，出现通货紧缩。三是利率已经达到最低水平，名义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为零或负利率，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下调已经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出现“货币无力症”，只能依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来摆脱经济萧条。

客观分析世界经济现实，2008 年以后，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通胀率下降甚至是进入通缩的局面，特别是日本，既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日本可谓二战后在流动性陷阱中挣扎时间最长的发达经济体。自 1985 年以来，日本经济规模迅速膨胀，达到鼎盛，位居世界第二经济体。然而，步入 90 年代后，广场协议的签订刺破了巨大的资产泡沫，资产价值大幅缩水。东亚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恶化。自 2001 年，日本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通过超常规、大剂量的货币供应，推动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事与愿违，由于当局在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时没有及时对市场加以干预，经济主体已经遭受巨大的净值损失，货币政策未能充分发挥效果，致使积重难返。“迟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并未让日本经济脱离陷阱，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 20 年”。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出现通缩，美联储在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时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通过从市场上收购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增加银行放贷，增加基础货币，为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达到振兴经济的目标。之所以说量化宽松是不同于常规货

币政策的超常规，是因为其不同于央行在一般情况下通过买入短期国债降低短期市场的市场利率的做法，而是通过购买中长期证券，给市场释放经济长期向好的积极信号，以活跃市场，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2008—2011年，美国的基础货币增长了三倍，但美国国内物价指数和基于美元的大宗商品价格还是开始下跌。价格长期下跌，影响消费者信心和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一旦低利率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固有心态，低利率政策便难以取消。显然美国的量化宽松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有所复苏，美元在加息中有所反弹，但整体经济仍然缺乏较强的基础支撑，美国经济复苏长期看并不乐观。虽然美国已经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美元利率依然低迷，美元流动性继续泛滥，通缩压力并没有全部化解。

继美国经济危机之后，欧洲的通缩如约而至。欧洲央行开始的应对策略是采取传统的扩张货币政策——大幅度降低利率。欧洲央行于2014年6月将商业银行在欧洲央行的存放利率降低到-0.1%，在刺激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仿效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计划，从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机构收购证券，并宣布将证券规模扩大到1.1万亿欧元，从2015年3月9日起开始每月购买600亿欧元的证券，一直到2016年9月底。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金外流和欧元的大幅度的贬值。受欧元区通缩的影响，欧洲国家其他国家瑞士以及北欧国家出现罕见的降息大赛。独立于欧元区外的英国也难逃厄运，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2015年2月份首次降到零，进入通缩期，英国政府为了摆脱日本式的通缩陷阱，也在考虑执行负利率。

很显然，日本、美国和欧洲央行都采取了相似的量化宽松措施，但基本上还是以货币政策为主，降低利率作为刺激经济的增長的手段。这些都是短期行为，一段时间内制造一种经济复苏的假象，并转嫁部分经济危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负利率一旦形成，将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经济体往往会在流动性陷阱中越陷越深，应对之策早已经超出货币政策范畴，也绝非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这种短期行为的结果会给未来几代人带来深远影响。

从这些国家的教训可以看出，流动性陷阱一旦成型，货币政策失效，经济陷落难以自拔，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低利率和高流动性并存，货币传导渠道出现“三大梗阻”。一是货币市场的梗阻。尽管央行能控制基础货币的水龙头，但却不能强制银行放贷，银行只能将超额的流动性以储备形式继续持有。二是从金融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梗阻。尽管央行能控制短期名义利率，甚至影响各种利率和相对资产价格，但却无法强制企业和私人部门借款，货币刺激难以转化成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三是政策显效的梗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受到资本流动的干扰，从而降低了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为可怕的是，增加货币供给而且是不断增加货币供给的刺激性货币政策，只能产生流动性过剩与无处不在的过剩经济现实，这也正是流动性陷阱可以扩大化称之为过剩经济陷阱的原因。没有流动性过剩与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投资过剩等等过剩经济现实，流动性陷阱就不可能出现。

二、过度福利陷阱：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衰老效应

这是一个与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的问题，是一些欧洲高收入国家近年来普遍存在的现象，经济衰老的实质是过度福利，不仅会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还会带来社会创新动力衰竭，发展接近停滞也不愿意改革，久而久之可能因为这种经济衰老效应不断积累而形成高收入陷阱。

我们注意到，美国次贷危机两年以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爆欧洲金融市场债务危机。尽管以欧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组织和相关债权人主动相助，并期待希腊以此为戒，进行结构性深度改革。但希腊社会对于相关帮助慨然接受，而对于国际社会提出的相关结构性改革却迟迟未能启动，政府频繁换届。2015 年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直言：希腊人在这项救助计划中遭到压榨，要求国际社会削减债务，否则就不还钱。直至 2017 年 2 月 20 日，希腊在和国际债权人的最新谈判中，仍表示无法接受 IMF 提出的应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更深入改革的方案。根据 IMF 提供的数据，相比于 2010 年，2015 年希腊经济（以不变价计算）实际萎缩 17.93%。

作为发达经济体，希腊深陷经济危机泥潭表是经济周期使然，但深入究其原因，我们观察到希腊的危机形成与修复机制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国家的“变异”：希腊的高福利远远超过其财富积累水平，过度福利使得财政出现了收不抵支、过度借债，超出负债能力，产生危机；与此同时，过度福利致使社会创新动力衰竭。这种经济衰老效应久而久之不断积累，便形成了过度福利陷阱。

关于衰老科学研究表明，细胞的衰老性死亡就是细胞凋亡。体内的自由基产生于如脑细胞、神经细胞、心肌细胞等具有重要功能、活动性和耗氧量较高的组织细胞内，这些自由基过度堆积、氧化细胞，对细胞造成损伤，诱使细胞死亡，加速器官老化。放在经济领域，过度福利的低效分配使得整个社会风气散漫，民众精神衰老，心安理得地享受福利，贪得无厌，社会有机体的活力减弱，带来经济衰退，甚至危机。

西欧战后精心地打造了“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全网，在法国绿卡就能享受上百种福利。欧洲人为自己的社会福利模式感到自豪，从欧盟的口号就可见一斑：“欧洲是提供保护的欧洲”（The Europe that protects）。欧盟虽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社保体系，各国

可以自由决定其社保制度，制定不同的标准和享受条件，但为了保障劳动权益，欧盟要求各国采用无差别国民待遇，同时当劳动者前往其他成员国工作后，原属国已有的社保资质也不得取消。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前，希腊的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有 14 个月的工资，并且有 1 个月的带薪休假，一年中几乎有一大半时间是下午 2 点半就下班。58 岁便可退休，退休后仍然有 14 个月的养老金。欧洲的养老金制度是“当代人养当代人”的现收现付制，当交养老金人数和金额大于领养老金的人数和金额时候，这一制度并无大碍。当“婴儿潮”变成“老人潮”时，养老金便出现缺口。根据欧洲议会公布的 2015 年的老龄化报告预测，2060 年欧盟 65 岁以上老人比重为 40%，平均抚养比为 76.6%，这就意味着平均 1.3 个人需要养 1 个老人。以法国为例，2000 年以来，老龄化每年要制造 150 万人的养老缺口。高福利给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债务压力。2009 年，意大利的赤字和债务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 和 116%，西班牙是 11% 和 53%，葡萄牙两个数据为 9.4% 和 76.8%，德国是 3% 和 73%。而据当年经合组织预测，到 2011 年，约有 50% 以上的欧盟成员国债务比重将超过 60%。事实上，截至 2015 年年底，欧元区 and 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务比例在较前两年已经有所下滑的情况下，依然分别达到 90.7% 和 85.2%，仍远高于欧盟规定的 60% 安全比例，仅有卢森堡、德国和爱沙尼亚实现财政收入盈余。

需要说明的是，老龄化现象和高福利并不会直接导致社会能力的衰老。根据日本总务省数据，2016 年 10 月日本总人口有 1.27 亿人，其中 65 岁以上的人口约有 3456.1 万人，老龄化率 27.3%，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就一名老人。然而，日本创新实力和经济实力仍居世界前列，很多日本老人仍辛勤工作，退而不休。瑞士作为世界上高福利国家之一，连续四年居全球创新能力排行榜第一，几百年来积累的大量财富所带来的高福利，并没有衰减社会创造力，反而为社会创造力提供强大的财富支持。

过度福利主义一般都会带来以下结局：第一，重新分配既有财富，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所推行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的核心就是通过全民福利来搞平均主义，其本意是为了扩大医保覆盖范围，让许多原来没有保险的低收入群体也能参保。但该法案所带来的高昂的成本主要由中产阶级承担，而且由于领取免费医保的标准过低，很多没有工作意愿、不思进取、贪得无厌的“懒汉”也成为了保障对象。第二，印钞模式，这种模式成为全世界几乎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后果也很明显，采取通胀形式发展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资产价格暴涨以及生活生产成本暴涨，从而窒息了经济增长，这也失去了福利主义的基础。委内瑞拉一升水是一升汽油价格的十倍，民众对此习以为常，一旦汽油涨价，便会引发骚乱，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印制钞票。由于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委内瑞拉已经不再公布任

何经济数据。津巴布韦 2012 年通过的《老年人法》规定，60 岁以上老人免交水电等公用社会设施费用，享受免费医疗及其他福利。为保障高福利措施，津巴布韦持续印钞，令人瞠目结舌的是，2015 年 1 美元可以兑换 3.5 亿津巴布韦币。第三，加征税赋。这个模式后果很直接，就是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工人失业。经济增长的微观主体积极性丧失，财富从民间大幅度转移到公权力手中，从而导致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势头被扼杀，其实拉美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四，靠借债来获得福利资源。这种模式主要是靠借内债和外债两种形式来运作的。葡萄牙（P）、爱尔兰（I）、意大利（I）、希腊（G）以及西班牙（S），被称为欧洲“Pigs”。为了赢得选票，政府许诺高福利，透支几代人的社会财富来兑现竞选承诺，甚至不惜大举借外债，以高负债支撑高福利，寅吃卯粮，最终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第五，直接采取赤裸裸的掠夺主义来获得福利收入。从古到今，引起大规模战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国内财富已经满足不了过度福利的需求，从而引发对外扩张。这种掠夺行为，给世界各国人民都带来了太多惨痛的教训。

如今，这种过度福利模式并没有消失，而且采取了各种变种形式，比如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形式，对世界和平危险最大。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危险最近又在抬头，而且跟选举制结合在一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三、腐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阻碍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二战”后的案例主要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东南亚各国，以及南非、叙利亚等。这些国家很早就跨过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后长期陷入其中，绝大多数至今还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而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相对较少，国际上公认的也就是日本、韩国等国，以及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少数几个单一城市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 2006 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和创新不足，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种长时期的发展停滞即为“中等收入陷阱”。尽管有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概括来看，严重的公权腐败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特征。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透明国际的报告显示清廉指数与人均 GDP 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清廉指数越高的国家，人均 GDP 也相应越高。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来看，日本、韩国、新加

坡、中国台湾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遵循了“社会性腐败威胁——强力反腐败——形成社会清廉机制——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并最终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共同路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阿根廷、东南亚各国则在反腐败这条阵线上“集体沦陷”。拉美地区的对比最为明显，该地区是全球腐败重灾区，而唯独乌拉圭和智利两个国家清廉指数排名高居全球第 19 位和第 22 位（2013 年），两国 2012 年人均 GDP 也分别达到 14707 美元和 15410 美元，携手成为拉美地区首批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国家。

从理论上观察，公权腐败及其引发的社会腐败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产生衰退。首先，公权腐败形成各类特殊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实施。公权腐败导致国家机器沦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攫取财富的工具，这些利益集团不仅存在于公权人员内部，而且会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腐败的利益链和分利集团联盟。而任何改革措施均有可能打破这种均衡，从而招致各方的阻挠，这就造成体制机制僵化，此时公权腐败演变为社会全面腐败。正如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腐败犹如马力强大的公共汽车，面对腐败人们要么是上公共汽车，像车上其他人一样，积极地参与腐败；要么是看着公共汽车跑，做一个不干涉腐败系统运行的旁观者；但挡在公共汽车前抵制腐败则是极其不明智的”。其次，公权腐败损害市场机制，降低经济要素配置效率。市场和权力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两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方面，公权腐败会内生性地催生公权扩张，从而严重压缩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降低经济要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公权腐败导致的权力寻租和特殊利益集团使得市场机制的作用大为降低，大量资源被用于贿赂、游说等非生产性活动，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率降低。即使是投入生产的资源也并未用于高质高效、能带来最大产出的项目，造成资源的低效使用。同时，“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人事腐败也不能做到“人尽其才”，必然造成人力资源的无效配置。再次，公权腐败影响创新和技术进步，阻碍经济转型升级。公权腐败能为各类分利集团快速带来巨额利益，具有十分显著的“示范效应”，容易诱导各类主体将原本用于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创新资源用于“托关系”“行贿”等腐败活动，导致整个社会用于技术研发的资源大幅下降，严重影响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生产力发展速度。而技术革新在一国经济发展尤其中等收入阶段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中又尤为重要。最后，公权腐败损害社会稳定，危及经济持续发展。在中等收入阶段，社会的不公平性本来就会凸显。公权腐败导致政府决策和行为的目标发生扭曲，不再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将维护和促进各分利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在这种结构下，政府政策往往是为了个别分利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全社会利益，造成并加深二元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造成政治动荡，无法为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对较少，他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后来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开展了持续性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相关措施也不断递进、完善、系统化和制度化，保障了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国家健康发展。例如日本，人们一般将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美国援助、出口导向战略、科教等方面，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是必要条件。战后一开始日本就强调“法治主义”理念，并于 1947 年在美国的帮助下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对公务员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都作了严格细致的规定和限制。这部法律对日后公务员体系建设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后来日本又陆陆续续地出台、修整、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尤其对各项罪责进行了明确细致的划定，很好地堵住了行贿受贿的法律漏洞。除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外，日本还有着健全的反腐败机构，这些机构通常都具有很高的独立性，从而保证其行使职能。另外，新闻媒体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也很明显，不但揭露出了多宗大案要案，而且还对各级公务员行为发挥着持续性的监督作用。日本的政治腐败比较严重。与美国和欧洲都不同，战后日本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政商勾结的“金权政治”，加之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以及“政治献金”制度，给腐败交易行为提供了温床，导致日本高层腐败问题迭出。党魁、议员、政府高级官员组成各种特殊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进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中发挥了非常消极的负面作用。世纪之交，日本相继制定实施了《公务员伦理法》和《公务员伦理规章》，除了继续加大对基层公务员的约束外，对高级别官员的约束力也不断增强。至 2013 年，日本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 18 位。

再来看看韩国。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李承晚政权奉行旧朝鲜的官僚体制和作风，加之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权力过度集中，催生了以行政腐败为主要形式的公权腐败，经济发展也基本陷于停滞，到 1961 年韩国人均 GDP 只有 91 美元。后来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在其掌权的 18 年时间里（1961—1979 年），依靠坚决的领袖意志和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推行铁腕治腐，开展了自上而下、持续性、大规模的“庶政刷新”反腐运动，维护了经济发展秩序，造就了“汉江奇迹”。人均 GDP 由 1961 年的 91 美元升至 1980 年的 1674 美元，增长了近 20 倍。朴正熙时期的反腐败措施主要表现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强力措施能够在短时间内对腐败起到遏制作用。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方面，经济发展为公权腐败带来新的寻租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之前的反腐败运动主要是“人治”方式展开，并非“法治”，因此一旦反腐力度减弱，腐败就再次卷土重来。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并未解决，加之“强政府”的模式也带来巨大的腐败空间，朴正熙被刺后的两任总统（全斗焕、卢泰愚）期间，韩国制度

性腐败开始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92年金泳三上台之后，韩国终于开始从制度上系统性地抑制公权腐败，通过《公务员伦理法》修正案，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金融账户实名制（之前这些制度屡立屡废），并设立了财产公开真相了解特别委员会，专门保证这些制度的严格执行。实践证明这些制度有效限制了公权腐败，保障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之后的继任者也并没有停止反腐的脚步，继续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腐败预防法》《公职腐败调查处罚法》《反腐败—透明社会协议》等一系列反腐方案，并加大了反腐司法机构的独立性，鼓励更多民众参与监督检察，从制度上形成了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由于持续有效且不断递进的反腐措施，韩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后虽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新世纪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经济发展有所波动，但至今仍然稳居高收入国家行列。

新加坡也是如此。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权利时，腐败盛行，其中集体性贪污行为尤为严重。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政府通过长期的反腐败行动，使得新加坡逐渐成为目前全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1960年，新加坡颁布了《防止贪污法》，从惩罚条款、对举报人的保护、对与代理人进行非法交易的惩罚、调查取证等多个方面对反腐败做了具体的规定，该法案的实行大大减少了腐败行为的空间。此后新加坡又先后七次对法案进行改进，并又陆续颁布了《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防止贪污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法律法规。另外，新加坡的公务道德考评体系也非常有特色，它将公职人员的日常生活纳入了腐败监管体系内。到20世纪70年代初，新加坡的腐败情况大为好转。新加坡在加大惩治和监管力度的同时，实行高薪养廉政策。通过提高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降低贪腐的意愿。1973年后，通过四次提高公职人员福利，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公务员待遇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新加坡还从贪污腐败的事后处置入手，在1989年出台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加大对贪污所得利益的处罚力度。这两方面的“组合出击”，使得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大大上升。另外，新加坡从文化上也对腐败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李光耀执政期间，发扬儒家文化，提出了新加坡人的行为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认为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并以社区为基础进行提倡，使得腐败在新加坡的文化观念中成为社会公敌。纵观新加坡的反腐历程，不仅社会进步成果非常显著，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也蒸蒸日上。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就成功晋级为高收入国家；到90年代中期，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

相反的案例是拉美国家腐败蔓延并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教训。学术界一般将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为进口替代战略失误、政局不稳定、贫富差距

扩大等因素。而实际上，更深层次去分析会发现，公权腐败不仅是直接因素，还会间接诱发或放大其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其负面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更为严重。例如，公权腐败阻碍了拉美产业体系完善与技术进步，从而使其进口替代战略的目标难以实现。20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拉美国家普遍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政府采取了高关税、进口配额、产业保护等政策组合，旨在用本国工业生产的产品替代进口。但在公权腐败的环境下，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身产业免受竞争、获得更多政府资助，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行贿，攫取垄断利润，而不是用于产业体系完善与技术进步或创新上，这使得经济升级难以实现。再如，公权腐败会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并使社会陷入混乱。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拉美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实施市场化与产权私有化改革。但是在此过程中官僚权贵与商人结成利益联盟，部分公权人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寻租”，积极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甚至与国际资本勾结，通过暗箱操作贱卖国有资产、中饱私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为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埋下了种子。贪腐泛滥、权钱交易导致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拉美经济社会秩序受到破坏，进而加剧了政局动荡。

诚然，拉美国家也逐渐意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但总体效果却不理想，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思。一是在体制转型期的大背景下，拉美国家对腐败发展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缺乏清晰深刻的认识，致使公权腐败肆意蔓延难以遏制。长期军人威权统治结束以后，拉美国家处于向政治民主化过渡的体制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体制机制不健全并存，由于缺乏足够的约束与制衡，公权广泛干预经济领域，各类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公权腐败泛滥。更重要的是，拉美国家并没能清晰认识到体制转型期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解决腐败的紧迫性。当时的政客们也大多缺乏反腐的政治意愿和有力举措，最终导致腐败泛滥，失去了反腐的最佳机遇期。二是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反腐方略，并且具体措施的实际可操作性差。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而拉美国家应对腐败的政策往往缺乏整体规划，单独出台的反腐措施往往收效甚微。并且，具体政策往往不符合实际国情，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执行。例如，1993 年巴西仿照欧美国家制定了公共采购法，目的是避免政府采购时出现腐败行为，但因相关规定不符合国情、执法人员专业能力欠缺而导致成效不佳。三是反腐机构缺乏独立性且权力有限，难以肩负反腐重任。尽管许多拉美国家设置了反腐机构，但大多缺乏独立性。即便有的国家设置了独立反腐机构，也往往缺少强制执行能力和权威。例如，阿根廷反腐办公室的权限就十分有限，其负责人任免受制于行政部门，因而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怎样避免经济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以从国际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总结出以下几条。

第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尽量减少公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只有政府逐步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权力寻租的根源才能真正消除。反之，如果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反腐败最多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韩国朴正熙时期依靠“铁腕治腐”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强政府”的体制还是使得腐败问题在其后的两任总统期间死灰复燃，最后只能借助体制革新才得到真正改观。

第二，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政府各项行为，压缩权力寻租的操作空间。虽然政府应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但是其在经济社会中的活动不可避免，很多时候甚至是必要的。然而，这些必要的政府行为必须用细致完备的法律法规条款加以规范，使得权力寻租丧失活动空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莫不如此。另外，完善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也尤为重要，拉美地区的教训表明，这一过程会带来巨大的腐败空间，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寻租行为将可能加速蔓延。

第三，加强公务员伦理建设，规范其日常行为，并建立财产公示和金融实名制度。除了政府行为这样显形的干预外，公务员日常行为也能够对经济活动施加间接或潜在影响，从而滋生寻租机会。因此，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非常重视公务员伦理建设，出台《公务员伦理法》《公务员伦理规章》等相关法律，将公务员日常行为纳入腐败监管体系。另外，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也非常重要，比如在韩国，虽然由于推行阻力很大，这两项制度历经几任总统才得以真正实施，但是一经实施它们就对反腐败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四，加大腐败惩治力度，对于腐败行为决不姑息。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大惩罚力度对于抑制腐败行为具有较强的预防作用。在日本，“可能一顿不该吃的饭就会导致丢官”，新加坡也是如此；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拉美地区则是“拿了几百万美金也可能不会丢官”。加大腐败行为惩治力度需要从法律上对各项罪责清晰界定，对惩罚措施进行明确，同时还要能够保证法律条款得到真正履行，做到决不手软、决不姑息。

第五，建立统一的具有较高独立性的反腐败机构，提升其相对权限。反腐败机构不在多，关键要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机构多反而不利于协调，给腐败分子留下钻空子的空间。而要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它就必须有较高的独立性和较大的权限。在这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制度是全世界的典范。而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失败，原因也在于尽管不少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反腐败机构，但大多缺乏独立性，也不具备法律执行的强制力，在反腐败中缺乏权威，所发挥的作用严重不足。

第六，提高全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度，鼓励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反腐需要编织起一张发现、揭露腐败行为的恢恢巨网，使腐败行为无处藏身。因此除了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反腐机构外，全社会的广泛积极参与也非常重要，而媒体所发挥的监督作用尤为关键。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通过立法保证各种媒体能够较为自由地对政府和公务员的各项行为进行监督，日本几任前首相的贪腐大案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揭露于世。

第七，适当采取高薪养廉政策，使拥有权利者不愿腐败。公务员建设不能一味要求他们发扬奉献精神，接受较低的收入水平。否则就会出现优秀公务员离职，整体素质降低；或者公务员怠工，政府效率下降；或者公务员在高压情况下仍然顶风作案，产生更加严重的腐败问题。治理腐败最终还是要回到公务员建设上来，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做法比较成功，它通过高薪养廉政策，使得公务员在合法收入下依然能够有体面的生活条件，贪腐行为的意愿大为降低。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上接第 48 页)

是不行的，只靠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与香港开展合作也是做不成的。必须要由中央下决心把这件事当做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头等大事，要把它纳入到国家战略之中，鼎力打造这个至关重要的 4.0 产业经济走廊。只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要这么做，只要中央政府也认为这种措施是可以来救香港经济的，那么什么困难都应该是可以克服的。所以，中央政府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只要中央政府有决心，就可以去说服（实际上是命令）香港特首应该怎么做。因为香港与内地不一样，是一个行政特区，特首需要去说服民众，说服立法会，也需要通过香港的立法程序。通过这样做，也可以让香港政府树立起新的威信，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管理社会和引领香港经济前行和产业转型的强政府。

另一方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的“特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为这个特区中的“特区”制订特殊的政策，这些特殊政策是包括香港政府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不可能制订和实施的。如果香港政府能够按照中央决策，把这件事作为香港的一个发展大战略提出来，那将为香港赶上亚洲四小龙中其他三小龙提供一次极其重要的机会，甚至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香港仍然可以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

责任编辑：沈家文

特朗普经济政策实施的概率 及其成效分析

谷源洋

摘要：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抛出了系列经济主张，受到热议，反响不一。特朗普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将依据党内外和国内外反应，对已提出的经济主张进行校正，使其内外经济思路逐渐清晰、明朗，形成新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然而，真正实施起来会遭到党内外和国内外的掣肘，内部固有矛盾及对现实政策产生的分歧亦将显现出来。特朗普刺激经济的几大重要举措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需要给予客观分析，并有待于实践验证。

关键词：特朗普 经济理念 重振制造业 美国利益优先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中心主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涉及相互紧密关联的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重振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再创伟大。

一、特朗普对内经济理念的基本思路

特朗普放言在任期内要把美国经济增长率提高到年均增长 3.5%~4% 的水平，将美国经济送入强劲增长的“快车道”，创造 2500 万个就业岗位，夯实“全球第一”的经济基础。采取的措施是开源节流，改善投资环境，扩大财政支出，发展实体经济，包括大规

模减税，改革税收制度。计划未来 10 年将联邦个人所得税率由七档，简化为三档，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 35% 降至 15%~20%。通过税收优惠，鼓励美国跨国公司将积累在海外的利润汇回国内，对股东小于 100 人的中小企业征收 15% 的统一税率。增加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通过提供税收抵免，吸引私人企业或公司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将以“美国制造”来为建筑、钢铁等行业创造就业；修订奥巴马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放松政府对银行业的管制；取消煤炭和油气开采限制，加速制造业振兴；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用新的方案替而代之。“医改法案”是民主党人的多年追求，已让 880 万美国人获得了医疗保险，使完全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群体从 2011 年的 15.7% 降为不到 9%。如果年内特朗普提不出更加优惠的方案，使这个庞大群体的利益受到威胁与伤害的话，那么就将直接影响到共和党在 2018 年的中期选举。奥巴马自信地声称，乐见共和党人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并强调即使是有了替代方案，共和党人也无法全部否定他的“医改法案”成就。

二、特朗普对外经济理念的基本思路

特朗普对外经济理念与思路服务于对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形成内外经济政策的相互呼应，基本要义是保护美国市场，鼓励资金和就业回流，减少海外财政支出。为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及内阁成员指责德国和日本利用被严重低估的欧元和日元取得对美贸易优势，声称要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① 起诉中国和墨西哥对美贸易的不公平补贴行为，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 35% 的关税；削减海外企业税收，促使资金回归制造业；反对奥巴马 2016 年 8 月提出的《清洁电力计划》和 2016 年 9 月批准的《巴黎气候协定》，痛斥《巴黎气候协定》绿色革命阻碍美国制造业发展和能源开发，是人为制造的“骗局”，要砍掉对《巴黎气候协定》的资金支持，解除在公共土地上勘探化石燃料的限制；减少美国海外驻军支出，日本和韩国要 100% 承担美国驻军支出，否则将撤出日韩驻军；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制造业岗位流失和中产阶级萎缩，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或脱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美墨边界由美国纳税人先出钱修筑“隔离墙”，最后让墨西哥把钱再返还美国，并驱赶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确保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美国社会安全。

^①按照 1988 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美国财政部自当年起每年都须向国会提交汇率政策报告，并判断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操纵汇率”，其标准有三条：是否对美国拥有严重双边贸易顺差，即对美国拥有超过 200 亿美元的顺差；是否存在实质性的经常账户顺差，即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 3%；是否存在持续、单边的汇率干预。目前，在美国财政部监测的 12 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尚没有一个国家同时符合上述三大标准——笔者。

特朗普言论涉及到的国家以不同方式予以了回应。日本首相安倍表示驻日美军经费应由日美“合理”分担；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压力下同意与美国重启 NAFTA 谈判，但墨西哥总统培尼亚表示绝不会接受有辱国家和人民尊严的事，绝不会为特朗普主张修建的边界“隔离墙”买单；法国前总统奥朗德说“法国不允许任何人或国家质疑巴黎气候协定”。按照《巴黎气候协定》的规定，一国政府如果批准了该协定，四年内不能退出。特朗普任命强烈反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斯科特·普鲁伊特出任联邦环保署署长，意味着即便不能退出协定，也要发难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和《巴黎气候协定》，不会严格执行奥巴马政府做出的减排承诺，将采取减少预算等手段，削弱相关部门的作用。废除《巴黎气候协定》为取消煤炭和开采油气限制排除了障碍，有利美国实现能源自足。然而，能源自足或能源独立并非是特朗普的首推，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就已提出了“国家能源独立计划”，此后得到历届政府的支持。不同的是跨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蒂勒森出任国务卿，预示着特朗普政府的能源自足或能源独立政策将更加激进，通过注重美国本土油气资源开发，放松油气开发监管，鼓励企业在大陆礁层钻探石油，以减少石油进口依赖度，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一个国家的能源独立不是说这个国家的所有能源消费都能自给自足，而是说这个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可控，其宏观经济、社会稳定和外交政策不为能源对外依存所绑架。^① 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 2035 年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石油进口降低到 30% 以下，届时方可说美国基本上达到了能源独立的目标。特朗普回归传统化石能源大发展轨道是其能源独立政策的重要保障，^② 但在任期内实现不了能源独立的宿愿，而且市场力量将助推美国经济向低碳化方向和可再生能源方向发展，特朗普等发起的“环境去监管化”难以扭转美国减排的大趋势。

三、特朗普经济政策实施的概率与成效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牵动着全球经济神经。与奥巴马推行的经济政策相比，特朗普在基建、再工业化、能源自足等方面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只是推行力度有所增强，但在医疗改革、银行监管、财政体系及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等方面则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总体看，特朗普的内外经济政策具有针对性、激进性、利己性、迷惑性。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坚持兑现竞选时做出的承诺，尽管执政时的说辞与竞选时的政策存在一些差异，但并非完全是疯子的“一派胡言”。通过税收体系改革和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护美国人就业岗位和增加工资等主张，既能让美国经济界感到振奋，又能受到社会底层和中

^①林伯强：《从美国能源独立看中国能源安全》，《中国证券报》2017 年 1 月 11 日。

^②同上。

产阶层欢迎。然而，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会遭遇到党内外和国内外的掣肘。特朗普刺激经济的几个重要举措能否如愿以偿，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需要给予客观分析，并有待实践验证。

（一）两党政治斗争及资金缺口抑制基建计划落实

特朗普宣称美国需要建立更加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因而“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备受关注。该基建投资计划中最重的是公路建设。美国道路交通设施多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此后几十年，投资和维护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不断下降，导致设施陈旧老化，设施质量在全球排名第 19 位，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不相匹配，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急需改造、修缮、重建。然而，交通基建工程需要巨额投资，按照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估计，2020 年前美国需要投资 1.6 万亿美元才能改变交通设施质量差的面貌。2016—2025 年，美国基建投资存在 1.44 万亿美元的缺口。尤其随基建成本不断升高，美国偏远各州基建更加难以从市场上获得融资，如果没有联邦政府资金支持，其基建计划根本无法落实。

特朗普为解决基建等投资问题采取了四种方式：收缩联邦政府人员招聘规模，减少国内外支出；调动私人投资；增加联邦政府投资；解除银行向企业贷款禁令。这四种方式无可质疑。为撬动私人部门资金，联邦政府对私人部门参与股权融资提供税收抵免，但税收抵免能调动出多少资金尚不清楚。鼓励跨国企业资金回流的诱惑以及通过政治高压政策的两种手段，最终能有多少资金回流美国亦是未知数。高盛集团预测 2017 年大约有 2000 亿美元回流美国，这仅是一种预测而已，并不太靠谱。尤其基建等项目投资周期长，即便资金从境外回流，主要是流向有利可图的股市还是投向基建和制造业，短期内也难以确定。特朗普曾说过联邦政府资金要优先安排给基础设施建设，但联邦政府资金能否直接用来支持基建投资，在其内部还存在争议。按美国基建投资程序，先要有地方和州政府的资金投入，联邦政府才能提供资金扶持。奥巴马 2009 年推出的财政刺激方案中也强调了增加基建投入，但最终落实的资金只有预算资金的 1/3 左右。特朗普面对的状况可能要好些，但依然面临“两难选择”，政府对基建投资太少则无济于事，而投资盘子过大又难以在国会通过。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公共支出方面一直存在分歧，拖累基建投资的落实。奥巴马曾多次尝试增加基建投资，但提案均在国会中遭到否决。直到 2015 年 12 月，国会众参两院才通过了《恢复美国地面交通法》的基建法案，为美国 2016 年至 2020 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3050 亿美元。尽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但并不意味特朗普的基建投资提案会一帆风顺地通过，基建投资计划真正落地尚面临多重挑战。

如果特朗普走运，一切顺顺当当，从 2017 年中开始启动基建计划，要走完法律程序、预算资金到位、完成施工准备方案，最快也要到 2018 年中期，基础设施建设才有可能初显效果。特朗普的基建计划能对美国经济增长发挥“兴奋剂作用”，但对经济拉动作用究竟有多大，取决于投资规模、进展速度以及两党相互制约的程度。

（二）减税增支面临债务上限压力

企业税收关乎于企业竞争力。1986 年 10 月，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1986 年税收法案》，把美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从 46% 下调并固定在 35% 的水平上，因而增强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过去 30 年，其他发达经济体不断降低税收负担，美国反而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公司税率最高的国家，导致从 1982 年至今，有超过 70 余家美国公司将其总部迁移到海外，并把其利润留在境外。有人估计这些避税金额为 1.5 万亿美元，也有人估计为 2.4 万亿美元。特朗普采取“软硬两手”迫使企业和资金回流。所谓“软”措施，就是通过减税让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汇回国内，将就业岗位留在美国本土；所谓“硬”措施，就是施加“威逼+惩罚”，特朗普 2016 年 12 月 4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公开警告美国公司“如果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那将犯下代价非常高昂的错误”，亦即将取消联邦政府的采购合同和征收高额“边境税”。“胡萝卜加大棒”的两种手段已使一些美国跨国企业宣布在美国本土扩大投资，但更多的企业在观望和等待，最终企业的去留决定于税收、成本、关税等综合效应。由于美国的工资和培训成本高昂，有些跨国公司不可能放弃海外经营，海外利润也不可能全部回流。特别是新税改涉及到的麻烦问题远多于其他领域。参加民主党 2016 年总统大选候选人角逐的桑德斯参议员指责说，让纳税人补贴来“垦请”大公司保留在美国的工作岗位，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特朗普大规模减税，压缩了财政收入，增加基建投资和扩大军费开支，增加了财政支出，使财政收入与支出难以实现平衡。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测算，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在未来 10 年联邦财政收入将减少约 6 万亿美元，把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推升 26 个百分点。2008 年以来，联邦政府债务急剧增加，截至 2016 年底，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 20 万亿美元，再提高债务法定配额，必须通过国会讨论和批准，考虑到扩大债务规模的风险，国会与政府间的博弈难以避免。为防止新政府部门“停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或许有可能允许特朗普适度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联邦收入下降和联邦开支增加，将驱使预算赤字大幅上升，奥巴马主政的 2016 财年（从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9 月）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为 5873 亿美元，较上财年增长 34%，占 GDP 的 3.2%。由于开支增速超过收入增速，特朗普寄希望于提高国债上限，为基建项目等投资筹集资金。购买新国债不仅推动利息支出增加，也将使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增加。高盛集团预测在特朗普对美

国企业减税的潜在财政计划下，2017 财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将从 2016 财年的 3.2% 飙升到 5%，约为 9600 亿美元，到 2018 财年将增加到占 GDP 的 6.1%，约为 1.2 万亿美元。特朗普不会不考虑到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不断累积的风险，但特朗普的思维逻辑是共和党奉行的经济政策将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繁荣了，财政收入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特朗普相信在经济底数增大的基础上，即使是财政赤字增量和存量扩大，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也不会很高，甚至有可能下降。然而，伴随经济向好，通胀上涨，美联储必然加快货币正常化步伐，导致基准利率提升和美元指数保持高位。市场普遍预测，2017 年美国通胀率和就业率变化将允许美联储提高加息节奏，这既加重联邦政府偿债负担，又增加企业成本，影响企业出口，扩大贸易逆差，最终制约经济增长。这些挑战与特朗普的承诺及其理念背道而驰。

（三）重振制造业的余地 and 空间不大

美国早就完成了工业化，步入“后工业社会”，制造业产值仅占 GDP 的 12% 左右，服务业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美国制造业的外移及在国内的衰落，主要是由美国产业结构虚拟化，金融过度自由化与其实体经济相脱节、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加剧、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必然结果。然而，特朗普和纳瓦罗等人却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在国内通过刺激性方案提振美国制造业，另一方面通过保护政策减少贸易逆差，吸引制造业和就业岗位回归美国本土。实际上对企业产生抑制性作用的因素是大幅度提高商品进口关税，为此以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Paul Ryan）为首的共和党议员提出了边境调节税议案，对美国的进口商品（在境外制造而在美国消费的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而对在美国生产的、销往海外的商品则予以免税。这一关税的设计适用于所有企业，无论企业总部在哪里，对企业出售给美国的商品都要课以 20% 的关税。“边境税”属税制改革范畴，直接效果是推升美国通胀和减少进口，有益于纠正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失衡状态。从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看，受全球需求疲软和美元升值等因素影响，2016 年美国出口总额为 2.21 万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2.3%，进口总额为 2.71 万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8%，美国全年贸易赤字为 5023 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 3470 亿美元，较上年减少 201 亿美元，对日本、德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赤字分别为 690 亿美元、650 亿美元、630 亿美元。^① 如果美国政府再调整贸易统计方法，将“进入美国后立即再出口的商品”不被列为出口商品，而归入进口类商品，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进一步扩大，这将成为特朗普推行市场保护的又一依据。然而，开征“边境税”的代价是美国的贸易伙伴

^①资料来源：《美国逆差数字重燃中国对特朗普贸易战的担忧》，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2017 年 2 月 9 日。

把“边境税”视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果这些国家效仿特朗普的做法，那么美国出口企业将会同样遭受到贸易壁垒，直接伤害到美国企业。

特朗普号召美国人要“买美国货”，美国企业要“雇美国人”，指责中国和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实行不公平贸易，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导致就业的流失。然而，事实是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商品出口，大部分商品恰恰是美国已不再生产而又急需的消费品。这些质好价低的商品为满足美国人民的生活需求及发展高技术产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有利因素是能源价格低，减税后企业负担轻，但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则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如果特朗普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用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去生产替代从新兴市场国家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美国人所需生活必需品价格势必大幅上涨。但共和党的要员正在极力说服特朗普支持对美国进口商品征税，而对美国出口商品予以免税。与其鲜明对照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 110 个成员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协定》，并宣布从即日起正式生效。《贸易便利化协定》是 1995 年 WTO 成立以来达成的首个多边贸易协定，也是《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取得的“里程碑式”进展，加速推动全球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将使全球贸易额每年增加 1 万亿美元。

特朗普关税制度变革必然会遭受到国内外企业的抵制和反对，美国零售巨头认为边境调节税将推高消费者价格，损害零售业利益，而美国出口大户通用电气、波音等公司则予以支持；国际贸易专家表示“边境税”不符合 WTO 规则；欧盟已开始做向 WTO 起诉美国征收“边境税”的准备；限制在境外投资而把产品销往国内的美国和他国企业，大多设在墨西哥，关闭美墨边界和征收“边境税”势将产生更多的贸易争端。墨西哥也准备向 WTO 起诉美国，加拿大亦表示将以“合适的方式”予以回击。特朗普新税制方案的出台不会很顺利。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外投资并将其产品在国外当地销售的企业以及在多国生产，是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很难搬回美国。^① 奥巴马的再工业化和特朗普的重振制造业，对美国而言有其必要，但实践表明，美国试图发展制造业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奥巴马“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只完成了大约 50%~60%，特朗普重振制造业之路究竟能走远，人们将拭目以待。

（四）放松金融监管的作用与风险

为避免 2008 年金融危机再度爆发，美国国会于 2010 年 7 月批准《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银行必须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每年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进行压

^①资料来源：21 世纪经济记者对中国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的采访，2017 年 1 月 13 日。

力测试、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措施，其核心规则是加强对华尔街银行业的监管，限制银行从事高风险投机性交易活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化解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多次抨击华尔街的贪婪，但特朗普任命的经济和财政高官却来自华尔街，让这些人掌握了经济大权，他们奉行的主张与传统上共和党“去金融监管”相一致，更易让特朗普放松金融监管。特朗普多次发泄不满地说“经营好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其原因在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规则和条例限制，因而必须废除这些规则和条款。2017 年 2 月 3 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和一份总统备忘录，要求财政部按照新确立的原则，对现行金融行业监管法律法规进行重新审查，这一命令为推动全面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案》铺了路。废除《法案》中阻碍银行借贷部分的内容，利于企业获得融资及银行业盈利，并可减少金融监管成本，但放松银行监管亦有可能使华尔街重返从事高风险融资的老路，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美国带头搞起来的，制定了金融监管的高标准，现特朗普又要“去金融监管”，使国际金融监管失去了合作的“锚”，令国际金融合作努力陷入尴尬困局。2017 年 1 月 9 日彭博新闻社网站显示，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特朗普放松金融管制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美联储副主席费舍尔表示《多德·弗兰克法案》会有所调整，但不会废除，任何有关该法案的改革都不会过于激进地放宽银行业的资本要求。显著降低银行的资本会弱化金融系统的安全性。短期看，特朗普重新审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行政命令，其实际意义不大。首先，美国财政部能否按特朗普要求，在 100 天内拿出一份重新审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新方案，尚属不确定性因素。其次，新法令的通过和生效绝非易事。根据美国法律规定，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案》需要经国会讨论并通过，即使是全部共和党议员同意修订《法案》，仍需争取到多位民主党议员支持。

（五）“美国利益优先”难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共和党的传统政策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然而，2016 年 7 月，美国共和党公布的竞选纲领宣称“美国经济最伟大的资产是辛苦劳动的美国人，共和党的首要工作就是创造就业，帮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①“我们需要将美国放在第一位来谈判更好的贸易协定。当那些协定没有充分地保护美国利益、美国主权时，那就拒绝它们”。^②因此，特朗普单方面宣布退出 TPP 和重新谈判或退出 NAFTA，是预料中的事件。在美国历史上，退出业已签署的双边和多边协定并不罕见。特朗普退出 TPP 削弱了美国的公信力。加拿大对重启 NAFTA 谈判虽持开放态度，但加方要求需要一个“双赢”的谈判。NAFTA 重新谈

①陆振华：《从新党纲看美国两党贸易政策》，《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8 月 3 日。

②陆振华：《从新党纲看美国两党贸易政策》，《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8 月 3 日。

判将给北美自由贸易规则及多边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和不可预期的影响。特朗普退出 TPP 和重新谈判 NAFTA 的目的：一是通过讨价还价，改变协定中对美不利条款，确保美国制造业发展和美国人就业。二是转变贸易谈判方式，从多边或区域贸易谈判转向单边谈判。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签署退出 TPP 令后，便立即宣布在其任期内不再签署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而转向“一对一”的双边贸易谈判，用双边 FTA 替代多边 FTA。这种贸易思维和模式的转变，旨在避免“外交资源的浪费”，不让相关国家“抱团”迫使美国作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让步。然而，在不同利益诉求下，美国与相关国家举行“一对一”的贸易谈判亦并非容易达成共识。特朗普现又提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不利于美国，威胁终止或重新谈判，而韩国政府官员则回应说假若美国这样做了，“就等于韩美不要交往了”。美日之间的双边贸易谈判无疑将重新掀起汽车和农产品贸易争执。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主张缩短美国政府发起“双反”调查的程序和周期，但强调商务部不是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双反”调查，提出将“互惠”和“同时让步”作为重新设计贸易协定范本的关键原则；宣称他更喜欢“胡萝卜”，而不是“大棒”，支持增长要更多地依靠刺激出口，但不是限制进口，这一点与特朗普所说的“买美国货”略显不同。

然而，特朗普等人却把劳动参与率不足和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人民不满归罪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正如他所说，他的选择“不是全球主义，而是美国主义”。从实践层面看，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并不是美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因，主因是美国资本运作方式出现了问题，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虚弱，劳动生产率不高，国际竞争力下降。从理论层面看，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作为双边贸易和区域贸易谈判的准则，不利于多边和区域 FTA 相关方妥善处理“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的关系。如果多边和区域 FTA 的各相关方都把“国家利益置于区域利益之上”，那么多边和区域 FTA 安排是搞不起来的，即便勉强搞成也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实际上 TPP 关于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及原产地等条款已经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及跨国公司利益，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门槛。但特朗普等仍认为这些实惠尚远远不够。美国坚持“美国利益优先”，而不考虑其他相关国家利益，就不会有任何国家能与美国就双边和多边贸易达成共识。“美国利益优先”贸易政策恐难推行，非对称的和短期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不可避免。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主席鲁弗斯·耶克萨说“历史证明，贸易限制不会让经济增长”。^① 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表示“自由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促进各国发展”。^② 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我们身处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想要与世界

^① 米哈伊尔·科罗斯季科夫：《美国公司反对改变对华政策》，俄罗斯《生意人报》2016 年 12 月 14 日。

^② 资料来源：共同社东京 2017 年 1 月 22 日电。

经济隔绝既不可能，也不可取”。^① 金砖国家所谓的创造者吉姆·奥尼尔认为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世界不会天翻地覆，国际贸易未必取决于综合性的贸易协定，资本、人员、商品和思想将继续不可阻挡地在全球流动。^② 实践和理论最终将迫使特朗普逐渐回归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潮流。

特朗普内外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再创伟大”和“全球第一”，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各项政策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会打些折扣，难以使美国经济重返历史的辉煌时期。从发展实践看，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 2.1%，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特朗普推出的内外经济政策有助于提升美国的经济增速，然而，国内外矛盾增多，国内外冲突加剧，特朗普要想在任期内，把美国年均 GDP 增长率提升到 3.5%~4%，或许是相当艰难的宿愿。有机构预测，由于短期内难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难以缩小贫富差距，相反，贫富差距有可能再扩大。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撰文称：最近 30 年间，美国经济制度的规则被改写为只惠及上层的少数人，80% 的人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特朗普的税收制度改革“将会最大程度有利于富人”，^③ 继续损害美国经济。因此，2017—2018 年美国经济增幅有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发布的年报预测，2017 财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3%，而联合国的预测值则仅为 1.9%。乐观预测，在实施政策和措施持续“发酵”的作用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年均 GDP 增长率可能为 2.5% 左右。市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系列经济刺激措施，最多能使美国经济实际增幅达到 2.7%~3%，并担心这种较高速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特朗普是一位“强势总统”，但不是“超人”，美国国内外“反特力量”很强，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并非都是“亲特派”，一道道的坎沟，一个个的陷阱，横竖在特朗普面前。在一些政策受挫后，“特朗普效应”或许将减退。中国既同美国民主党打过交道，也同美国共和党过过招，对特朗普的内外经济政策并不感到陌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当选总统后，说了些有损中国核心利益的话，对特朗普不应抱有过多的期待，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应对准备，理性处理特朗普任期内中美关系。

责任编辑：艾 冰

①资料来源：法新社柏林 2017 年 1 日 22 日电。

②资料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6 年 11 月 18 日。

③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美国经济需要特朗普做这些》，《瑞士商报》网站，2016 年 11 月 16 日。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战： 理论分析与中国应对策略^{*}

柯建飞 于立新

摘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势力抬头，贸易摩擦有升级趋势。借鉴兰切斯特方程的作战损耗理论，以两大国之间贸易数据为依据，模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国贸易战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贸易战对双方贸易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总体上，贸易顺差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考虑声誉激励的贸易战，持包容开放贸易政策国家的贸易先下降然后缓慢回升。在分析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拓展市场、提升自身实力、完善制度和预警应对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贸易战 兰切斯特方程 中美贸易

作者简介：柯建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
于立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一、引言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深入，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也日益紧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现代科学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战略研究”（项目号：14ZDA08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世界交往的扩大，资源、资金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日益频繁，推动各国商品与市场扩张，提高了资源全球配置的效率与各国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抓住了机遇，积极利用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刘志彪，2012；孙国强，2014）。现阶段，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导致的对经济全球化的担心仍然存在，贸易保护呼声不断。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低迷，贸易保护势力抬头，贸易保护的形式与特点呈现新的变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是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的主要诱发因素（薛荣久，2009；杨励、韩倩倩，2011）。大国的利益集团将引发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政府对政治捐献偏好的增加、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将单方面地提升贸易战规模，产品差异化的扩大将带动贸易战的全面升级（吴韧强、刘海云，2009）。贸易战对两国经济无疑是两败俱伤，Simon J. Evenett 和 Richard Baldwin（2010）指出，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削弱一国的竞争力，影响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加剧全球经济衰退。Krzysztof Pelc 和 Christina Davis（2011）也指出，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更大的贸易保护，也会放大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近代历史表明，凡是闭关锁国的国家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不仅仅是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还有科学和文化的进步。让全球化做得更好，寻找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推动投资和经济的进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Rob Gregory、Christian Henn（2012）等指出：避免这种不利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完成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以加强多边贸易承诺。毛燕琼（2011）则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了 WTO 解决贸易争端缺陷所在，指出了完善 WTO 在有效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与有效预防危机的机制。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大国，随着国际贸易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愈来愈频繁。中国贸易摩擦问题也一直是贸易领域研究的热点，相关文献也非常丰富。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中美互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美贸易摩擦自然是研究的重点。针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与对策，孙瑞华（2006）探讨了中国加入 WTO 后中美贸易摩擦传统的、新型的以及潜在的手段及其特点，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趋势产生的根本原因。尹翔硕、李春顶（2007）则从心理、制度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王亚飞（2009）认为，大国的兴起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原因。周千猷、周浩明（2011）认为中

美贸易摩擦是内部和外部贸易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针对中美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韩擎、杨斐然（2004）认为中美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形态不同，使得中美贸易摩擦有其产生的必然性。柳剑平、张兴泉（2011）认为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差异对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针对中美具体行业和产品贸易摩擦，陈炜、张琼（2009）运用博弈论对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刘军、王腊芳（2011）探讨了美国对中国钢铁反倾销案件。陈继勇、胡渊（2010）则分析了中国出口美国轮胎与美国轮胎制造业工人失业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美国对中国出口轮胎实施“特保”措施的不合理性。

一些学者也探讨了具体产品发生贸易战对中国的贸易、经济产生的影响，如农产品贸易战（陈永福、何秀荣，2001）；半导体贸易战（王中美，2009）等。但本质上这是两国间具体产品的贸易限制，应属于贸易摩擦的范畴，与全面的贸易战存在着区别。

本文试图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的背景下，探讨一种极端的情况，即两个贸易大国发生全面的贸易战时，借鉴兰切斯特方程的作战损耗理论，模拟贸易战对两国贸易的影响，同时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现状与趋势，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应对策略。

二、贸易战的理论分析

（一）兰切斯特方程

兰切斯特是第一个对战争过程中对抗关系的力量关系进行系统数学描述的科学家，他开创了把定量分析的方法应用到当时尚无严格理论可循的作战研究。兰切斯特方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战斗动力学。兰切斯特方程是在一定的战术假设前提下，建立一系列描述交战过程中交战双方兵力损耗的常微分方程组，以及由此得到关于兵力运用的一些战术原则（陈向勇，2011）。其基本方程如下：

$$\begin{cases} dx/dt = -f(x,y) - \alpha x + \mu(t) \\ dy/dt = -g(x,y) - \beta y + v(t) \\ x(0) = x_0, y(0) = y_0 \end{cases} \quad (1)$$

其中 $x(t)$ 、 $y(t)$ 表示交战双方时刻 t 的总兵力； $f(x,y)$ 、 $g(x,y)$ 表示每一方兵力损耗取决于双方的兵力与战斗力； αx 、 βy 表示双方的非战斗减员； $\mu(t)$ 、 $v(t)$ 表示双方的增援情况； $x(0)$ 、 $y(0)$ 则是双方其实投入的兵力。 $f(x,y)$ 、 $g(x,y)$ 具体的形式则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战争类型，如正规战、游击战和混合战。应用这个模型可以达到如下目的：1. 预测哪一方将获胜？2. 估计获胜的一方最后剩下多少士兵？3. 计算失败的一方开始时必须投入多少士兵才能赢得这场战斗？4. 战斗的持续时间。

(二) 两国之间贸易依存关系分析

甲乙两国的贸易关系如图 1 所示。甲乙两国之间的进出口构成了一个贸易系统。甲国对乙国的出口等于乙国从甲国的进口，而甲国从乙国的进口也是乙国对甲国的出口。所有与甲国的贸易往来构成了甲国的贸易总额，同样，所有与乙国贸易往来构成了乙国的贸易总额。甲乙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仅占各自贸易总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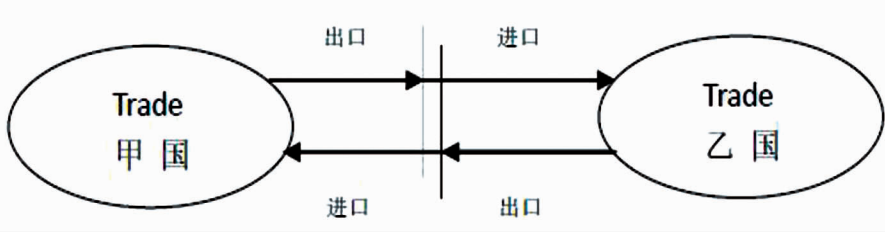


图 1 两国间的贸易依存关系

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拥有的要素比较优势不同，在两国贸易往来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贸易不平衡，即顺差或者逆差。甲国进出口的逆差是乙国的顺差。当贸易逆差的一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进口限制措施时，贸易摩擦就产生了。贸易摩擦是零星的并且是以贸易规则为基础的，是双边贸易过程发生的一种正常现象。当贸易摩擦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两国撇开了贸易规则而发生的大规模贸易冲突时，贸易战就产生了。比如，如果甲国对乙国商品一律征收高额关税，乙国据此作出反制，即是两国发生了贸易战。

由此可见，进口的大小是一个国家开展贸易战的“兵力”基础，当一国存在贸易逆差时，就掌握着开展贸易战的主动权。相对而言，存在贸易顺差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进口相对低，贸易战的“兵力”基础相对弱小。

借鉴兰切斯特方程，可以解释贸易战的机理。以甲国为例，假设方程组的第一个方程代表甲国贸易战的数学描述。 x 表示甲国的进口，是甲国开展贸易战的“兵力”基础。 αx 表示甲国开展贸易战的强度，是主动的，即甲国通过提高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方式主动减少进口。 $f(x,y)$ 是表示对方采取反制措施时对甲国进口影响程度。可以这样理解，当双方开展贸易战时，由于汇率波动、市场情绪悲观的因素也会对甲国进口造成影响。当然，相对于甲国主动限制进口而减少的 αx ， $f(x,y)$ 对 x 的影响可能要弱得多。 $f(x,y)$ 的具体形式，可能是线性的比例关系，也可能是非线性的关系。 $\mu(t)$ 则是其他因素对 x 的影响。

三、贸易战的演化趋势分析

(一) 两国间纯粹的贸易战

当甲乙两国进行贸易战时, 假设甲国 t 时刻贸易进口值为 $x(t)$, 乙国在 t 时刻贸易进口值为 $y(t)$, 将 $x(t)$ 、 $y(t)$ 都看作连续变量。关于双方贸易减少的情况, 一种合理的假设是, 在 Δt 时间内, 甲国进口数 Δx 将取决于甲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Δt 的长短, 以及乙国 Δt 内报复的强度 $f(x, y)$ 。假定是 $f(x, y)$ 一种正比关系, 则

$$\Delta x = -a_1 x \Delta t - b_1 y \Delta t \quad (2)$$

其中 a_1 代表了甲国贸易限制的强度, b_1 代表乙国贸易报复带来的对 Δx 的冲击强度。如果 $f(x, y)$ 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 则

$$\Delta x = -a_1 x \Delta t - b_1 xy \Delta t \quad (3)$$

类似地, 乙国 t 时刻贸易进口值为 $y(t)$ 满足:

$$\Delta y = -a_2 y \Delta t - b_2 xy \Delta t \quad (4)$$

其中 a_2 代表了乙国贸易报复的强度, b_2 代表甲国贸易限制带来的对 Δy 的冲击强度。

令 $\Delta t \rightarrow 0$, 得到两个微分方程

$$\frac{dx}{dt} = -a_1 x - b_1 xy, \frac{dy}{dt} = -a_2 y - b_2 xy. \quad (5)$$

从而得到联立微分方程组如下:

$$\begin{cases} dx/dt = -a_1 x - b_1 xy \\ dy/dt = -a_2 y - b_2 xy \\ x(0) = x_0, y(0) = y_0 \end{cases} \quad (6)$$

根据贸易战的实际背景, 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 方程组里的变量满足 $x(t) \geq 0$ 、 $y(t) \geq 0$, $x(t)$ 、 $y(t)$ 都是递减函数, 且随着 x 、 y 的减小, 其衰减速度也在降低。

一种极端的判断输赢的方法, 若有一方贸易进口值为零, 就标志着贸易战的结束。当然, 这与事实不符, 可以从 x 、 y 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 判断贸易战的演化趋势。

现假设甲乙两国贸易不平衡, $x_0 = 4500$, $y_0 = 1200$, 可以看出, 甲国存在贸易逆差, 乙国则是贸易顺差, 甲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主动发起贸易战, 乙国被迫采取应对措施。假设在一个单位时间内甲国贸易限制措施强度为 $a_1 = 0.05$, 乙国报复同样的强度 $a_2 = 0.05$ 。乙国贸易报复给甲国进口带来的冲击 $b_1 = 0.00005$, 甲国贸易限制给乙国进口带来的冲击 $b_2 = 0.000025$ 。 b_1 、 b_2 之所以这样取值, 是基于这样考虑, x_0 较大, 所带来的冲击也大, y_0 较小, 带来的冲击也较小。则方程组 (6) 转化为

$$\begin{cases} dx/dt = -0.05x - 0.00005xy \\ dy/dt = -0.05y - 0.000025xy \\ x(0) = 4500, y(0) = 1200 \end{cases} \tag{7}$$

根据求微分方程数值解函数 ode45，以 0.25 为时间点间隔，以 [0, 10] 为时间区间，以 (4500,1200) 为初始值，求解常微分方程组，并画出 $x(t)$ 与 $y(t)$ 的趋势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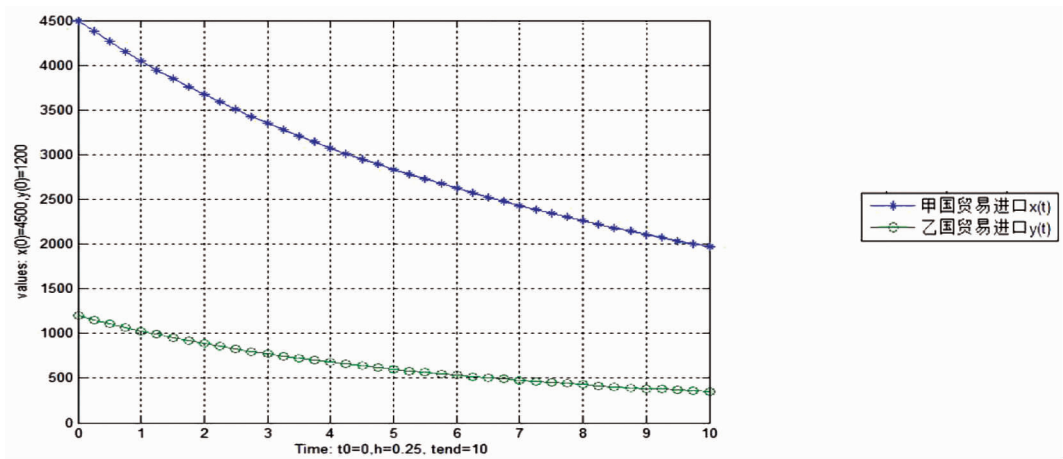


图 2 $x(t)$ 与 $y(t)$ 的演化趋势 ($a_1 = 0.05, a_2 = 0.05$)

从图 2 可以看出， $x(t)$ 与 $y(t)$ 都呈下降趋势，但 $x(t)$ 下降的速度要快一些。经过第一个时间点， $x(t)$ 从 4500 下降到 4100 左右， $y(t)$ 从 1200 下降到 1000 左右；经过第五个时间点， $y(t)$ 都已经降至初始值的 50%了， $x(t)$ 降至 2800 左右。可见贸易战是两国都输不起的游戏。相比较而言，对于贸易顺差的乙国，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就贸易数量变化而言， $x(t)$ 数量下降更大。

如果改变参数的取值，可以看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假设增加贸易战的强度，取 $a_1 = 0.1, a_2 = 0.01$ ，则 $x(t)$ 与 $y(t)$ 的变化趋势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在最初的几个时间点下降更多了，经过第一个时间点， $x(t)$ 已经低于 4000， $y(t)$ 低于 1000 了。

(二) 考虑贸易总额的贸易战

如果把两国的贸易总额引进方程，可以观察到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对各自贸易总额的影响。假设 T_1 表示甲国的贸易总额， T_2 表示乙国的贸易总额。在 Δt 时间内，甲国贸易总额变化 ΔT_1 将取决于 x, y 在 Δt 内的变化量，即

$$\Delta T_1 = -c_1 x \Delta t - d_1 y \Delta t \tag{8}$$

其中 c_1 表示进口占甲国贸易总额的比例， d_1 表示出口占甲国贸易总额的比例。

令 $\Delta t \rightarrow 0$ ，得到微分方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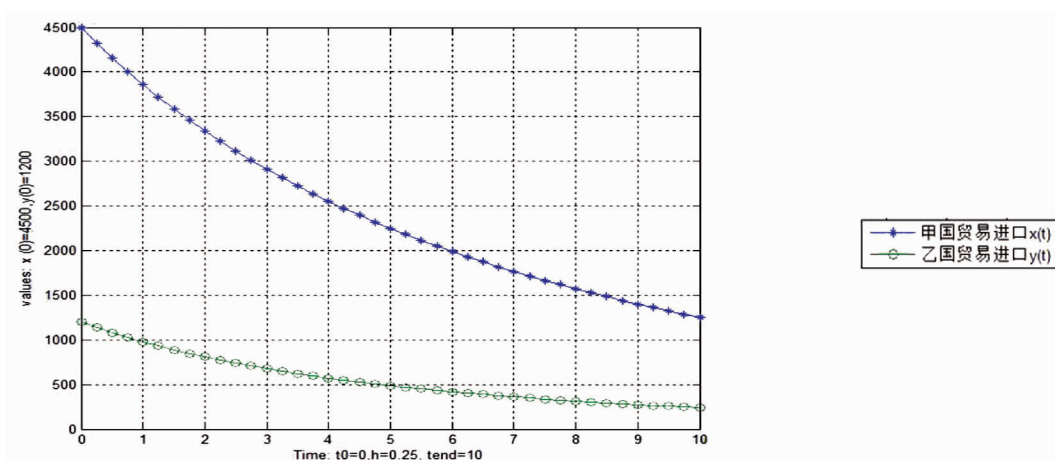


图3 $x(t)$ 与 $y(t)$ 的演化趋势 ($a_1 = 0.1, a_2 = 0.1$)

$$\frac{dT_1}{dt} = -c_1x - d_1y。 \quad (9)$$

同样可以得到乙国贸易总额的方程：

$$\frac{dT_2}{dt} = -c_2y - d_2y。 \quad (10)$$

则联立方程组为：

$$\begin{cases} dx/dt = -a_1x - b_1xy \\ dy/dt = -a_2y - b_2xy \\ dT_1/dt = -c_1x - d_1y \\ dT_2/dt = -c_2x - d_2y \\ x(0) = x_0, y(0) = y_0 \\ T_1(0) = t_{10}, T_2(0) = t_{20} \end{cases} \quad (11)$$

假定甲乙两国的贸易总额旗鼓相当，设 $T_1 = T_2 = 36000$ 。以 x_0, y_0 占 T_1, T_2 的比例为依据，并有所区别，假设 x 的变化对贸易逆差的甲国影响较小，对贸易顺差的乙国的影响较大，取 $c_1 = 0.3, c_2 = 0.35$ 。 y 的变化对甲国影响较大一些，对乙国的影响较小一些，取 $d_1 = 0.13, d_2 = 0.12$ 。贸易战的强度还是 $a_1 = a_2 = 0.1$ 。同样以 0.25 为时间点间隔，以 $[0, 10]$ 为时间区间，以 $(36000, 36000)$ 为 T_1, T_2 的初始值， x_0, y_0 保持不变，求解常微分方程组，并画出 $T_1(t)$ 与 $T_2(t)$ 的趋势图，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对贸易顺差的乙国影响较大，贸易总额下降较多，对贸易逆差的乙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一些。但贸易战都对两国的贸易总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第三个时间点时，甲国的贸易总额从 36000 降至 32000 左右，而乙国的贸易总

额已经低于 32000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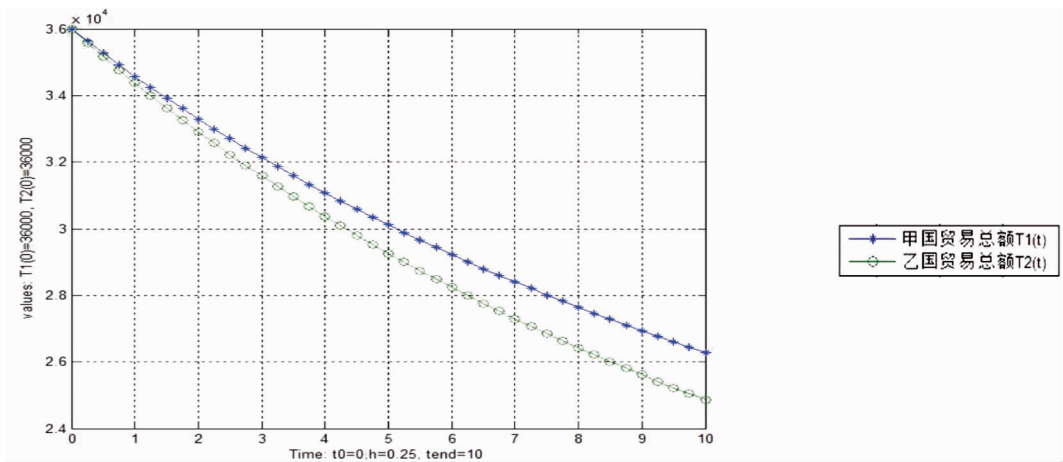


图 4 $T_1(t)$ 与 $T_2(t)$ 的演化趋势

（三）考虑声誉激励的贸易战

假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甲国对乙国发动的贸易战不得人心，而乙国包容开放的贸易政策受到其他国家的拥护和支持。甲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乙国的贸易产生了激励效应，这种激励效应体现在乙国贸易总额的增长上。一种合理的假设是这种激励效应不会在贸易战开始就发生作用，而是在贸易战发生之后的第二期产生作用，则联立方程组可表示为：

$$\begin{cases} dx/dt = -a_1x - b_1xy \\ dy/dt = -a_2y - b_2xy \\ dT_1/dt = -c_1x - d_1y \\ dT_2/dt = -c_2x - d_2y + e_2(-2)T_2 \\ x(0) = x_0, y(0) = y_0 \\ T_1(0) = t_{10}, T_2(0) = t_{20} \end{cases}$$

(12)

取 $e_2 = 0.02$ ，贸易战第二期开始产生作用，其他的初始值和系数保持不变。以 0.5 为时间点间隔，以 $[0, 20]$ 为时间区间，求解常微分方程组，并画出 $T_1(t)$ 与 $T_2(t)$ 的趋势图，如图 5 表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乙国的贸易总额从第二期开始有所变化，尽管还保持下降的趋势，但降幅有所减缓。在贸易战的第三期，两国的贸易总额相比较，乙国受到了激励的作用，在数值上超过了甲国。由于贸易战的惯性作用，乙国的贸易总额还是呈下降趋势，一直到第 13 期降至最低点，之后贸易总额开始回升。

借鉴兰切斯特方程的作战损耗理论考察假想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大国之间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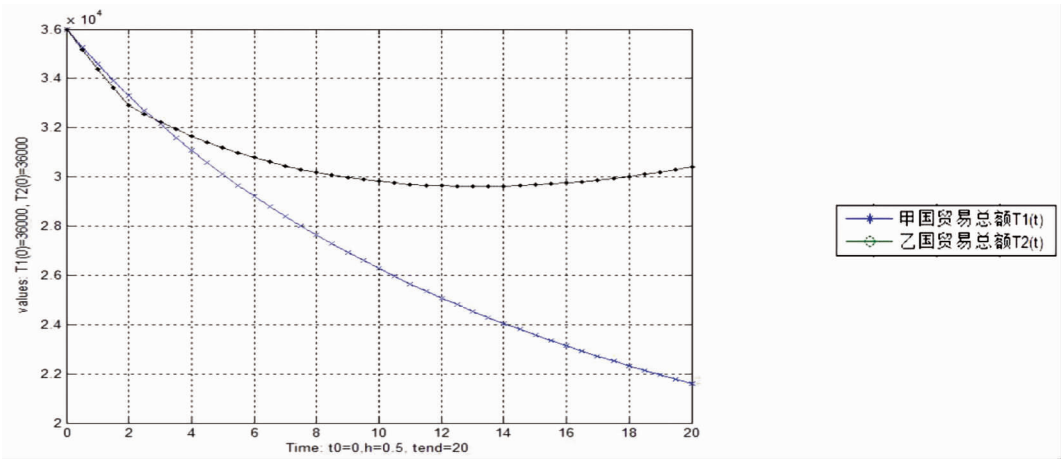


图5 考虑声誉激励的 $T_1(t)$ 与 $T_2(t)$ 的演化趋势

贸易战对两国贸易的影响。以两国之间贸易进出口数据为依据建立兰切斯特方程，结果显示，贸易战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两国各自的贸易总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总体上，贸易顺差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结果表明，持包容开放贸易政策而受到声誉激励的国家，贸易总额随着贸易战的展开先下降，再缓慢回升。

四、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后顾与前瞻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美两国经济体占据中心位置。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是全球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两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近年来，中美两国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两国经济关系开始向相互依存、互补的经济模式发展。中美双边贸易是中美经济关系中重要的一环，中美双边贸易对中美两国的经济贡献功不可没，研究表明中美贸易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雪、李惠民，2015）。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上互相依存的趋势也更为明显。金融危机后，中国占美国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比重不断上升，2015 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16 年在整个中国出口中占的比重达到 18%。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在近 20 年的中美贸易中，呈现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态势。就服务贸易而言，美国对中国一直保持顺差，但由于服务贸易规模较小，美国总体逆差状态依旧。首先，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美服务贸易失衡，这与美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重心转移以及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格局的变化有关。与中国相比，美国服务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近些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向服务行业转移，特别

是金融领域。美国对华服务行业直接投资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处于服务贸易顺差的地位。其次，中美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中美货物贸易失衡。尽管总体是美国对中国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但是从中美货物贸易结构上考察，美国对华非制成品贸易大体保持顺差，而制成品贸易表现为逆差，因此中美制成品贸易失衡是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核心（吕铀，2013）。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对华非制成品出口比例上升，抑制了美国对华制成品出口。中美货物贸易上的失衡，表面上看，对美国国内一些产业造成了冲击，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方面美国通过对外产业转移技术外溢，以达到其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使其一直处于全球产业结构的最顶端；另一方面，中国在初级产品及加工制成品方面对美国大量出口，实际上是用中国的资源供给美国生产与消费，造成中国环境恶化与资源减少，也可见我国还处在产业链中的低端。

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美贸易失衡是中美两国国内经济结构、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家分工的深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是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一部分，只要全球经济格局不发生明显的变化，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将会持续，中美贸易失衡也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扩大。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对象从具体产品、企业、产业等微观领域向政策、制度等宏观领域转变的趋势明显，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就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而言，已从单纯的反倾销演变到反补贴、再到反倾销和反补贴并用，进而发展到利用体现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 337 调查（王威，2013）。中美贸易不平衡使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较大风险，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随着美国进入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宣布重启 NAFTA 谈判。在特朗普（或贸易保护主义）看来，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接近 4000 亿美元，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流失、工人薪资水平降低的原因，由此必将增加反倾销、反补贴双反调查的比例，中美之间甚至有发生贸易战的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当代，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愈发频繁。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世界主要国家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如果两个大国之间开展贸易战无疑会伤及自身，也给对方带来极大的伤害，影响两国合作的整体氛围，甚至危害到世界经济。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一些国家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国内民众负面情绪高涨，贸易逆差成了其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以贸易战作为威胁手段的喧嚣声不止。如何破解大国间的囚徒博弈困境？通过对话与合作来

处理两国间的贸易问题是最佳的途径，双方可以共同努力，相互协商，加强合作，在贸易方面取得双赢的结果。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防范于未然。

五、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如今已是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推动力量。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是中国稳出口、稳增长的保证，也是应对贸易战的根本。

（一）积极倡导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对外开放，拓展世界市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三次浪潮，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正逐渐从规则的参与者转变成规则的制定者，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要积极倡导和参与自贸区战略全面布局，扩大对外开放，拓展世界市场，把推动自贸区建设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推进亚太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建设“一带一路”、发展跨洲自贸区，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李罗莎，20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凝聚中国智慧、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潮流和中国国内形势变化的新型开放战略，也是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的丰富源泉。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等，在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实现中国产业技术的升级。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也是拓展世界市场，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最有效的方式。因此，要继续深化“一带一路”战略，扩大、优化、升级中国与沿线国家现有的贸易关系与经济合作。

（二）加强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我们要看到中国贸易中存在的“短板”。在企业层面，要提升外贸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速度与步伐，通过产品创新、产业创造来增强中国制造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推动外贸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加快提升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

跨越。

要加速中国产业与贸易结构调整，提升产业标准，积极适应发达国家贸易投资新规则。中国不应将美欧启动国际高标准的新规则自贸区谈判视为威胁，而应将国际贸易投资高标准的新规则出台作为压力、动力和机遇，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和贸易投资调整潮流中及早谋划和应变。

要加快扩大服务业开放，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拓展新兴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已成为当今贸易领域一个重要趋势，国际新型贸易规则无不将服务贸易开放作为规则制定的重要内容。要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我国外贸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要不断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于新兴的服务贸易部门，诸如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知识或资金密集型行业，应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本的适度流入，促进其市场创新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于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即便目前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考虑到其在现代服务贸易中的核心作用，基于长期国际竞争的战略考虑，也应适当予以扶持。

（三）利用国内法和 WTO 法律规则进行抗衡

如果一国对中国产品发动大规模的反倾销、反补贴等形式的贸易战，中国完全可以按照国内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回应及报复，也可以在权衡利弊后，提交到 WTO 争端解决机制内进行解决。

从长远看，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建设不足，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同西方国家和 WTO 规则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中国作为 WTO 的成员国，应积极掌握、学习 WTO 规则，并充分利用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要修改、完善与 WTO 规则存在抵触的法律，以适应 WTO 相关规则，降低贸易战带来的严重损失。要完善中国的反倾销法、知识产权保护法以及保障措施等，以适应国际规则。在完善国内法的同时，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改进，争取话语权、主动权，维护我国的权益，降低贸易战的风险。

（四）建立、健全贸易预警机制，制定应对预案，后发制人

在应对贸易保护的技术层面上，应建立、健全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为了有效应对贸易战的侵害，中国需要建立一套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协作的、有效的预警机制。要制定应对预案，对出口市场份额较大、出口增长较快的产品要摸清底细，评估损失，做足准备。同时要研究对方可能的政策走向，从中寻找出后发制人的办法，并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要建立专

业化的应对团队，建立提供专门服务和咨询的专业团队，加强信息收集及游说能力，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政府层面，要加强政府间的对话沟通，协调好双边利益。

六、结束语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但当前一些国家出现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倾向，贸易保护势力抬头。在外部不确定性激增的当前，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贸易战可能会受到的巨大冲击，并为此做出积极准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向世界释放更加明确的开放信号也是团结更多力量的机会，应积极倡导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拓展世界市场。发展是硬道理，要积极推动中国产业与贸易结构调整，推动市场的公平准入、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务实性突破，才有可能在潜在的对抗中开拓有利局面，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第 5 期。
2. 孙国强：《中国全球化红利及未来》，《贵州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3. 薛荣久：《全球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危害与应对》，《国际贸易》2009 年第 3 期。
4. 杨励、韩倩倩：《经济全球化与危机背景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历史脉络、根源与前瞻》，《国际经贸探索》2011 年第 2 期。
5. 吴韧强、刘海云：《垄断竞争、利益集团与贸易战》，《经济学（季刊）》2009 年第 4 期。
6. 毛燕琼：《全球贸易战发展前景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7. 孙瑞华、张松丹：《中、美贸易摩擦手段新趋势及其原因探析》，《特区经济》2006 年第 9 期。
8. 尹翔硕、李春顶：《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财经问题研究》2007 年第 4 期。
9. 王亚飞：《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 年第 1 期。
10. 周千猷、周浩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久性趋势与对策》，《求索》2011 年第 6 期。
11. 韩擎、杨斐然：《从产业结构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原因及趋势》，《改革与开放》2004 年第 2 期。
12. 柳剑平、张兴泉：《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日贸易摩擦的比较

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1 年第 5 期。

13. 陈炜、张琼：《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14. 刘军、王腊芳：《反倾销与美中双边钢铁产业内贸易》，《求索》2011 年第 10 期。

15. 陈继勇、胡渊：《中美轮胎“特保案”实证研究》，《亚太经济》2010 年第 5 期。

16. 陈永福、何秀荣、于法稳：《中日蔬菜贸易战原因分析和对策探讨》，《世界经济研究》2001 年第 8 期。

17. 王中美：《贸易保护主义与产业转移趋势的逆行——以世界半导体贸易战为例》，《国际经贸探索》2010 年第 1 期。

18. 陈向勇：《基于 Lanchester 方程的若干作战指挥决策与对策问题研究》，东北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

19. 林毅夫、李永军：《必要的修正：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国际贸易》2001 年第 9 期。

20. 高雪、李惠民、齐晔：《中美贸易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碳泄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 年第 5 期。

21. 吕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

22. 王威：《中美贸易不平衡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分析》，《全球化》2013 年第 1 期。

23. 李罗莎：《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对策研究》，《全球化》2015 年第 1 期。

24. Krzysztof Pelc, and Christina Davis. Cooperation in Hard Times: Self - Restraint of Trade Prot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11.

25. Richard Baldwin, and Simon Evenett. In the Collapse of Global Trade, Murky protectionism, and the Crisi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20, *A VoxEU. org Publication*, 2009.

26. Rob Gregory, Christian, Brad McDonald, and Mika Saito. Trade and the Crisis: Protect or Reco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 01, 2012.

责任编辑：艾 冰

推动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建议

张影强

摘要：推动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议制定和完善国家网络空间战略布局，加快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积极开展“数字外交”，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我国网络空间影响力；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型中美网络空间关系；建立自主可控的网络空间技术体系，加强我国信息安全；建立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新体系，引领全球新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新体制，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主动设置网络空间治理“议程”，推动建立全球性网络空间治理新体系。

关键词：网络空间 全球治理 数字经济

作者简介：张影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一、网络空间为什么需要建立全球治理体系

第一，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最新统计数据和估算，2016 年全球网民数量达到 34.88 亿。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网民数量达到 24.65 亿，占到了总数量的 70%。而中国又是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 2016 年 7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7.10 亿，占全球网民的比例为 20.36%，占发展中国家网民的比例为 28.80%，占亚太地区网民的比例达到 41.20%。互联网经济对全球各国的贡献也是巨大

的，根据测算，2014 年美国、日本、英国的信息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分别为 69.39%、42.21%、44.21%，2015 年中国信息经济对 GDP 的贡献率已达到 68.6%，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被链接的世界》报告，2016 年，互联网经济总共将为二十国集团（G20）的 GDP 贡献 4.2 万亿美元。如果将互联网经济比作一个国家经济体，那么它将位居世界前五大国民经济之列，仅次于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排在德国之前。

第二，网络空间是一个由“私域”和“公域”共同构成的混合场域。虽然网络空间在某些层面上与全球公域具有相似的特征，但是互联网并不具有完全的全球公域属性。与陆地、海洋、天空等相似，网络空间是一个由私域和公域共同构成的混合场域。互联网为人类生活提供的是以“私”或“公”为属性的场域，其所产生的产品往往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然而，网络产品的“排他性”或“竞争性”反映在场域内，即是国家主权间的“排他性”或“竞争性”问题，也即是“私域”与“公域”的关系。支持互联网发展的基础设施都是由私人企业或国家所拥有或运营，若是完全脱离国家主权的约束也不现实。此外，互联网所有的信息和数据都需落地到服务器上，而服务器均有地属概念。

第三，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成为像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像水、电、气等公用基础设施等一样，成为国家、企业和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根服务器系统管理、IP 地址分配和管理、域名资源分配和管理等内容。除此之外，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还包括电网等公用网络、网络协议与物理线路，以及金融、银行和商业交易的数据资产等。

第四，网络空间产生的新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瓶颈。网络空间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诸如网络垃圾邮件、数据跨境流动、网络经济犯罪等，已经严重制约全球经济增长，成为新的风险和瓶颈，迫切需要全球治理并加以解决。垃圾邮件的滥发、网络病毒的蔓延以及铺天盖地的网络广告，这些违背效益的行为和方式与网络经济优势相伴而生，让网络空间不堪其苦。带有病毒的电子邮件还可能直接攻击或破坏邮件传输服务器或者电子邮件用户终端系统，造成整个系统的破坏和瘫痪。同时，随着云存储、云计算等技术与服务的日益普及，数据的主权归属就更复杂。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秘密等网络犯罪，严重冲击了现有的全球安全体系。

第五，网络信息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近年来，全球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引起各

国恐慌。“维基解密”网站的出现与“棱镜门事件”的揭露让网络敏感信息泄露的残酷现实呈现在公众面前，也让网络空间的负面效应以一种政治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 年高级持续性威胁（APT）防御厂商 Fireeye 发现并识别的独立 APT 活动共计 300 余次。云端恶意代码样本已从 2005 年的 40 万种增长至目前的 60 亿种。继“震网”和“棱镜门”事件之后，网络基础设施又遇全球性高危漏洞侵扰，Bash 漏洞影响范围遍及全球约 5 亿台服务器及其他网络设备，基础通信网络和金融、工控等重要信息系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二、当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几个重要判断

第一，美国在当前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当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美国占据显著优势。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公司与组织，掌握着网络空间治理核心资源，包括关键技术标准、应用、基础设施、核心硬件研发、生产以及商业化能力，控制着互联网的核心产业链；如互联网域名系统（DNS）管理，全球 DNS 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把控，而 ICANN 实际上是由美国政府控制，即由美国商务部国家电讯与信息管理局（NTIA）与 ICANN 签订管理合同，ICANN 受美国政府管理，向美国政府负责，ICANN 的相关政策需经美国政府的最后审批。2016 年 10 月 1 日，虽然 NTIA 将 DNS 管理权正式移交给 ICANN。但是从实际上来看，美国政府仍然对 ICANN 有较大的控制权限。美国商务部不干预 ICANN 的日常运作，但是美国政府通过合同保留了商务部 NTIA 对 DNS 职能的管理权限，美国对 ICANN 和 DNS 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国家。^①

第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主要有两大阵营体系。第一阵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它们均出台了相应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并提出反映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合作方式和治理理念。第二阵营是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棱镜门事件”发生后，中国、俄罗斯等国十分关注维护网络国家主权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美国以网络空间开放、自由为名，实际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一方面倡导所谓的网络空间绝对自由，另一方面又利用网络窃取别国信息。两大阵营中一方主张“网络自由至上”，另一方主张“网络主权至上”，双方意见分歧明显且难以消除。

第三，未来 10 年网络空间的主角是中美两国。中国互联网已经历了 22 个年头，在互

^①这一观点原文出自美国国会研究室（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发布的简报“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Domain Name System: Issues for Congress”。

联网发展的头 10 年，中国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第二个 10 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未来 10 年，不仅对中国，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也是非常关键的。2014 年，全球网民突破 30 亿，而中国拥有 6.49 亿网民。这一时期，美国占居全球互联网霸主地位，主导全球互联网。未来 10 年，下一个 30 亿的网民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未来互联网发展将是市场驱动为主的时代。届时，美国网民数量在全球占比不到 5%，而中国网民数量将会超过 20%，全球前 10 名的互联网公司，中国也将超过 50%，与美国企业平分天下。此外，中国核心芯片、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也在迎头赶上，中芯国际、京东方、华为等企业的创新能力已今非昔比，中美将主导未来十年网络空间。全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美是关键。

第四，中美网络空间存在诸多的利益冲突与分歧。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存在诸多分歧，例如经贸领域的政策和技术壁垒、政府行使网络空间管理权的限度、网络监管与审查、互联网自由与基本人权的关系等。是否承认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是否承认网络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允许信息审查，还是坚持绝对的信息自由流动等，体现出中美在利益和价值观上的根本性分歧。美国认为互联网是全球网民资源链接形成的网络，应该采取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模式，全球互联网是一个全球公域，反对国家机构来主导互联网管理，否定网络空间下的国家主权；而中国认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必须尊重网络主权，强调每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此外，美国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企业设置种种障碍，对中国企业投资设置双重标准。美国对中国设置技术出口限制措施，限制核心芯片、网络信息加密等技术出口。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美国大搞网络霸权主义，推行网络空间“全球公域”概念，散布“中国网络威胁论”；在外交上，中美网络空间冲突表现在两国人权问题、网络攻击上，并经常指责中国互联网的管制政策，对互联网干预较多。

第五，网络空间已成为大国博弈新制高点。目前，已有 50 多个国家颁布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仅美国就颁布了 40 多份与网络信息安全有关的文件。美国设立了“网络办公室”，颁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和“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14 年 2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美国“网络安全框架”。此外，英国出台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成立了网络安全办公室和网络安全运行中心。法国成立了“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办公室”。德国出台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可见，以国家意志来保障网络空间安全与发展正成为各国的国家战略与核心竞争力，网络空间已成为培育新的国家比较优势的重要领域。在国际层面，北约、欧盟、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就网络安全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合作。2014 年 2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会晤时专门提出要建设独立的欧洲互联网，

取代当前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三、中国推动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机遇与挑战

（一）重要机遇

第一，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实力日益增强。经过 22 年的发展，中国已是名符其实的互联网大国。首先，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10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占比达 92.5%。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1.7%，超全球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8.1 个百分点。中国域名总数增至 3698 万个。中国国家域名“.CN”注册量达到 1950 万个（占中国域名总数的 52.7%），年增长率达到 19.2%。应用方面，中国在第三方应用商店、电子商务等领域都全球领先。互联网海外上市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截止到 2015 年底，中国拥有 328 家互联网相关上市企业，其中 61 家在美国上市，市值规模合计 7.85 万亿元，相当于中国股市总市值的 25.6%。

第二，数字经济与美国平分秋色。在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新阶段的大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正在成为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能。庞大的网民和手机用户群体，使得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增长。2008 年中国网民数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网民第一大国。到 2014 年，形成了百度、阿里、腾讯（BAT）三大世界级巨头领衔的中国互联网产业梯队，仅次于美国，而领先于其他国家，形成了全球网络空间事实上中美两强的基本格局。埃森哲公司 2016 年发布的《数字颠覆：增长倍增器》报告测算，2015 年美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占 GDP 的 33%，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占 GDP 的 10.5%。该报告同时预测，数字化程度的优化将在 2020 年使中国 GDP 增加 3.7%，对应增加 5270 亿美元；而美国增加 2.1%，即 4210 亿美元。目前，中国有 3 家企业进入全球上市互联网企业市值排名前 10 强，有 10 家企业进入前 30 强、5 家 ICT 制造企业进入全球 500 强。

第三，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较大进展。中国信息产业自主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突破和掌握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应用软件等领域科技进步取得了较大突破，数字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字集群通信、光通信等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万亿次大规模计算机系统、国产高性能计算机和服务器迈入国际前列，通用 CPU 等一批中、高端芯片研发成功并投入生产，集成电路设计水平取得新突破。目前，以华为海思为代表的中国芯片厂商的主要技术指标与国际主流厂商差距较

小。2015 年，华为手机芯片自给率从 30%提升到 70%。华为在 2015 年首次突破了 1 亿部手机出货量，居中国第一，全球仅在三星、苹果之后，是增速最快的手机厂家。2016 年 8 月 16 日，中国也发射了首颗全球量子通信卫星，标志着中国开始突破传统的互联网传输协议，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网络。

第四，斯诺登事件唤醒了全球网络主权意识。长期以来，互联网关键核心资源，包括根服务器、DNS、和 IP 地址资源等，均由美国主导。国际社会对此一直非常不满，ICANN 也因此一直饱受“合法性”质疑。2013 年“斯诺登事件”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两大阵营”力量发生改变，美欧主导的全球互联网治理阵营开始出现离心倾向，各国互联网治理权意识空前高涨，各欧洲国家纷纷提出要重塑全球互联网治理格局，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欧委会明确提出为确保网络安全，要力争分享互联网治理权。2013 年 10 月，包括 ICANN、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互联网社会、万维网协会以及五大区域性互联网地址注册机构在内的重要互联网机构联合发布声明，共同谴责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呼吁实现 ICANN 国际化。2016 年 10 月 1 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 NTIA 将 DNS 管理权正式移交给 ICANN，标志着互联网迈出走向全球共治的重要一步。

（二）面临的挑战

第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当前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技术的核心关键技术主要由外国企业控制。除华为等极少数公司外，中国信息技术公司尚处于产业链下游，并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智能手机的关键部件或技术，大部分都来源于国外厂商。移动终端操作系统也被谷歌、安卓和苹果 iOS 控制。元器件市场几乎被外资垄断，少数国产品牌陷入低端竞争。以屏幕为例，由三星一家垄断；国产手机厂商在元器件方面严重依赖国外的厂商，如乐视、锤子、华为、联想等，产品附加值不高。

第二，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面临不公待遇。2016 年开始，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积极拓展全球市场。由于海外市场政治、政策、文化、市场需求等与国内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必然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内容安全、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互联网发展问题。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外国政府的安全审查。比如中兴和华为就是因为国家安全等问题，产品被美国限制进入。小米因为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连续被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进行了审查。还有百度和 360 公司海外手机软件（APP），也因为入口的问题受到审查。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中国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来保护国内互联网企业海外市场利益。

第三，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方案缺乏国际共鸣。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中国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被“孤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国主导的互联网治理理念被误解，认为要完全否定“多利益相关方治理”，而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这很难在国际上取得共识。中国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的中国模式，对互联网治理应坚持在国家网络主权的前提下，同意“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原则，主张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的治理方式。在这一模式下，强调数据保护、网络主权，支持中国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企业力量来逐渐影响全球网络治理规则。要在全球话语体系下，更有策略地讲好“中国方案”。原则上不搞与全球大多数国家提倡的不一样的方案，可以更加“灵活、务实、多元”利用好规则，将政府的位置往后撤一撤，并更有力地支持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民间团体、专业技术人才、国际组织来表达“中国方案”。

第四，西方国家提倡“网络自由”对网络主权不予承认。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网络自由”之名，大肆输出意识形态，鼓吹西方政治制度与模式，诋毁、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极大冲击。由于互联网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都掌握在美国或美国企业手里，美国对互联网拥有实际的支配权。美国主导的“网络自由”实际上就是网络霸权，利用不对等的互联网影响力对别的国家数据主权肆意侵犯。但实际上，美国所谓的“网络自由”也是执行“双重标准”，对涉及自身利益时宣誓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却通过“网络自由”的口号实现对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全方位的渗透，谋求不正当利益。

四、推动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建议

第一，制定和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做好中国网络空间战略顶层设计，包括网络空间的范围、战略目标、实现路径、时间路线图。整合各类资源，制定和完善国家网络空间战略布局，包括网络空间经济战略、网络空间国防战略、网络空间外交战略、网络空间社会治理战略、网络空间文化战略、网络空间人才战略。加快建设和部署未来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积极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积极部署全球量子通信网路，抢占未来网络空间制高点。加速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建设高速、宽带与泛在的网络基础设施，彻底解决电信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宽带网络全覆盖。

第二，积极开展“数字外交”战略。积极开展“数字外交”，利用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的优势，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信息

产业，推广互联网应用，形成更多和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提升中国数字经济的全球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提出“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对互联网治理应坚持在国家网络主权的前提下，拓展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的治理路径。可考虑建立以联合国框架下的数据主权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强调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地位平等，反对数据霸权，强调数据治理公平与开放。强化国际电信联盟的作用，增强其在全球互联网核心资源分配、全球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改善、缩小数字鸿沟、打击网络犯罪和建立全球数据流动规则等方面的作用。可考虑在现有 G20 的基础上，建立 D20（数据 20 国）“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加强 20 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沟通、协作和标准体系等方面的工作，建立定期磋商机制，共同探讨全球网络治理新体系。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利用美国与其盟友在网络空间利益的离心力和矛盾，加强与欧盟国家的沟通与合作。

第三，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挖掘新增用户潜力，继续扩大中国互联网用户、手机用户、电脑用户规模，保持中国全球移动互联网市场优势、提高网民素质、繁荣移动互联网应用市场、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打造面向全球市场的互联网大产业。加快改变外资控制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局面，培育更多自主的互联网企业。加快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成立国有资本投资管理公司，加强对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尽早解决互联网企业可变利益实体（VIE）公司治理问题，重新建立外资进入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的政策壁垒，防止外资大规模间接控制中国互联网行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互联网创新企业，并利用市场手段设立国家级互联网风险投资基金，大力扶持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创业企业；促进互联网市场竞争，培育多竞争市场主体，分散市场风险；加强对境外控制的互联网企业的监管，明确国家对于本国消费者数据的主权地位。

第四，构建新型中美网络空间关系。加强中美在政府层面、学术层面、产业层面、智库层面和社会层面等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互联网领域多层次交流与合作。强调中美网络空间合作共赢，在共同发展中实现信息安全可控，不允许网络安全的盲区存在，共同创造中美信息安全。要对美国谷歌、微软、IBM、雅虎、思科、高通等“八大金刚”在中国的业务进行全面摸底，尤其对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持续运行、国家机关网络基础设施和业务系统、重要工业控制系统等领域进行信息安全评估，全面掌握美国对中国信息控制和安装系统“后门”的事实，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对涉及中国国民经济安全运行、涉及社会新闻舆论导向、涉及国家信息化安全等方面的重大并购，要严格把关，加强审批、加强监控。

第五，建立自主可控的网络空间技术体系。在核心技术方面，应争取在集成电路芯

片与光电子器件、高性能计算机与软件、下一代互联网与信息安全、第五代移动通信与无线通信、数字电视与音视频编码等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支持企业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平台软件、大数据技术、未来互联网、平板显示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推广，着力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链，形成中国自主且可靠的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和产品体系。建设国家网络空间战略预警和积极防御平台，精确预警、准确溯源、有效反制，提升对国家级、有组织的网络攻击威胁的发现能力。在涉及国家机构安全运行及国计民生领域，国家应加强外资投资、并购审查和监管。支持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推动中国企业更多的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提高中国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地位和影响力。组织相关国内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专利联盟，交叉授权，互相促进，并汇集相关专利形成联合专利池。积极参与 ICANN 国际化改革，着手对新的网络协议标准、互联网域名管理和运行等研究。积极参与全球根服务器的竞争，制定更完善的下一代互联网根服务器运营规则，积极部署全球下一代互联网根服务器。

第六，建立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新体系。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合法的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支持措施，包括关税、配额、通关、物流等。加快推动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转向下一代贸易新规则，包括数字产品、数据流动、知识产权、隐私保护、技术保护等方面，率先制定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新规则，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创新“数字经济”统计体系和工作机制，将“数字经济”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科学评估“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资源节约、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税收等贡献。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收集数据，完善形成符合“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统计体系，建立“数字经济”价值衡量体系。

第七，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管理新体制。制定实施各行业互联网准入负面清单，允许各类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领域。最大限度减少事前准入限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立“先发展、后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发展新兴服务业。逐步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鼓励传统行业与互联网创新融合发展，支持传统行业服务创新，建立统一规范、透明民主的行业发展环境。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有序开放电信市场，加快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电信业务，促进通信设施共建共享，推动中国电信市场改革。建立更加扁平化的行政组织架构，继续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推动政府治理多元化，通过政府与私人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主体互动的方式，形成多方主体参与的密切合作机制，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启动《劳动法》修改程序，规范临时工、钟点工、兼职、劳务派遣等多种形式的法律关系，鼓励企业采取多

种形式用工。构建符合“平台+个人”新型社会劳动关系，调整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财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

第八，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建立覆盖全部企业和个人的全国统一信用信息网络平台，包括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善信用信息征集、存储、共享与应用等环节的制度，推动地方、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及互联互通。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黑名单”制度，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强化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逐步建立企业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信用档案，将其经营行为和个人信用有机结合。实行严格的征信企业牌照制，发展多元化的征信市场主体。建立国家机关与征信企业数据共享机制，建议公安部、人民银行、交通部、卫计委、统计及掌握大量业务数据的部门加快与企业数据共享。

第九，主动设置网络空间治理议程。继续利用“斯诺登”事件，提出网络主权的主张，主动设置网络空间治理新议程。全面动员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力量，积极参与现有的 ICCAN、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万维网联盟（W3C）、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IETF、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国际组织，扩大中国的影响力；积极利用好中国参与的多边机构与平台，包括 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界经济论坛（WEF）、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提出中国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国方案”，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中国主导的全球机制性网络空间治理平台，比如倡议成立 D20 机制，建立一个在 G20 框架下的数字经济治理平台，定期讨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共同推动建立全球性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清俐：《为全球网络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6 月 7 日第 1 版。
2. 黄少华、翟本瑞：《网络社会学——学科定位与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2016 年 7 月。
4. 夏燕：《网络空间的法理分析》，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
5. 杜雁芸：《数据时代国家数据主权问题研究》，《国际观察》2016 年第 3 期。
6. 陶文昭：《网络无政府主义及其治理》，《探索》2005 年第 1 期。
7. 杜雁芸：《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主权问题研究》，《国际观察》2016 年第 3 期。
8. 丛培影、黄日涵：《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国际展望》2016 年第 1 期。
9. 朱宏胜：《网络恐怖主义浅析》，《蚌埠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

-
10. 卿斯汉:《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信息安全》2015年第2期。
 11. 蔡翠红:《云时代数据主权概念及其运用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2期。
 12. 沈国麟:《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权和国家数据战略》,《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3. 陆首群:《中国互联网口述历史,互联网在中国迈出的第一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4. 董贞良:《英国政府网络安全实施纲要探析》,《环球瞭望》2014年第10期。
 15. 张绍武:《〈德国网络安全法〉对我国网络安全立法的启示》,《互联网前沿》2015年第31期。
 16. 刘山泉:《德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及其对我国网络安全法的启示》,《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5年第9期。
 17. 吴同:《美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的影响与应对》,《域外观察》2016年第2期。
 18. 刘承瑞、毕杰:《中日两国信息政策对比及启示》,《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5年第7期。
 19. 尹丽波、刘京娟、张慧敏:《紧扎安全篱笆的袋鼠之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解读》,《中国信息安全》2012年第7期。
 20. 王路:《世界主要国家网络空间治理情况》,《网络空间战略论坛》2013年第10期。
 21. 陈颀:《网络安全、网络战争与国际法:从〈塔林手册〉切入》,《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7期。
 22. 朱峰:《网络安全的国际法研究》,《网络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23. 杨泽伟主编:《联合国改革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 Michael Benedikt, Cyberspace. First Step,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pl22-123.

责任编辑:艾 冰

· 名人观察 ·

房地产两极分化与“城镇化”战略再思考

樊 纲

一、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

第一，有人认为现阶段房地产价格飙升是因为货币流动性增多。所有商品价格上涨都与货币有关。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但仅仅批判一般等价物无法解决问题，而且在某一时点上、某些阶段内，价格变化不一定是因为货币增长。近两年的货币增加量比前两年少，但为什么近两年房地产价格飙升，前两年不飙升？为什么货币不到三四线城市，都到一二线城市？为什么货币现在不到猪肉市场，而到房地产市场？为什么人们去年炒股，现在不炒？货币政策现在基本是中性的，不能紧缩，也不能增加。老百姓手里钱多是因为货币增多了，还是收入增长了？如果说房地产市场需求增加是因为贷款特别宽松，这其中有货币政策的问题，但近一年多贷款并没有特别宽松。所以，现在到底是不是因为货币增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是很容易辨别的。

第二，很多房地产商说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现在的地价高于过去的房价。但地价都是房地产商竞拍出来的，如果不是预计未来房子卖得比现在好，为什么竞拍土地？作为专业人士，需要理性分析这些问题，特别要冷静分析市场和市场预期。二三线城市现在有一个普遍说法是房价高了才能去库存。房价再涨可能会暂时解决一部分库存，但能把人留下吗？房子将来有人租，有人接手吗？房地产市场要有春夏秋冬的概念，有些波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正常的。目前房地产市场还不算低谷，而是已经进入逐步平稳的新阶段。

二、房地产两极分化现象与“城镇化”战略

过去一年，房地产市场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两极分化，即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这个话题讨论了很多年，实质就是城镇化战略的偏差问题。此次房地产市场出现两极分化，到了我们再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所谓城镇化和城市化，字面上没有太大差别，但在指导思想、具体政策、实际执行上是有差别的。

当前，推行多年的城镇化基本思路是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小城镇发展。但是，一

方面，人们还是往大城市聚集，大城市的规划一再突破，土地和公共产品不断受限，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进而导致城市拥挤，房价飙升。另一方面，一些小城镇鼓励发展产业、创造就业，但产业配套功能不完善，企业发展条件不足。人的选择是理性的，哪里有适宜的收入和较好的就业，就会去哪里。如果小城市提供不了，那么很可能小城市楼盘建成之日就是人口走光之时。这违背了城镇化的基本规律。城镇化在早期阶段一定是人往大城市聚集，因为大城市具有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能促进更多的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发展更完善的服务业，且拥有更先进的文化、更时尚的生活，这是年轻人所需要的。这就是城镇化的规律。

有人说，现在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小城镇发展得挺好。据笔者所知，近年发达国家其实也是特大城市在发展，但为什么有很多不错的小城镇？主要是因为西方与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有差别。西方用两三百年的漫长时间才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主要是到大城市发展。但二三十年后，开始有劳动力退休，特别是有社保以后，退休的人慢慢回到老宅居住，或重置新屋，把社保、高收入带回农村和小城镇，追求乡村生活，慢慢一些小城镇和村落都发展起来了。日本、韩国、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是在很短的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进程。在这个阶段内，一定是大城市首先发展，小城市人口流失；经过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退休的时候，人口才开始回流，小城市的人口才会慢慢稳定。因此，现在不是把小城镇做大规模的时候，小城镇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生态、保护好历史、保护好老宅、保护好文化，为将来人口回流打好基础，这是未来的趋势。但当前的城镇化战略，就是要发展小城市、小城镇。据说提出小城镇发展的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对他的学生说，在这个阶段小城镇可能发展不起来，先提小城镇可能是不对的。到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还不顺应城镇化规律，顺应中国 14 亿人口的大国会出现若干个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城市群、城市带的思路发展？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反思的时候，这不仅是政策问题，而是调整战略、调整指导思想的问题。

现在的楼市冰火两重天，进一步说明了房地产调控政策是有区域性的，不能一刀切，不能依赖一个宏观政策或一般性政策，而是要落实到每个地区，针对特殊问题进行特殊分析。真正改善中国房地产市场，需要通盘考虑房产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城镇化战略调整等方面，多措并举。可实际情况是，这些措施长时间无法推进实施，房产税、财产税这类经济调节机制到目前为止仍未进入国务院议程。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房地产市场需求大涨，政府就只能采取限购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从供给关系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如何从控制需求转向控制供给，城镇化战略调整是一个关键。现在国家开始积极建设“特色小镇”，能否真正扭转房地产市场的局面，还要看这些“特色小镇”能够创造多少就业，否则未必能真正发挥大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李蕊

· 宏观经济 ·

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展望

李 娣

摘要：随着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制度逐渐完善，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质量与效益逐渐改善，城乡面貌明显改观，城市群对新型城镇化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城镇化建设前期积累的产城不融合、“人”“地”矛盾、征地拆迁与城中村改造、公共服务水平落后于城镇化进程、城乡治理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解决问题迫在眉睫。2017 年随着各项政策与规划效应的逐渐释放，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效益继续提高，但还需加强制度设计，发展城市群经济，建设集约化城市，推进城乡治理体系建设。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城市群经济 城乡治理体系

作者简介：李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后。

2016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提高到 7.71 亿人，城镇化率不断攀升。但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 40%，我国 2.47 亿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但不是城市的户籍人口。而毋庸置疑的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大趋势已不可逆转，新型城镇化进展趋势明显。

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的新进展

2013 年，中共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近些年，我国政府通过规划引导、制度

建设、资金配套等手段，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断取得新进展。与 2008 年相比，我国城镇化率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城镇化率从 2008 年的 45.68% 提高到 2015 年的 56.1%，8 年时间提高了 10.4%，城镇常住人口从 6.07 亿人提高到 7.71 亿人；全国流动人口从 2.01 亿人上升为 2.47 亿人；全国农民工总量从 22542 万人上升到 27747 万人，增加了 5205 万人；外出农民工从 14041 万人上升到 16884 万人，增加 2843 万人。

（一）户籍制度改革快速推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4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加快户籍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的要求。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意见》出台后，各级政府全面贯彻执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北京率先出台取消农业户口统一登记改革措施。截止到 2016 年 11 月，包括北京在内的 30 个省份已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各地普遍提出取消农业户籍，这意味着“城里人”和“乡下人”二元户籍制度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在各省份出台方案基础上，2016 年 10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方案》提出了推进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主要目标。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公布《居住证暂行条例》，确立了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各地不断创造条件提供更好的服务。浙江、北京、贵州、吉林、河北、福建、湖南等多数省份已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以保障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与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为未来全面放开户籍制度打下基础。

（二）城市功能稳步优化

第一，棚户区改造快速推进。2013—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共改造各类棚户区住房 2080 万套、农村危房 1565 万户。在此基础上，2015 年 06 月 25 日国务院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指出 2015—2017 年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 1800 万套（其中 2015 年改造 580 万套），农村危房 1060 万户（其中 2015 年改造 432 万户）。据相关部门统计，截止到 2016 年 6 月份，全国已开工棚户区改造 401.64 万套，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66.9%，完成投资 6794 亿元。“十

二五”时期，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国累计开工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1359 万套，基本建成 1086 万套。

第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统筹城市地上地下设施规划建设，加强地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建道路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加强易涝点改造和防洪排涝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引起了各城市的重视。根据住建部统计，2015 年我国完成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 16204.4 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88%。其中，道路桥梁、轨道交通、园林绿化投资分别占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的 45.8%、22.9%和 9.8%。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 年我国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22.9%，比 2015 年增速提高 2.7 个百分点。我国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投资不断扩大，城市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但总体来看，国内目前已建综合管廊的规模较小，不管是从长度上还是密度上，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世界银行建议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5%）。我国城市管网建设投资依然严重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亟待加大投资，继续补齐“短板”。

第三，城乡面貌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近些年，各项政策的实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推动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新变化。据住建部统计，截至 2015 年末，城市用水普及率达 98.07%，燃气普及率 95.3%，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91.90%（其中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87.9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0.12%，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4.10%。截止到 2017 年 4 月，全国共有 244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年接待游客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城市空间集约化利用意识与水平也在逐渐提升，智慧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等新理念、新概念城市正逐渐走进人们视线。

（三）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

据住建部统计，2015 年末，全国设市城市 656 个，较 2014 年增加 3 个，城市城区户籍人口 3.94 亿人，暂住人口 0.66 亿人，分别较 2014 年增加 0.8 亿人和 0.06 亿人，城市建成区面积 5.21 万平方公里，较 2014 年增加 0.23 万平方公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与城市人口密度统计数据显示，2000 年前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快于人口密度增速，2000—2010 年城市人口集聚速度远快于建

成区面积增长速度，人口向城市集中趋势明显，也反映城市土地供给市场日趋缩紧。根据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显示：2010 年到 2015 年间，全国城镇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总体放缓。城镇住宅用地增速趋缓，增长向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偏移。城市正逐渐走上集约化发展道路，也折射出我国城镇化正朝着更高水准与质量方向转变，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 4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 15 个，100 万~400 万人口城市有 132 个，50 万~100 万人口的城市有 94 个，20 万~50 万以及 20 万以下人口的中小城市数量仅占城市总数的 19%，形成中小城市与 100 万以上人口城市数量上倒配的城镇体系。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很高，城市密度大，城市规模小，以 100 万以下人口的中小城市为主体，密集聚集形成高度发达的城市群。因此，未来新型城镇化应该以有序增加中小城市数量、提高中小城市发展质量为主攻方向，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四）城市群快速发展

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统筹实施以东、中、西与东北部地区为“四大板块”，“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为“三个支撑带”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大布局。2016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以“三大战略”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城市群和增长极。

第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推进。在 201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基础上，三地积极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协同发展持续推进。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的实施方案陆续出台。2016 年 2 月，《“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正式印发，确定了互联互通、加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任务，三地一盘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6 年上半年，我国京津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 34382.4 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10.1%，三次产业结构为 4.8:37.1:58.1。三地围绕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推进三地产业对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疏解非首都功能快速推进。2016 年底，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已累计疏解 33 家市场，2017 年将疏解剩下的 12 家市场。中央力推“交通先行”，三地也形成共识并积极行动。民航先行一步，京津冀机场全面管理一体化；以治理“断头路”为抓手的高速公路网一体化加快推进；作为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络的组成部分，轨道上的京津冀也日臻完善。在此基础上，2016 年 11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修编方案》，计划到 2020 年京津冀 1 亿多人口将逐渐迈进 1 小时交通圈。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的力度加大。2016 年三地联合制定印发了《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签订了《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生态率先突破框架协议》，完成了京津冀及周边七省区市重污染预警平台建设，联合制定了《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共同推进环境联合执法。上半年，京津冀三地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分别下降 9.2%、11.8%和 0.1%，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17.9%、12.5%和 20.3%。

第二，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6 年，云南省对《滇中城市群规划（2009—2030）》进行了优化调整，新的《滇中城市群规划（2016—2049）》公示稿中，滇中城市群增加了 7 个县市。2016 年 5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一年来，成渝城市群经济增速领跑全国，其中，重庆经济增速连续第 11 个季度排在全国第一。2016 年 12 月，贵州省政府原则同意《黔中城市群发展规划》，并要求省发展改革委认真组织实施，培育发展西部地区性城市群。2016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中原城市群成为国家级七大城市群之一。长江中游城市群推进制造业升级，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 年 4 月，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四省会城市签署协议，深层次推进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经济总量依然最为抢眼，位列全国各城市群之首。长三角傲人的成绩得益于城市化程度、城镇分布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成熟度比较高的世界级城市群。

第三，国内“一带一路”枢纽型城市布局初步形成。2016 年 11 月，“广州—南亚”班列从广州大朗驶出，途经成渝、拉萨西、日喀则西、中转吉隆口岸、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到 2016 年年底，“粤满欧”班列途径重庆、郑州、成都、苏州、义乌、广州、东莞等节点城市。合肥是“合新欧”货运班列上的重要城市，因此而跻身国家“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一带一路”枢纽型的城市，就是“一带一路”交汇点城市，主要包括大连、营口、天津、青岛、威海、连云港、上海、泉州、温州、宁波等等。“一带一路”推动了国内各城市间的互联互通。目前，从国家层面来说，亟需有一个总体的指导规划，加快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和地区连接。

总体而言，随着城市群建设理念深入推进，从最新 GDP 来看，“抱团”发展的城市群格局将日益明显。受技术进步、城市互联互通加速要素流动以及产业更新换代等因素影响，我国区域经济正由传统的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主体空间形态。

（五）特色小（城）镇与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

随着党的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中央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我国加快了农村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建设步伐。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成为城镇居民的美丽乡愁已经是城乡环境治理的主要内容。全国各地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大多把村镇规划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将成为我国未来五年村镇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坚持规划先行，认清各村镇、各城市优势与弱势，因势利导，加强特色乡镇建设，达到自觉保留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守住人们熟悉的自然风貌，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2016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特色小（城）镇建设经验交流会。全国各省市围绕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挖掘乡镇特色，通过特色乡镇、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引导各地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挖掘乡镇特色优势。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特色小镇的推荐数量，合计共159个名额。特色乡镇建设正在引导各地乡镇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探索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创新机制，夯实城镇产业基础，完善城镇服务功能，优化城镇生态环境，提升城镇发展品质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6年，全国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各级政府加大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人力与资金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村容村貌明显改变、村民生产与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农村的文明程度和农民的幸福指数显著提升，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美丽乡村建设不是一日之功，还需要依靠长效机制保障美丽乡村建设，要进一步发挥资金引导、技术进步、教育宣传、消费方式升级等多种手段的组合使用，强化人们习惯，提高村村户户参与建设家乡、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才能巩固美丽成果。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的同时，城镇化进程中多年累积的产城不融合、人地矛盾、城乡就业分化、征地拆迁与城中村改造等矛盾与问题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较为显著地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产城不融合问题

产业集聚是人口集聚的根本动力，产业发展带动人口就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形成城镇化现象。因此，城镇化是以产业发展为支撑的。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一线超大城市“一城独大”，三、四线城市“空心化”，产业发展分化严重，产城发展不融合问题，带来了人口集聚分化导致的房价分化严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难，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发挥城市在承载就业、集聚人口方面的优势。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产业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产业主要为传统产业，且支撑中小城市产业转型的各类要素缺乏，在产业转型中更多地表现为产业“空心化”；而产业“空心化”又导致人口流出，地方财政也随之流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从 1982 年的 657 万人增长到 2015 年的 2.47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8%。其中，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非户籍常住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分别是 40.7%、37.9%、36.73%，深圳则高达 68.8%。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人口呈现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的趋势，并且人口的流入和流出都集中在城市群。春节期间，人口流动最为密集的区域也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城市群。人口向东部城市群流动，也引发了这些区域城市房价疯涨。根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公布的 2016 年 10 月 27 个省会城市加上 4 个直辖市的住宅房价情况，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三大核心城市住宅均价分别为 46119、20524、23943 元，同比分别增长 32.78%、15.08% 和 38.14%；珠三角地区深圳、东莞等核心城市房屋均价分别为 55611、16983 元（深圳房价在 2015 年同比上涨 50% 的基础上，再次上涨 40% 多，东莞 2016 年 10 月同比上涨 77%）；2016 年 10 月北京市房屋均价为 52549 元，同比上涨 41.48%。而 2016 年地处中部地区的长株潭城市群湘潭、株洲等核心城市（三、四线）房价基本停滞在 3900、4500 元左右。房价在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形成分化，折射出三、四线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远不如一、二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因为产业基础好、产业集中度高、产业配套齐全，吸引各类产业集聚，带动人口就业及人口集聚，人口集聚形成较大消费规模与消费需求，反过来促进产业进一步集聚，形成正向累积循环效应，逐渐形成了一定区域内“一城独大”现象。

而各城市内部产城不融合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全国各地产业项目区在新建时，力求产业向园区集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了不少新区或开发区只有产业，几乎没有城市功能配套。单纯的工业园区与单纯的人居城区，外表上看，产业运行正常，但是，产城不融合条件下，带来产业工人高昂的通勤成本、城市交通拥堵、城市服务功能别扭以及商业环境缺失。产城不融合也导致城市运行效率与城市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城市发展潜力不足，甚至导致城市产业衰败，城市人口流失。

城市间产业发展不协同也是造成产城不融合的重要原因。同一区域内经济结构相似的

城市为争取企业落户自己城市，往往不顾自身技术、区位、发展基础等各类条件是否适合相关产业发展，形成了同一区域内城市间工业结构雷同、产品结构相似、同类产业竞争无序等现象，不仅造成了各类资源的浪费，也成为区域城市发展壮大、吸纳就业人口的瓶颈。

（二）“人”与“地”的矛盾问题

改革开放 30 多年，是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 30 多年，也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 30 多年，但也让中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我国巨量土地资源被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占有和消耗。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当下，建成区面积与城市人口呈线性增长。如果再将承载我国工业发展的各大小开发园区计算入内，粗略估计，我国各级各类园区用地面积占全国建设用地总面积 1/10 以上。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原老城区规模不断扩张，还催生了数量不少的新区。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统计显示，截至 2016 年 5 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 3500 多个，规划人口达到 34 亿，可容纳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城市数量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同时增长的情况下来看我国可耕地面积的变化情况。根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研究”项目的数据，2014 年前的 10 余年间，我国城镇面积扩张了 270%，但城镇人口只增加了 27.29%，土地城市化扩张速度已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2016 年 12 月 28 日，国土资源部发布最新的（2014 年启动调查）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结果显示，全国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 8029.15 万亩，比上一轮（2000—2003 年）调查时减少了约 3000 万亩，降幅接近三成。并且耕地后备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东部 11 个省份仅占 15.4%，接近枯竭水平。据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截至 2015 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 20.25 亿亩，2015 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 450 万亩，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 351 万亩，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 99 万亩。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显示，2009 年全国耕地为 20.3 亿亩（2004 年统计的数据是 18.36 亿亩），^① 据国土资源部调研，2014 年末全国耕地面积比 2009 年底已减少了 22 万公顷（0.3 亿亩），调查获得的数据中所显示的耕地面积还包括了一部分需要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和休耕，有相当数量耕地被污染无法耕种的；以及一定数量的因表土层破坏、地下水超采已影响耕种的耕地。此外，还存在有大批未经批准在农田里毁田建居民楼，而这类被侵占农田依然统计在基本农田数字里的情况。近些年通过占补平衡原则，开发、开垦、复垦土地数量替换了原

^①第二次调查耕地数据比基于第一次调查数据逐年变更到 2009 年的耕地数据多出 1358.7 万公顷（约 2 亿亩），主要是由于调查标准、技术方法的改进和农村税费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使调查数据更加全面、客观、准确。

有的优质农田，填补了数字，保持住了统计表上 18 亿亩耕地红线。总体而言，我国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一方面人口在小幅度递增，并不断向城市人口集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侵占耕地，可耕面积不断减少，形成的“人”“地”矛盾；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吸纳就业能力增强，农业从业人员向城市集中，农村土地抛荒，部分农村消失，形成的“人”“地”矛盾；此外还包括一方面是城市不断扩张，蚕食城市周边可耕土地，而另一方面是城市内部高楼林立与大面积的城中村并存，所隐含的“人”“地”矛盾。2016 年 10 月，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并行，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该《意见》力求为破解“人”“地”矛盾做有益探索。《意见》指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要通过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中最重要的监督权，来监督承包户，监督经营主体按照规定的用途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土地。但是还要观察“三权”分置实施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新的矛盾和问题；同时，推进实施中还必须统筹考虑与户籍制度配套改革，农业人口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问题，确保改革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求。

（三）征地拆迁与城中村改造面临的问题

随着各地城镇化进程加快，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土地财政。通过新区、新城建设，有些地方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以低价补偿方式征收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转手进行房地产开发，造成了三、四线城市数量巨大的商品房存量。与此同时，政府和开发商攫取高额利益，而部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以及征地过程中的不公开、不透明、不公平，引发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刑事案件等尖锐矛盾，并造成失地农民等长远社会问题。据 2015 年国家信访局公布 40 件涉农事件中，八成是由征地拆迁引发的。

我国各大城市都普遍存在城中村问题，城市开发过程中，规划没有跟上城镇化进程，同时，随着中心城区内的城中村征地拆迁成本不断攀升，政府、开发商更愿意选择城郊拆迁户少的农地进行开发，避重就轻导致城区内人口密度相对大一点的城中村不断被周边的高楼大厦包围。城中村内表现为：布局散乱、容积率低、建筑密度低、投入产出率低；城市的发展，使有些工业用地逐渐集中在黄金地段，与居民区混搭，配置不合理，一些淘汰类或禁止类产业在居民区生产，产生废气废渣，形成噪音，严重影响人民生活；随意搭建的棚户、危旧破败的厂房建筑、旧村庄居民居住配套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安全隐患多，社会治理任务繁重；城中村的破败也使得大部分居民不断转移出去，

形成闲置浪费，个别区域甚至出现空城、鬼城，造成了城镇化的低质与低效。

城中村改造在各地政府都有了一些初步的实践，2016 年 11 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试行）》对城市更新改造形成了初步指导意见，未来城市智能化、集约化发展，必将推动城中村改造在全国各大城市全面铺开。

（四）公共服务水平落后于城镇化进程问题

从 2007 年到 2015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了 10.19%，2005 年到 2015 年流动人口从 1.47 亿人增长到 2.47 亿人；年末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从 2.01 亿人上升到 8.58 亿人；基本医保参保人数从 2.23 亿人增加到 6.66 亿人。但是，2005 年到 2015 年，普通小学减少了 175688 所，初中减少了 10081 所，普通高中减少了 2852 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减少了 3264 所。2015 年，普通小学城区、镇区及乡村生师比分别为 18.96、18.01、14.57。在有些二、三、四线城市，普通小学、初中每班级人数几乎都在 65 人以上，有的城区小学班级人数近 100 人，形成城市“大班额”现象，“大班额”成为了不少城市的问题。2005 年到 2015 年，卫生医疗机构增加了 101322 所，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了 7.1 万所，但与 2000 年相比，却减少了 7.9 万所；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了一倍多，但基本医疗参保人数增加了 3 倍，并且城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的床位数与农村增加床位数基本相同。公共服务供给数量远没有达到充分实现“人的城镇化”对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数量需要，这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短板”。并且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分布不均、配置错位，引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房价严重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系统性风险增加等问题。

（五）城乡治理问题

我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并未出现类似美国、英国以及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中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作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核心大城市的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天津等，依然是处于产业、人口集聚的阶段，处于这些核心城市周边的副中心，多为与核心大城市发展差距巨大的地级市、县级城市甚至乡镇，周边副中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产业不发达，吸纳就业能力差。在城市群核心大城市吸虹效应的作用下，城市群总体呈现“一城独大”现象，核心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更是人口最集中的区域，致使这些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密度大、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症状”。

城镇化进程加速下的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五大理念，我国加大了特色小镇建设投资，以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但城镇化、工业化大背景下，如何解决农村、农业“空心化”问题依然是“十三五”期间

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难题。农村发展一方面要面临农业人口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等原因，致使农村劳动力缺乏，中西部地区农地抛荒严重；另一方面还面临城市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发展存在的土地流转难、进入门槛高等问题。同时，中西部地区多山地、丘陵，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发展现代农业存在一定自然瓶颈，农业生产效率低，对城市资金、技术、人才吸引力有限。一方面是农业、农村、中小城市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是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产业承载能力不足。如何统筹城乡、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

近两年，受全面推行营改增、企业经营困难、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因素影响，三、四线城市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连续下滑。尤其处于产业转型困难，产业不断“空心化”的中小城市，财政收入下滑更为严重。扶贫补贴、交通补贴、民生社保、公共设施投入等刚性支出加大，土地出让收入增长有限，隐性失业严重，社保欠账较多，财政收支矛盾加重，对人才、资金、技术吸引力进一步减退，形成恶性循环，将有可能进一步加深这些地区财政收支矛盾，城市间发展差距将可能进一步分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约束。

三、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展望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沿着已有的总体思路继续前进。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培育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通过加快提高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国际化水平，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形成大都市圈。进一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大中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城乡人口就业结构，提高城市承载人口就业的能力；引导产业项目在中小城市和县城布局，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配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镇，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推动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城乡协调和治理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引导城市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开辟农村广阔发展空间，建设美丽乡村。

针对当前主要问题，认真贯彻“十三五”规划五大理念，着力制度创新，推动城乡一体全面深化改革。

（一）构建城市群战略产业链，发展城市群经济

要解决现有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产城不融合、“一城独大”现象，必须逐渐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群经济，推动城市群内城市间产业战略联盟，实现产业在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合理布局，协调发展。

城市群应该根据产业链不同价值环节，以及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专业化要求，将产业链各环节科学布局到更加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不同城市，实现城市间由以单个企业为主的竞争向聚集众多单体企业的产业链竞争转变，形成城际产业战略联盟，建设城市群战略产业链。我国已规划 20 多个城市群，下一步各城市群要紧紧围绕城市群战略产业链建设，加强产业规划与设计。首先，要根据城市群现有的产业基础，产业发展趋势，明确城市群城际战略产业链；其次，把产业整合与城市群中各城市功能分工相结合，实现城市群内各城市错位发展；第三，培育和发展产业链各环节中的主导企业，要鼓励在城市群区域范围内，各城市主导企业要通过与产业链关联环节的主导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共同提升整个产业链与主导企业自身竞争力，最终实现各城市间产业协同发展。

要着力发展城市群经济，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已客观性地跨入城市群时代。要科学规划城市群，加强城市群经济研究，以城市群建设解决“大城市病”，以城市群为单元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城市群的全球竞争力。解决城市之间要素不流动、资源不共享、发展不协调、产业同质化、生态不平衡等各类问题。

（二）建设集约化城市

要着力破解城市“人”“地”矛盾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科学城市规划，推动城市合理功能分区，着力破解“城市病”；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城市更新，加快老旧城区、城中村改造，根据产业与城市发展需要，腾换原有工业土地，推动城市集约发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与效益。同时，要根据经济要素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合理控制新开发用地规模，优化对土地利用模式的监管；要充分认识到不同城市的扩张应该是不同的，可以考虑不同的地理、人口及人均收入增长状况、经济发展程度、产业发展趋势、单位土地效益等，授予产业集聚能力强、实体经济发达的城市更多的用地指标，让这些城市及城市群承载更多就业与人口，稀释土地要素成本，保障实体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健康稳定发展，保证稳增长、保就业需要。要着力破解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法律、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加强制度创新，跟进法律修改，切实解除实际生产生活中不适应发展需要的条条框框约束。要推动“多规合一”，提高土地总体规划、控制性详规等多个规划之间的衔接能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三）推进城乡治理体系建设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五大理念，进一步加大特色小镇建设投资，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要将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加强制度创新，引导现代农业发展，提高耕地农业产出效益，提高农民务农积极性，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引导社会各界关注“三农问题”，凝聚智慧，加强制度设计，推动社会资本、人才向农村流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引导基层改革，切实解决农村、城乡结合部、城市的社会治理问题。要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财权，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水平落后于城镇化水平的问题，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提高地方政府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等指导性文件提出的目标，到 2020 年，内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45% 左右。在各类改革举措纵深推进，集体发力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是不成问题的。可以预测，2016 年、2017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可达 57%、58% 以上，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实现 45%，还有赖于户籍制度改革更为完善的制度设计。2017 年，随着全国综合交通网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旅游业、为第二产业发展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渠道，人口向城市集中，生活性服务业也将吸纳一部分就业人口，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改革进一步推进，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疏散初显成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将继续在集聚人口、就业、经济总量等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城市群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群内区域协调能力不断改善，中西部城市群不断孕育成长。全国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逐渐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功能得以进一步优化，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基础得以进一步夯实。“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效应初见成效，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建设取得新的进展，但也要重视新的制度实施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完善制度。城乡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成绩得以巩固，城乡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参考文献：

1. 刘友金、罗登辉：《城际战略产业链与城市群发展战略》，《经济地理》2009 年第 4 期。
2. 唐琼：《城市发展应当集约化》，《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17 日。

责任编辑：艾 冰

中国创新城市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京沪建设国家创新城市专家研讨会综述

王日玥 徐晨阳 方子娴

摘要：未来科技中心必定以城市形态出现，这是一种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功能和核心机制的新的城市形态。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在适于创新的空间环境塑造上仍需大力改进。如何面对城市的不确定性，处理好创新型产业发展与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营造适于创新型企业发展的空间环境，是确立国际创新中心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创新的诞生、转化和辐射不必完全局限在城市的核心区范围之内。中小企业是创新城市的基础，一个城市是否是创新城市要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关键词：科技创新中心 创新城市 中小企业 科研成果转化

作者简介：王日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科研助理；

徐晨阳，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办公室行政助理；

方子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助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对北京做出“具有强大引领作用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形成全国‘高精尖’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和“构筑全球开放创新高地，打造全球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和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的战略定位；对上海做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布局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群”“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全面提升科技国际合作水平”和“打造全球科技创新网络重要枢纽，建设富有活力的世界创新城市”的战略定位。2016 年 12 月 3 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京沪建设国家创新城市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教育部、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专家出席会议，并就京沪创新城市建设的现状、问题、趋势与对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交流，为中国城市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从“科技创新中心”到“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认为，“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尽管使用的概念是“科技创新中心”，但不可以一般的“中心”论之。第一，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国家强大意志支配下的自觉行为，不同于以往的科技革命，也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它承载着改变国家命运与实现民族复兴的艰巨任务和使命。第二，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以城市为主体形态的现代化进程已催生了普遍的“城市病”和“城市危机”，构成了对知识生产力和科技创新的巨大热情及迫切需要，科技创新与城市化息息相关。第三，没有城市空间就不可能有科技创新。城市是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心，是各类科技创新要素和基础设施的大本营，世界上绝大多数创新都发生在城市中，尤其是最高层级的中心城市。创新能力很强的深圳未能跻身“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城市科学看来，科技创新不是简单的投资、建立机构、发布优惠政策，而是建设一个大平台。不仅要有良好的科研条件，还要能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不仅要有先进的仪器设备，还要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样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必定是健康和幸福的城市平台，城市为科技创新提供最优化的环境，科技创新则是城市的核心功能。因此，“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准确的表述和更完整的内涵应是“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未来的科技中心必定以城市形态出现，这是一种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功能和核心机制的新的城市形态，能够引领城市由传统的生产、制造和服务功能，转向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主的创新型城市。

二、国家中心城市视野下建设国家创新城市之路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改革中心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提出，作为创新发展的主体空间，国家中心城市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主要载体，需要为创

新提供适宜的环境，为不确定性提供多种发展的可能。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必须关注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为创新、变革营造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因为城市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是自由、平等、开放的，城市的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恰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创新产生的内在源泉。北京、上海作为中国城市的领头羊，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样板，需要在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创新发展上做出表率。这就要求对城市规划知识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创新与变革。城镇化未来做到知行合一，关键要通过新空间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构建，破解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需要的条块体制分割、部门利益之争，培育真正能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城镇化规划建设融为一体的服务型政府机构、新型城镇化运营商和智库，这才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

为适应创新产业发展，首先需要对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理论和技术手段进行创新。利用交通、产业与空间的关联关系，定性判断城市的不同区位条件与产业发展适宜性。通过交通、产业、空间协同规划，转变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思路，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为企业创新营造适宜的空间条件。与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在创新发展上还存在差距，特别在适于创新的空间环境塑造上需要大力改进。“邻近重点高校及科研院所”“与机场便捷联系”“利于交流的空间形态”是创新型企业发展的适宜环境。整体空间结构上，要根据重大产业布局，注重交通基础方式布局与城镇体系的结合，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微观上，未来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创新模式应当采用硅巷模式，即硅谷模式的升级版，IT产业集中在园区创新，而生产性服务业创新是在街区中产生。创新在城市的不确定性中衍生，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事物。但是产业集聚与交通设施之间密切联系是确定的，各类产业对高效聚集的基础设施服务的要求是确定的。北京与上海正处于产业外迁、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和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拥抱城市的不确定性，处理好创新型产业发展与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营造适于创新型企业发展的空间环境，是确立国际创新中心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从具体区域看京沪创新城市建设

北京、上海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明确了这两个城市具体的创新区域。主体功能区规划是第一次经过全国国土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单元评价之后编制的科学空间规划。规划的研究编制和规划体系的构建耗时十几年，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出台，2014年西藏颁布了最后一个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在主体功能区规划里，北京创新功能主要

是在城市功能拓展区，“自主创新和外向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是规划对该区域的一个定位。而上海创新的区域主要是在都市优化功能区，定位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增强高端要素集聚和辐射的功能，具体布局包括江湾—五角场地区、紫竹高新区、闵行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承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司劲松认为，两个城市的创新区域已经明确，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已形成的优势和未来发展潜力，做出的定位。但对于京沪两个城市的创新来讲，既要在市域的特定空间内进行创新集聚，又不能完全局限于城市边界之内，还面临区域创新问题。北京和上海同样面临地价贵的问题，创新的布局，包括创新的诞生、转化和辐射，都不必完全局限在城市的核心区范围之内。如，北京面临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要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共同体。中央政府希望河北在环境治理上大有作为，实现突破、实现转型发展，河北也在努力，石家庄可能要推动建设德国生态技术博览园以及中德环境治理工程应用示范基地。上海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在市域内创新，还要促进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

四、工业绿色发展推动创新城市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合作中心全球能源资源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毛涛认为，与环境产业密切相关的工业产业同样在城市建设中举足轻重。人们生活在城市中，衣食住行包括了食品工业、汽车工业、建筑原材料工业等，它们密切相关，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较多问题。目前，中国工业已位居世界第一，2016 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3%，工业产出则占世界的 20% 左右。但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就能源消耗而言，工业占比达 70% 左右，铝铜钢的消耗都在前列；工业污染中粉尘占比 85% 以上，二氧化硫占比 75% 以上，工业发展还带来了雾霾。这导致部分创新人才离开城市，也必然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

现在城市建设有两大目标，绿色化和城镇化。从创新数据看，中国科技人才量居世界第一，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国际专利量仅次于美国、日本。但从含金量来讲差距很大，美国产学研用结合以及创新中心都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 10% 左右，但世界平均水平已达到 30%~40%，美国高达 80%。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很多工程师持续研究时间超过 1 万小时，但中国大量工程师只能达到 2000~3000 小时。科研投入世界排名前 50 名的中国企业只有华为，国内很多企业科研投入量占销售量的比例不到 1%，差距非常大。在理念上，一些创新理念存在偏差，比如现在煤炭的转型定位。目前中国每年要使用 39 亿吨煤，50% 用于发电，20% 作为化工燃料，还有 20% 多是散烧。其

中，20%多散烧煤的危害超过了50%的发电煤。这个现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需要在传统能源基础上加快技术创新，发展新能源非常必要。

五、提升城市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教授认为，在创新城市的主体中，中小企业是创新城市最微观的基础。一个城市是否是创新城市，首先要看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是否有创新活力。据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2000万家以上的中小微企业，5400万家以上的个体工商户；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达36.5万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97.4%，利税分别占64.5%和49.2%，提升的就业岗位约为80%，已成为产业化的基础。中小企业同样是创新的主体：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如软件、研发、设计等，英国微型工业设计企业非常多，三四个人就组成一个企业；媒体刊物等多数都是小微企业；另外，一些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时都是小微企业。

总体上看，国内中小企业的创新环境还不够好。德国创新主要依靠中小企业，其之所以成为世界制造的中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两大两小”，即“小企业大市场，小商品大市场”。每一个小微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专利，而且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全球产业链，所以是非常典型的“小企业大市场”。另一方面，人们都喜欢购买德国的工业产品，如厨具等，这便是“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不一定没有核心技术，也不是只有大企业才可以创新。我们现在的产业政策都向大企业倾斜，无形中压缩了中小企业的创新空间。如何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非常重要。将来的产业政策，更多要靠市场对接，过多由政府主导、干预会扭曲生产资源的配置。王晓红在德国柏林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不干预任何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之间公平竞争，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而且政府非常愿意扶持小微企业的优秀项目。另外，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较高，应认真思考如何开发适合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发展健康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等。

六、城市品牌创新与创新城市建设

清华大学城市品牌研究室副主任眭谦教授认为，目前对城市创新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经济层面，是带有一定刚性的、依靠数据的研究。而城市在沟通层面、传播层面尚存在很多问题，无法用数据量化，更多是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应基于人的认知模式构建模型进行研究。城市品牌跟心理学密切相关。对城市而言，传播实际是动态的。每个人、每个不同城市利益相关方群体，对同一城市的看法是不同的。有人来创业、有人来投资、有人来旅居（半创业半生活），他们的要求都不同。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可能

有交集也会有分歧，很难聚焦在同一方面，这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创意的基础是城市文化资源，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发展文化产业，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实质内容。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文化丰富，但这些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经济利益，还需要城市管理者或者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管理部门认真思考。如果没有创意思路及创意机制，永远不可能将其转化为城市建设的形象。

城市品牌强调的是个性，无法标准化，其特性就是非标准，只有充满个性才能保持对不同受众的特殊吸引力。如果城市都一样，那么人们到哪里都一样，现在的城市大部分情况就是如此。从品牌入手，构建城市发展的愿景，在创意品牌之下进行规划。例如，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是旅游城市，在制定规划的时候，就要把旅游功能和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兼顾外在形象和内部功能。在品牌的指导下进行城市建设，才能保证内部基础建设与外在城市形象吻合。

七、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路依然漫长

中国科学院中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秦怡认为，新能源、新技术从研发到生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创新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经过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漫长过程。科研成果真正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还需要技术的成熟度和政策、资金的支持。这不是科学家擅长的，而是企业家擅长的。一些制约因素导致很多成果不能在企业中投产，进而导致很多研究成果“没有用”。因此，需要有良好的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政策，使科学家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交给企业孵化。为解决这些问题，中科院探讨提出了联动创新纲要。首先要打通科研成果和产业化信息不对称的体系；其次是发展三链嫁接（创新链、企业链、资本链），中科院不缺技术和人才，关键是产业链和资本链都要跟上。

此外，中科院提出了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健康城市，其中理论都是相通的。创新城市、绿色城市都不是单一项目到地方政府落地，都需要顶层设计，而且要针对城市的个性化进行设计。因为每个城市的资源、“十三五”规划、定位都不同，针对每个城市的顶层设计是个性的、柔性的，是结合他们的需求的，且品牌、创意和产业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等，都需要纳入顶层设计。有这样的规划，就能按照规划的目标，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和企业去落实，针对指标把项目落地。秦怡认为，还需要在各个层面搭建一个大平台，从顶层设计到技术、产业、运营、发展等，整合相关的人和资源，这个路径打通之后，才能做得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

责任编辑：李 蕊

肩负起智库专家学者的责任使命

——简评徐洪才新作《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

王晓红

正值阳春三月，玉兰飘香的时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经济学家徐洪才研究员出版了他的又一部力作《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专著收录了近年来作者撰写的研究论文、媒体采访实录、国际会议演讲。作者站在全球经济的视野和政策前沿的高度，准确地抓住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以来面临的重大问题、机遇、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引发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的诸多思考。专著饱含了洪才研究员作为一名智库专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独立思考和创作的艰辛，在理论层面、政策层面和应用层面都具有较高价值。全书主要有以下特色。

第一，视角全面，视野宽广。专著全面系统地分析和研判了2014—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和世界经济形势，评述了这一时期的重大经济政策，重点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同时从金融、产业、贸易、投资、区域发展、对外开放、国际关系等不同侧面进行了具体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新常态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把握未来经济走势和政策导向作出了很好的诠释、解读和预判，对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决策、专家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以及企业家的市场应用都极具参考价值。全书视野之广阔涵盖国际国内，领域之广泛涵盖经济生活诸多方面，反映出作者深厚的经济学功力和长期丰富的专业知识积累。

第二，把握重大前沿问题，注重服务国家战略。专著研究了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建设性的建议。比如，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战略选择；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后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势，G20中国应高举全球化大旗、主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拓展中欧经贸合作新局面，中国投资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及扩大与其合作；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同时，专著十分注重对国内重大热点问题、战略问题进行研究。比如，中国外贸增长面临的新挑战；“十三五”时期如何做好“三去一降一补”；产业迈向中高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国金融改革与创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等。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直面难点。作者对于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敢于直面，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比如，在研究金融改革与开放创新问题上，作者指出，振兴实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都离不开金融创新，但目前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导致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对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民生领域的金融支持不够等，这些问题都抓住了痛点，作者同时提出了中国金融改革如何发力以及金融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民营银行的发展、外汇资本市场流动、对房地产实施差别化调控，以及推动互联网金融快速健康发展等政府关注、民生关切的重大问题。

第四，科学务实研究，注重数字说话。专著注重运用数据分析和定量研究，力求对于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分析的基本判断准确、对政策把握到位，通过经济数据的精准刻画展示经济规律、把握经济大势，稳定信心和预期。同时，作者注重案例调查研究。比如，化解鄂尔多斯债务困境、上海自由贸易示范区的创新经验借鉴、通过金融创新促进东北经济发展等，这些案例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第五，引导社会舆论，注重使命担当。为中国经济建言献策，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社会、传递到老百姓的心里，是每一个智库专家学者的责任和义务。党中央的每一项政策出台都会引起不同的反响，这其中是有正面的，也会有负面的。专家学者有责任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社会准确地解释中央决策，释放正能量、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引导人们凝神聚力，紧紧围绕党中央部署开展各项工作。作者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一个智库专家服务中央决策、服务大局的家国情怀，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和印记。徐洪才研究员身兼数职，但十分勤奋、笔耕不辍。他担任了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并经常接受各类媒体访谈，每当国家一些新的政策出台，他都要通过媒体把政策第一时间传递到社会，不辞辛苦。长期以来，他出版了《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大国金融方略》《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等专著 10 余部，发表文章和研究报告 300 余篇，多篇内参报告获得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并受邀多次赴世界各地进行学术演讲和交流，先后荣获“文明之光·2016 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等殊荣。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衷心祝愿徐洪才在学术领域不断追求和耕耘，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一个智库专家的思想智慧。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责任编辑：艾冰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7年4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预警保护主义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7年4月18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上调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警告保护主义升温及缺乏全球政策协调将威胁经济稳步增长势头。IMF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3.5%，比2017年1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并维持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3.6%不变。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表示，上调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首要原因在于欧洲和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经济表现亮眼。

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2017年、2018年增速均为2.0%，其中2017年增速预期比1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2018年增速预期不变。美国经济2017年、2018年预计分别增长2.3%和2.5%，与1月预期一致；欧元区经济2017年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1.7%，2018年增长预期维持在1.6%不变；日本经济2017年、2018年预计分别增长1.2%和0.6%，比1月预测值分别上调0.4和0.1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2017年经济将增长4.5%，2018年增速将回升至4.8%，与1月预期一致。

奥布斯特费尔德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正在提速，但仍面临风险。报告指出，保护主义升温、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大幅放松金融监管等因素将威胁全球经济增长，加大金融危机爆发风险。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有赖于各国在贸易、金融监管、气候变化、难民政策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各国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应加大对全球多边贸易的支持。

（二）全球金融稳定状况有所改善

IMF 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全球金融稳定状况持续改善，但全球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金融稳定构成新的威胁。

报告指出，如果美国的税改和放松监管等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市场风险溢价和波动性可能会大幅上升，从而破坏金融稳定。在美国，能源、房地产和公共事业等企业杠杆率过高，减税有助于这些企业改善现金流，但也可能促使它们承担更多财务风险，导致其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在全球风险溢价上升的背景下，杠杆率增加将威胁金融稳定。尽管新兴经济体提高了抗风险能力，但一旦市场情绪逆转或部分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新兴经济体将再次面临资本流出和增长前景受损的风险。报告还指出，欧洲银行业过度扩张是导致其目前资产收益率低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利润低下、不良贷款上升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将可能再次引发系统性风险。IMF 呼吁各国调整政策组合以促进长期、更强劲的包容性增长，同时避免采取“向内看”的保护主义政策。

（三）全球贸易增长不确定性不容忽视

世界贸易组织（WTO）2017 年 4 月 12 日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全球商品贸易量的增长预计将在 2016 年温和表现的基础上继续向好，但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贸易增长的幅度。WTO 预测 2017 年全球贸易额将扩大约 2.4%。然而，由于短期经济和政策走向的高度不确定性，预测风险有所提高，因此 WTO 将这一预测界定在 1.8%~3.6%。同时，预测 2018 年贸易增长率为 2.1%~4%。近期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政府的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行动缺乏明确性，导致贸易活动可能受到极大遏制的风险。此外，通货膨胀率高涨导致利率上涨，财政政策紧缩以及采取措施限制贸易，都可能在未来两年内破坏贸易取得更高的增长。

WTO 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表示，过去几年国际贸易的增长幅度微弱，主要体现了全球经济的持续疲弱。如果跨境贸易货物流动和服务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阻碍，贸易就有可能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但如果政策制定者试图为解决国内工作机会的损失而对进口施加严重限制，贸易就无法促进增长，甚至还可能对经济复苏造成拖累。虽然贸易确实在某些地区造成了一些经济错位，但其不利影响不应被夸大，也不应掩盖其在增长、发展和创造就业方面带来的益处。贸易应被视作解决经济困难的方法之一，而不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问题。事实上，80%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损失是由于创新、自动化和新技术的运用，但没有人质疑技术进步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因此，解决之道是采取能够从贸易中获益的政策，同时针对失业问题采取横向解决办法，包括提供更好的教育培训和社会计划，迅速帮助工人恢复正常工作，并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2016 年全球贸易增长幅度只有 1.3%，部分原因是经济活动全面放缓的周期性因素，但同时也反映了贸易与经济产出之间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由于美国的投资支出下滑，中国继续进行从投资到消费的经济重新平衡，从而抑制了进口需求，2016 年全球需求中贸易密集度最高的部分显得特别薄弱。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商品贸易量的增长速度一般比世界经济增速高出约 1.5 倍。但是贸易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比例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则下降到了 1：1 左右；2016 年这一比例则下降到 1 以下，仅为 0.6：1。预计这一比例将在 2017 年有所恢复，但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四）亚太地区经济体 2017 年经济增长势头明显

2017 年 5 月 1 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泰国曼谷总部发布了年度旗舰报告《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报告强调，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趋势，亚太地区经济体 2017 年经济增长势头明显，但加强有效治理和改善财政管理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预计 2017—2018 年，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将达 5% 或 5.1%，高于 2016 年 4.9% 的平均水平；中国和印度依然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中国经济在 2017 年将平稳运行，高附加值产业正在逐渐取代产能过剩部门，并驱动生产和就业。同时，由于政府进一步推进“去杠杆”及债务重组以期在中期内提振产出，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GDP 增长率预计将从 2016 年的 6.7% 下降至 6.5%。随着国内消费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断增加，印度 2017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 7.1%。此外，受国际油价日渐走高影响，俄罗斯 2017 年经济增长预计将在 2016 年萎缩 0.2% 的基础上提升至 1.1%。

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保护主义和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若上述因素恶化，其 2017 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下降 1.2 个百分点。亚太经社理事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表示，受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上升的影响，亚太地区经济目前处于稳定、温和增长态势；要想在未来实现持续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亚太地区国家应更多依赖生产力提高，这需要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构建更加高效的机构，并进一步改善治理模式；同时，决策者还需积极应对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以提高当前经济增长质量。

为应对上述挑战，报告呼吁亚太国家加强有效治理，通过积极主动的财政政策，针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资源使用效率等重点领域开展生产性投资；通过与财政政策相辅相成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发掘并扩大潜在生产能力；此外，政府应提供适宜的有利政策环境、机构和公共服务，以帮助产品市场高效运转。报告还建议改善太平洋地区的卫生保健服务，促进北亚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多元化，在南亚和西南亚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机会，减少东南亚的贫富差距，并加快东亚和东北亚地区的生态创新工作。

（五）WTO 总干事警告贸易战风险

2017 年 5 月 3 日，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于柏林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上表示，对于发达国家面临的就业岗位流失等问题，设置贸易壁垒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使流失的岗位回流，还会削弱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他更形容贸易战是“破坏性的零和游戏”。

阿泽维多表示，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真正的结构性挑战，与 1995 年 WTO 成立之初相比，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技术改变了商业模式、贸易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对就业结构造成重大影响。为应对就业流失而限制自由贸易不仅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且还可能导致劳动者面临的困境进一步加剧，“增加壁垒不但不会让工作回流，还会使消费者钱包缩水——他们的购买力将因此受损”。为说明保护主义的危害，他还以二战爆发前的历史为例，20 世纪 30 年代充斥着混乱，保护主义抬头，各方组团进行贸易战、出台以邻为壑的政策，“这些都对经济造成了深重的损害，最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正是见证了当年的混乱局面，世界各国才共同构建了今天这一由规则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我相信贸易以及全球贸易体系对于就业、增长、发展、繁荣，实际上也包括和平，都是必不可少的”，他表示，“但我同时也相信这一体系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这将使贸易造福更多人。这就要求我们为此做更多工作，而非相反”。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经济增势强劲

IMF 亚太部副主任马克斯·罗德劳尔 2017 年 4 月 21 日表示，2017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IMF 未来很可能进一步上调 2017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中国一季度一系列经济数据意外强劲，特别是 GDP 同比增长 6.9%。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中国 2017 年、2018 年经济增长预期调整为 6.6% 和 6.2%，分别比 2017 年 1 月预测值上调 0.1 和 0.2 个百分点。主要因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同时政策有望继续支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转型继续推进，服务业和消费占 GDP 的比重将稳步提高。罗德劳尔还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采取重要措施控制部分地区房价过快上涨和严控金融风险。

IMF 亚太部主任李昌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民币资产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仍保持 1% 不变。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确实得到促进，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未来有快速发展的潜力。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新周期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 年 4 月 20 日刊登《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新周期》一文称，中国经济阶段变化是从“起飞”到“走向成熟”。从经济增长的特征看，“起飞”阶段投资是第一增长动力，“走向成熟”阶段是产业逐渐稳定和定型阶段。

按照通常的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起飞”阶段的后半期。由不发达达到发达，经济增长阶段序列为：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走向成熟→高消费→品质生活。不过，这六个经济增长阶段，并不是每个社会都能正常推进，比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意味着该经济体系“永远”处在“走向成熟”阶段而不能向上突破。另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增长阶段的时间、途径也经常不同。按照各个阶段的经济运行特征，显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前两个十年周期（1978—1997 年）是中国经济的“准备起飞”阶段，而第三个十年周期（1998—2007 年）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进入“走向成熟”阶段意味着经济体系已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中国经济显然还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经济体，仍然面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这也意味着经济成长空间仍然很大。

2014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政府将经济新常态描述为“经济转型+增速换挡+政策消化”，并把经济增速“换档期”的发展形态进一步解释为“L 形”增长，意为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增长轨迹形成一个 L 形走势，未来经济会在降低了的中高速平台上运行。然而现实情况是，市场不仅对已经企稳的经济增长形态视而不见，而且还把“L 形”走势理解为动态的迭加过程，中国经济增速将呈台阶式下降走势竟一度成为市场担忧。这种担忧背后的实质，是对中国经济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决定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格局：即使 2008 年以来以资本产出比衡量的中国投资效益逐渐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能成为消费型经济体。实际上，伴随投资的回落，中国消费的增速也随之下降，消费率提高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走低。中国经济的前景，取决于未来投资的变化情况。这是目前中国所处的经济成长阶段决定的。

经济增长极的出现是经济仍然处在“起飞”阶段的标志事件，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抢眼，“珠三角”“长三角”先后充当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无论是中西部的“长株潭”“宝西关”，还是天津滨海，抑或新设立的雄安新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极仍会在竞争中再度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形成之时，就是经济转型完成之日，届时中国经济的新经济周期也会形成。不过，这个新周期阶段的开启只能是事后确认。面对偏弱的增长格局，市场情绪有些悲观也在情理之中。在经济转型时期，转移、消除旧有产业和创设、发展新型产业之间，往往存在转化时滞，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暂时失速，这个衔接

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经济新常态。

（三）中国制造业转型将面临外部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 年 4 月 11 日发表文章称，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型之路并非一片坦途，而在欧美都纷纷强调制造业之际，中国制造业转型也将面临外部挑战。

制造业再度成为焦点，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内外部局势的变化。在中国国内，近期对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打压，表明过去数年的金融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希望金融行业拉动实体经济，眼下被证明是本末倒置。中国用数年时间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制造业，而对制造业转型的强调也意味着中国将寻求更扎实的发展道路，不再寻求一蹴而就的经济转型。从外部局势看，特朗普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同时强调“买美国货”，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传统的经济思维方式。一般而言，美国这样的经济体处于经济食物链上游，因此不应从事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但特朗普偏偏要更多的基础制造业回归美国，从而让失业的低教育人群受益。形象地说，如果美国既想造飞机，也想生产袜子，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而言，无疑意味着市场份额的缩小。换个角度看，美国希望保护本国市场无可厚非，多数国家除了口头批评，对美国的自我保护也没有好的对策。因此，对中国而言，如果希望保持竞争力，就必须提升自己的制造业水平，也就自然地要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从全球的另一个趋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大幅度减少，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内涵开始发生改变。从传统来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送大量相对廉价的商品，以换取经济发展必须的资金，而发达国家则注重于服务业，并通过自身的消费增长和升级获取经济发展动能。在这样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等于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补贴”。但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多数发达国家开始面临经济失速和债台高筑的困境，被迫对自身经济进行调整，而调整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经常账户赤字开始逐步收窄。但这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它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失去外来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遇到挑战的是类似俄罗斯这样的依赖能源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而言，为保持经济增长就必然要转向内需，但对于内部需求的“深度挖掘”最终却带来了企业债务缠身和房地产泡沫这样的负面效应，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步伐未来将更加沉重。

在重新平衡的过程中，中国更加强调制造业，也意味着内外部的循环系统将在一定程度上被重置。从内部看，制造业的发展将意味着其他产业，尤其是房地产和服务业的地位出现相对下降。而从外部循环看，为保持竞争优势中国会努力推动制造业的进步。

这从国际收支平衡看，应体现为中国仍将追求较高水平的经常项目顺差。然而，一旦这种状况出现，也意味着中美两大经济体对其他经济体的需求降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也将面临新的课题。于是，中美两国的制造业之争，将在一段时间内左右国际经济格局。在这一过程中，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诸国，自然也不会放弃其存在优势的制造业领域。总之，谁能引领新的制造业潮流，就必然在新的全球势力版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到最后，我们看到了在制造业领域的重新扩军备战。对中国而言，强调转型升级和军民融合是最为现实的想法；对美国而言，强调更长更全的产业链是对自身地位的重新定位；对欧洲而言，保住自身优势产业，避免被中美两强逐步吞噬，需强调稳守反击。

（四）国际投资者重新看好中国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 年 4 月 5 日刊登文章称，中国经济出现急剧好转迹象已有一年多时间。当时投资者正准备迎接经济“硬着陆”和货币贬值，自那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好转，受影响最直接的是收入最依赖中国市场的西方公司股票，以及中国购买的大宗商品价格。这种情绪最终传递到国际投资者。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 年 2 月中国出现了资本净流入而非净流出，这是 3 年来的首次。中国继续主导了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入。新兴市场股票与 2016 年 1 月的低点相比上涨了 41%。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债券发行量在本季度创出历史最高纪录，而其货币也大幅升值，原因是对奉行“美国优先”立场的美国破坏全球贸易的担忧消退。

这些数据实打实地证明了看好中国人士的胜利。从非常长的时期来说，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增长，很少有人否认这一点。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刚刚收到有关中国最新由信贷驱动复苏的信息，这种复苏就已经见顶并开始逆转。最近几年，日益迫切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中国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等收入陷阱”已使许多国家达到与中国当前相当的财富水平之后就停滞不前。中国能以某种方式避免步所有那些如此快速而广泛增长国家的后尘，防止在某个时点发生“骤停”或金融危机吗？

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许多国家迅速从欠发达或贫穷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在最近 30 年里，人口超过 2000 万的国家只有波兰和韩国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看好中国的人认为，中国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摩根士丹利最近发表的一份长篇报告的核心论点，该报告毫不含糊地以《我们为什么看好中国》作为标题。这家投行预测，如果中国能从当前的出口主导经济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那么到 2027 年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将从当前的 8100 美元增长至 1.29 万美元。

责任编辑：李 蕊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 = 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年 4 月)				
世 界	3.2	3.1	3.5	3.6
发达国家	2.1	1.7	2.0	2.0
美 国	2.6	1.6	2.3	2.5
欧元区	2.0	1.7	1.7	1.6
日 本	1.2	1.0	1.2	0.6
发展中国家	4.1	4.1	4.5	4.8
印 度	7.6	6.6	7.2	7.7
俄罗斯	-3.7	-0.2	1.4	4.0
巴 西	-3.8	-3.6	0.2	1.7
世界银行(2017 年 1 月)				
世 界	2.7	2.3	2.7	2.9
发达国家	2.1	1.6	1.8	1.8
发展中国家	3.5	3.4	4.2	4.6
英国共识公司(2017 年 5 月)				
世 界	3.0	2.5	2.9	3.0
美 国	2.6	1.6	2.1	2.4
欧元区	2.0	1.7	1.7	1.6
日 本	1.2	1.0	1.4	1.1
印 度	7.6	7.0	7.3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 = 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世 界	2.7	2.2	3.8	3.9
进口				
发达国家	4.4	2.4	4.0	4.0
发展中国家	-0.8	1.9	4.5	4.3
出口				
发达国家	3.7	2.1	3.5	3.2
发展中国家	1.4	2.5	3.6	4.3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为出口量增速和进口量增速的简单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4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 = 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年 4 月)				
发达国家	0.3	0.8	2.0	1.9
发展中国家	4.7	4.4	4.7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7 年 5 月)				
世 界	1.9	2.5	3.1	2.9
美 国	0.1	1.3	2.4	2.2
欧元区	0.0	0.2	1.6	1.4
日 本	0.8	-0.1	0.7	1.0
印 度	4.9	4.6	4.8	5.1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二、美国经济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6 年		1.3	0.4	2.7
	5 月	1.8	0.1	2.9
	6 月	1.7	0.4	3.2
	7 月	1.7	0.4	3.0
	8 月	1.4	0.5	2.9
	9 月	1.5	0.7	3.1
	10 月	1.5	0.9	3.0
	11 月	1.6	0.9	3.0
	12 月	1.8	1.3	3.1
2017 年	1 月	2.9	2.0	3.6
	2 月	2.4	1.8	3.7
	3 月	2.4	1.7	4.0
	4 月	2.3	1.9	4.0
	5 月	2.4	1.7	3.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6 年	4 月	1.8	0.0	4.0	50.2	50.6	50.4
	5 月	1.8	-0.1	4.4	50.1	50.1	50.4
	6 月	1.8	0.0	4.7	50.4	50.5	50.8
	7 月	1.8	-0.1	4.3	51.0	52.1	51.5
	8 月	2.4	0.9	4.2	50.7	52.0	51.1
	9 月	1.8	0.6	4.0	51.0	52.0	51.4
	10 月	2.4	0.4	4.5	51.9	53.5	52.8
	11 月	3.0	2.0	4.9	52.0	53.3	53.0
	12 月	3.6	2.7	4.8	52.7	53.9	53.7
2017 年	1 月	3.0	1.2	5.2	52.7	53.6	54.0
	2 月	3.0	2.4	4.8	52.9	54.1	54.1
	3 月	3.6	2.5	5.7	53.0	54.2	54.2
	4 月				52.8	53.7	53.7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 年		2.6	3.2	1.8
	2 季度	2.6	2.9	3.2
	3 季度	2.0	2.7	1.9
	4 季度	0.9	2.3	1.0
2016 年		1.6	2.7	0.8
	1 季度	0.8	1.6	1.6
	2 季度	1.4	4.3	-1.7
	3 季度	3.5	3.0	0.8
2017 年		2.1	3.5	0.2
	4 季度			
	1 季度	1.2	0.6	-1.1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4.0	0.1	4.6
	2 季度	4.3	2.9	2.9
	3 季度	5.7	-2.8	1.1
	4 季度	-0.2	-2.7	0.7
2016 年		0.7	0.4	1.2
	1 季度	-0.9	-0.7	-0.6
	2 季度	-1.1	1.8	0.2
	3 季度	0.1	10.0	2.2
2017 年		2.9	-4.5	9.0
	4 季度			
	1 季度	11.9	5.8	3.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 年		2.6	3.2	1.8
	2 季度	3.0	3.4	2.0
	3 季度	2.2	3.1	1.8
	4 季度	1.9	2.6	2.2
2016 年		1.6	2.7	0.8
	1 季度	1.6	2.4	1.9
	2 季度	1.3	2.7	0.7
	3 季度	1.7	2.8	0.4
2017 年		2.0	3.1	0.2
	4 季度			
	1 季度	2.0	2.8	-0.5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4.0	0.1	4.6
	2 季度	4.2	0.8	4.5
	3 季度	3.8	-0.4	5.1
	4 季度	3.4	-2.2	2.5
2016 年		0.7	0.4	1.2
	1 季度	2.2	-0.9	1.0
	2 季度	0.8	-1.1	0.3
	3 季度	-0.5	2.0	0.6
2017 年		0.2	1.5	2.6
	1 季度	3.3	3.1	3.7

注: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6 年	4 月			5.0	15.3
	5 月			4.7	4.3
	6 月	-0.1	-0.3	4.9	29.7
	7 月			4.9	29.1
	8 月			4.9	17.6
	9 月	3.3	0.1	5.0	24.9
	10 月			4.9	12.4
	11 月			4.6	16.4
2017 年	12 月	1.8	1.1	4.7	15.5
	1 月			4.8	21.6
	2 月			4.7	23.2
	3 月	-0.6	1.1	4.5	7.9
	4 月			4.4	21.1

注: 除年度数据以外,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6 年	22121		-2.2	27126		-1.8	-5006
	3 月	1785	-1.2	2158	-4.7	-9.6	-373
	4 月	1816	1.7	2201	2.0	-5.4	-385
	5 月	1813	-0.2	2235	1.5	-3.1	-422
	6 月	1827	0.8	2278	1.9	-2.4	-451
	7 月	1864	2.0	2261	-0.7	-1.7	-397
	8 月	1883	1.0	2288	1.2	-1.0	-405
	9 月	1902	1.0	2262	-1.1	-1.0	-360
	10 月	1864	-2.0	2290	1.2	0.8	-426
	11 月	1860	-0.2	2315	1.1	3.0	-455
	12 月	1910	2.7	2353	1.6	4.8	-443
2017 年	1 月	1925	0.8	2407	2.3	8.3	-482
	2 月	1927	0.1	2364	-1.8	4.5	-438
	3 月	1910	-0.9	2347	-0.7	8.8	-437

注: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 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3484	3032	452
	1 季度	1981	932	1049
	2 季度	809	864	-55
	3 季度	430	503	-73
	4 季度	264	733	-469
2016 年		3911	2990	921
	1 季度	985	767	218
	2 季度	1469	766	703
	3 季度	1129	899	230
	4 季度	328	558	-230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 年		2.0	1.8	1.3
	2 季度	0.4	0.5	0.3
	3 季度	0.3	0.4	0.5
	4 季度	0.5	0.4	0.5
2016 年		1.7	2.0	1.8
	1 季度	0.5	0.7	0.7
	2 季度	0.3	0.3	0.3
	3 季度	0.4	0.3	0.1
	4 季度	0.4	0.4	0.4
2017 年				
	1 季度	0.5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2	6.5	6.5
	1 季度	1.6	2.7	2.5
	2 季度	0.0	1.2	0.8
	3 季度	0.8	0.2	1.2
	4 季度	1.4	0.8	1.5
2016 年		2.6	2.9	3.5
	1 季度	0.3	0.2	-0.1
	2 季度	1.2	1.3	1.4
	3 季度	-0.7	0.3	-0.1
	4 季度	0.6	1.5	2.0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6 年			0.4	43.8	10.0
	3 月	0.2	0.3	51.0	10.2
	4 月				10.2
	5 月				10.1
	6 月	0.0	0.8	55.7	10.1
	7 月				10.0
	8 月				10.0
	9 月	0.2	0.5	30.1	9.8
	10 月				9.7
	11 月				9.7
	12 月	0.2	0.3	38.4	9.6
2017 年					
	1 月				9.6
	2 月				9.5
	3 月				9.5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 年		2.0	1.8	1.3
	2 季度	2.0	1.8	1.3
	3 季度	1.9	1.9	1.3
	4 季度	2.0	1.7	1.7
2016 年		1.7	2.0	1.8
	1 季度	1.7	2.0	2.0
	2 季度	1.6	1.9	2.0
	3 季度	1.8	1.8	1.6
	4 季度	1.8	1.8	1.6
2017 年				
	1 季度	1.7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2	6.5	6.5
	1 季度	2.2	7.2	6.9
	2 季度	2.9	7.3	6.4
	3 季度	3.0	5.8	6.0
	4 季度	3.8	5.0	6.1
2016 年		2.6	2.9	3.5
	1 季度	2.5	2.5	3.4
	2 季度	3.8	2.5	4.0
	3 季度	2.3	2.6	2.8
	4 季度	1.5	3.3	3.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进口额	增长	增长	减进
月份		(%)	(%)		(%)	(%)	口额
2016 年	20477		0.2	17758		-1.3	2719
3 月	1789	0.0	-2.1	1507	-2.0	-7.9	285
4 月	1725	0.8	-0.7	1459	0.2	-4.9	270
5 月	1679	-0.6	2.3	1444	-1.0	-1.3	236
6 月	1801	-0.2	-1.4	1512	1.7	-4.1	292
7 月	1678	-0.5	-9.3	1428	1.1	-7.7	251
8 月	1606	3.1	8.6	1433	1.0	4.6	177
9 月	1769	-1.0	2.2	1525	-0.8	-1.2	248
10 月	1726	0.1	-4.5	1532	2.2	-2.8	196
11 月	1833	3.2	5.5	1589	1.9	5.3	245
12 月	1790	1.9	6.1	1511	1.5	4.7	278
2017 年							
1 月	1631	-1.1	12.6	1642	3.8	17.3	-4
2 月	1712	0.8	4.9	1543	-1.2	6.4	169
3 月	2023	1.4	13.1	1714	-1.1	13.7	309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3 月	121	259	− 138
	4 月	389	446	− 57
	5 月	459	559	− 100
	6 月	− 133	− 109	− 24
	7 月	− 35	158	− 193
	8 月	141	606	− 465
	9 月	− 519	− 55	− 464
	10 月	246	959	− 713
	11 月	223	516	− 293
	12 月	− 451	73	− 524
2017 年				
	1 月	913	1082	169
	2 月	949	951	− 2
	3 月	106	228	− 12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2	− 0.4	1.6
	2 季度	− 0.1	− 0.4	0.1
	3 季度	0.2	0.5	0.4
	4 季度	− 0.4	− 0.7	0.7
2016 年		1.0	0.4	1.5
	1 季度	0.5	0.4	1.3
	2 季度	0.5	0.2	− 1.1
	3 季度	0.3	0.3	0.2
2017 年		0.3	0.0	0.3
	1 季度	0.5	0.4	0.1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0.1	3.0	0.1
	2 季度	− 0.5	− 3.7	− 2.5
	3 季度	0.5	2.1	2.5
	4 季度	− 0.5	− 0.6	− 0.9
2016 年		0.8	1.2	− 1.7
	1 季度	− 0.2	0.9	− 1.1
	2 季度	1.6	− 1.2	− 1.0
	3 季度	0.1	2.1	− 0.3
2017 年		0.8	2.6	1.3
	1 季度	0.2	2.1	1.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1	− 0.4	1.7
	2 季度	1.7	1.0	1.7
	3 季度	2.0	1.2	1.6
	4 季度	0.9	− 0.1	2.2
2016 年		1.0	0.4	1.5
	1 季度	0.5	− 0.1	2.7
	2 季度	0.9	0.3	1.4
	3 季度	1.1	0.3	1.2
2017 年		1.7	0.9	0.5
	1 季度	1.6	1.0	− 0.6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0.1	2.9	0.8
	2 季度	0.9	2.0	0.9
	3 季度	1.4	2.9	1.8
	4 季度	0.1	− 0.5	0.6
2016 年		0.9	1.2	− 2.3
	1 季度	− 0.7	− 1.4	− 2.4
	2 季度	1.6	0.7	− 1.1
	3 季度	1.1	0.8	− 3.6
2017 年		2.0	4.6	− 2.0
	1 季度	1.9	6.1	1.3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6 年		− 0.4	2.06	3.1
	4 月	− 3.1	2.04	3.2
	5 月	0.8	2.06	3.2
	6 月	− 2.3	2.03	3.1
	7 月	− 2.7	2.03	3.0
	8 月	5.2	2.07	3.1
	9 月	0.4	2.10	3.0
	10 月	− 2.3	2.11	3.0
	11 月	4.3	2.15	3.1
	12 月	1.3	2.19	3.1
2017 年				
	1 月	3.9	2.13	3.0
	2 月	3.4	2.12	2.8
	3 月		2.13	2.8
	4 月			2.8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2016 年	700358		-7.4	660420		-15.8	39938
4 月	58896	-0.7	-10.1	50783	-2.8	13.1	8113
5 月	50919	-1.3	-11.3	51393	0.7	-13.7	-473
6 月	60253	1.9	-7.4	53389	0.9	-18.7	6865
7 月	57284	-1.6	-14.0	52239	-0.6	-24.6	5045
8 月	53164	0.4	-9.6	53510	-0.7	-17.0	-346
9 月	59689	0.6	-6.9	54824	2.3	-16.1	4866
10 月	58702	1.8	-10.3	53891	-0.1	-16.3	4812
11 月	59564	3.8	-0.4	58099	4.4	-8.7	1465
12 月	66789	1.9	5.4	60430	3.4	-2.5	6359
2017 年							
1 月	54220	0.7	1.3	65139	4.0	8.4	10919
2 月	63475	6.4	11.3	55364	-1.3	1.3	8111
3 月	72296	-4.0	12.0	66156	3.5	15.8	6140
4 月	63292	-0.2	7.5	58475	-0.1	15.1	4817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38318	183866	-145548			
	3 月	9592	20913	-11321			
	4 月	-2762	6996	-9758			
	5 月	3799	9336	-5537			
	6 月	13105	17370	-4265			
	7 月	18144	23034	-4890			
	8 月	-12891	-13993	1102			
	9 月	-375	44772	-45147			
	10 月	-76	15607	-15683			
	11 月	5718	11808	-6090			
	12 月	731	21761	-21030			
2017 年							
	1 月	-36	11074	-11110			
	2 月	2166	23521	-21355			
	3 月	1735	25963	-24228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5 年		1.0	2.2	1.4	-3.8	7.3	-3.7
	2 季度	0.7	2.4	1.3	-2.9	7.5	-4.5
	3 季度	0.8	1.8	0.9	-4.5	7.6	-3.7
	4 季度	0.4	1.7	0.6	-5.9	6.5	-3.8
2016 年		1.4	1.8	0.3	-3.6	7.4	-0.2
	1 季度	1.3	1.6	-0.6	-5.4	7.9	-0.4
	2 季度	1.1	1.7	0.3	-3.6	7.2	-0.5
	3 季度	1.4	2.0	0.7	-2.9	7.4	-0.4
	4 季度	1.9	1.9	0.7	-2.5	7.0	0.3
2017 年							
	1 季度		2.0				0.5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5 年		2.6	2.6	2.4	0.8	5.0	4.9
	2 季度	2.2	2.5	3.1	0.7	4.9	4.7
	3 季度	2.8	2.8	2.3	-0.7	4.7	4.8
	4 季度	3.1	2.4	1.9	-0.8	4.5	5.2
2016 年		2.8	2.3	1.9	1.4	4.2	5.0
	1 季度	2.9	2.2	1.0	-0.2	4.1	4.9
	2 季度	3.4	2.6	1.8	1.1	4.0	5.2
	3 季度	2.6	2.0	2.0	2.1	4.3	5.0
	4 季度	2.4	2.3	3.2	2.9	4.5	4.9
2017 年							
	1 季度	2.7	2.8	4.3	2.6	5.6	5.0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6 年		7.0	4.9	11.3	5.5	26.7
	4 月	7.1	5.0	11.2	5.9	
	5 月	6.9	4.9	11.2	5.6	
	6 月	6.8	4.9	11.3	5.4	26.6
	7 月	6.9	4.9	11.6	5.3	
	8 月	7.0	4.9	11.8	5.2	
	9 月	7.0	4.8	11.8	5.2	27.1
	10 月	7.0	4.8	11.8	5.4	
	11 月	6.8	4.8	11.9	5.4	
	12 月	6.9	4.8	12.0	5.3	26.5
2017 年						
	1 月	6.8	4.7	12.6	5.6	
	2 月	6.6	4.7	13.2	5.6	
	3 月	6.7	4.6	13.7	5.4	
	4 月	6.5			5.3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6 年		3.7	3.9	3.7	3.9	3.5
	4 月	3.7	3.8	3.4	4.0	3.5
	5 月	3.7	4.0	3.4	4.0	3.4
	6 月	3.6	3.9	3.4	4.0	3.4
	7 月	3.6	4.0	3.4	4.0	3.5
	8 月	3.8	4.0	3.4	4.0	3.5
	9 月	4.0	4.1	3.4	3.9	3.5
	10 月	3.7	3.7	3.4	3.9	3.5
	11 月	3.6	3.5	3.3	3.8	3.4
	12 月	3.5	3.4	3.3	3.8	3.5
2017 年						
	1 月	3.6	3.6	3.3	3.8	3.5
	2 月	4.0	3.4	3.3	3.8	3.5
	3 月	3.7	3.2	3.2	3.8	3.4
	4 月	4.0	3.5	3.2	3.8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3902	4030	-128	4092	6365	-2273
3 月	329.2	346.1	-16.9	350.9	569.0	-218.0
4 月	312.9	343.7	-30.8	352.3	580.2	-227.9
5 月	315.2	344.6	-29.4	340.5	525.7	-185.2
6 月	331.8	359.6	-27.8	350.3	571.9	-221.6
7 月	302.8	322.5	-19.7	313.7	523.8	-210.1
8 月	337.3	357.4	-20.1	307.8	544.4	-236.7
9 月	339.4	364.0	-24.6	334.2	601.0	-266.9
10 月	337.6	339.7	-2.2	330.4	489.4	-159.1
11 月	348.0	332.5	15.5	360.5	534.0	-173.5
12 月	339.5	315.0	24.5	391.7	477.0	-85.3
2017 年						
1 月	337.7	317.0	13.2	349.8	475.0	-125.2
2 月	319.3	324.5	-5.2	337.9	478.9	-141.0
3 月	372.0	370.2	1.8	387.4	563.3	-175.9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751	750	1	1853	1435	418
4 月	60.8	63.0	-2.2	153.7	109.8	44.0
5 月	64.6	56.0	8.5	175.7	115.9	59.8
6 月	67.0	61.4	5.6	167.4	133.3	34.2
7 月	62.9	62.6	0.3	163.3	122.5	40.8
8 月	65.2	71.7	-6.5	169.9	134.1	35.8
9 月	70.7	65.8	4.9	158.0	125.2	32.8
10 月	63.4	65.9	-2.4	137.2	118.7	18.5
11 月	71.3	72.4	-1.1	165.2	113.8	51.5
12 月	67.6	58.7	8.9	159.4	115.3	44.2
2017 年						
1 月	59.2	67.5	-8.3	149.1	121.9	27.2
2 月	65.8	62.2	3.6	154.7	109.1	45.6
3 月	78.2	69.4	8.8	200.9	129.4	71.5
4 月				176.9	107.2	69.7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2642	3596	-954	2818	1914	904
4 月	208.3	257.5	-49.2	217.4	151.8	65.6
5 月	223.6	283.3	-59.7	220.3	144.8	75.5
6 月	227.7	310.5	-82.9	240.2	160.1	80.2
7 月	216.5	295.0	-78.4	224.6	161.3	63.4
8 月	215.8	291.6	-75.8	232.0	184.5	47.5
9 月	228.8	319.9	-91.1	254.3	179.9	74.4
10 月	234.2	338.1	-103.8	249.0	183.0	66.0
11 月	200.8	327.4	-126.6	266.5	175.1	91.4
12 月	239.6	342.2	-102.5	311.3	192.9	118.3
2017 年						
1 月	222.0	319.3	-97.3	251.2	136.8	114.4
2 月	245.0	333.9	-88.9	257.5	155.8	101.7
3 月	292.3	396.7	-104.4	313.3	187.3	126.0
4 月	246.4	378.8	-132.5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4954	4062	892	3739	3974	-235
4 月	410.8	323.9	86.9	303.9	333.8	-30.0
5 月	397.3	330.3	67.1	314.1	326.9	-12.8
6 月	452.1	338.9	113.2	319.5	333.4	-13.9
7 月	408.8	333.7	75.1	297.7	324.5	-26.8
8 月	401.3	351.0	50.2	324.5	352.7	-28.2
9 月	408.5	339.9	68.6	327.0	351.5	-24.5
10 月	419.8	350.5	69.3	326.0	344.1	-18.2
11 月	453.1	372.4	80.7	343.4	352.0	-8.6
12 月	450.7	383.0	67.7	331.9	341.3	-9.4
2017 年						
1 月	402.9	375.1	27.8	273.2	316.7	-43.6
2 月	431.8	361.4	70.4	313.4	314.4	-0.9
3 月	486.6	425.8	60.8	360.5	371.1	-10.6
4 月	509.7	379.9	129.8	314.9	317.2	-2.3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5167	5473	-306	2804	2309	495
4 月	413.6	417.3	-3.6	222.4	174.5	48.0
5 月	436.5	436.2	0.3	235.4	200.4	35.0
6 月	433.9	470.5	-36.6	228.7	193.0	35.7
7 月	461.8	467.0	-5.1	241.0	205.2	35.8
8 月	435.6	456.3	-20.8	246.5	206.7	39.8
9 月	470.1	498.4	-28.3	225.6	181.9	43.7
10 月	447.8	484.9	-37.1	267.4	223.6	43.8
11 月	494.4	513.7	-19.3	253.3	210.2	43.1
12 月	476.3	542.1	-65.8	257.0	208.3	48.6
2017 年						
1 月	405.3	421.9	-16.6	237.4	202.5	35.0
2 月	355.5	403.9	-48.4	226.7	193.0	33.7
3 月	485.2	506.1	-20.9	257.1	217.8	39.3
4 月	447.8	456.7	-8.9	243.2	215.3	27.8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1894	1684	210	1445	1357	88
3 月	163.3	135.9	27.5	118.1	113.0	5.1
4 月	157.1	133.9	23.2	114.8	108.1	6.6
5 月	148.1	140.0	8.1	115.1	111.4	3.7
6 月	162.6	149.1	13.5	129.7	121.0	8.8
7 月	148.9	144.2	4.7	95.3	90.2	5.1
8 月	167.8	146.7	21.1	127.5	123.9	3.6
9 月	165.6	147.2	18.4	125.7	113.0	12.7
10 月	165.6	142.3	23.4	127.4	115.1	12.4
11 月	168.0	147.2	20.8	135.0	126.7	8.3
12 月	169.4	149.8	19.6	138.3	127.8	10.5
2017 年						
1 月	157.6	146.9	10.6	134.0	119.7	14.3
2 月	161.4	141.8	19.6	126.1	113.5	12.6
3 月				145.9	133.6	12.3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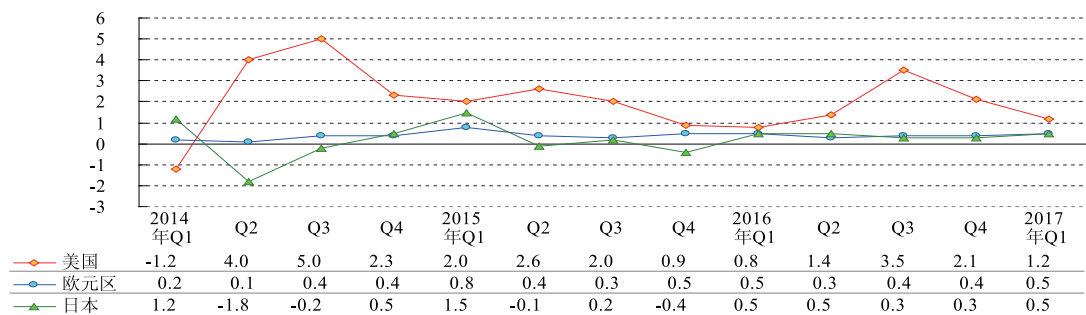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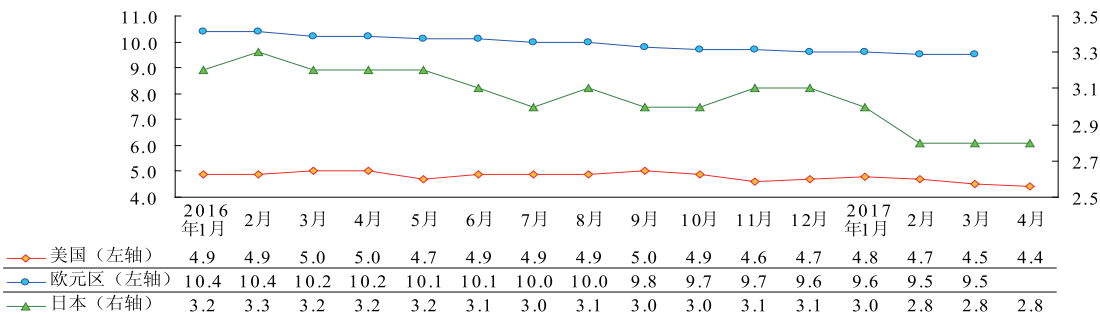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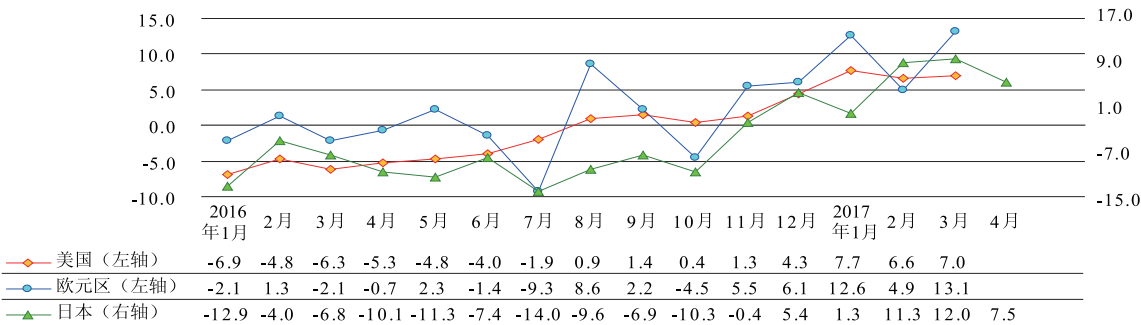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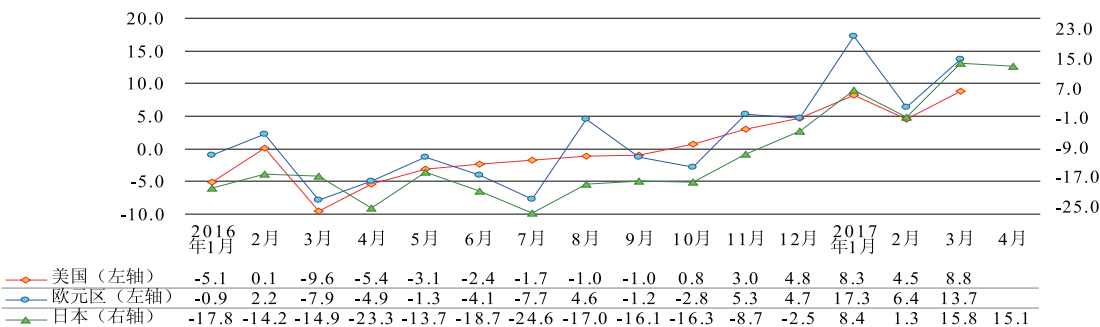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1~图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 Deepening the reform: the key to the formation of middle—income mainstream groups

Tian Xueyuan

in 2016, with its per capita GDP reaching US \$ 8102, China entered the middle stage of the middle and high income period, which wa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of middle – income mainstream groups. At the momen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are to deepe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an all – round way, especially the reform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to the citie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 foundation of middle – income groups, deepen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are the key, and breaking through key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 and demand side reforms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demand side to supply side reforms are necessary. Rural migrants entering the town is the objective needs of th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having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city economy and social life, which called for reform that turns the peasants into citizens.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urban and rural income gap has been somewhat convergent, but the gap is still large. The Gini coefficient changes with the peak value of 2008 as the dividing line, and at present the Gini coefficient is still high, which calls for reform to deepe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2) The counter tide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en Zongsheng and Kang Jian

Under the doldrums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tructural imbalances and serious intensification of class interests differentiation of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duced the birth of the current anti – globalization counter flow. Globalization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and the uncertainties faced by its process are increasing, but the long – term trend of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will not be reversed. The rising emerging economies together with the reallocation, flow,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capital, labor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the global scope of the interactive form together form the driving force for globalization and will push forward globalization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continued deepening. As the leading country of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should become the active promoter of globalization, whose basic strategic initiatives include the promotion of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system.

(3) The return to manufacturing: the only way to save Hongkong’s economy——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 border economic corridor of emerging industries of Hong Kong and Shenzhen

Li Luoli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blem of Hongkong’s society is the economic problem. The fundamental way to revive the economy of Hongkong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dustrial hollowing out in Hongkong and the key is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return to Hongkong. In view of the Hongkong local high business cost, and the lack of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configuring emerging industrial resourc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dustrial economic zone in the boundary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similar to “Singapore Jurong industrial corridor”, to attract both domestic and global outstanding high – tech enterprises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to settle down here, taking advantages of Hongkong in financial,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free port, and of China mainland mainly Shenzhen in capital, talent and technology to develop the Shenzhen Hong Kong cross – border high – tech industry economic corridor to be China 4.0 industrial innovation circ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corridor of emerging industr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is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to maintain Hongkong’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new period. It is suggested to incorpo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 border economic corridor of emerging industries of Hong Kong and Shenzhen” in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4)Several fatal traps must be highly vigilant

Huang Zhiling

Taking a broad view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we find some countries are bogged down and unabl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while some countries have succeeded in crossing traps and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This paper in – depth analyzes several deadly trap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ditions, mechanism, prevention, fatal consequences and how to avoid. The liquidity trap is the long – term accumulation of extreme situations of deflation, the excessive welfare trap is du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economic aging effect, corruption trap is a major obstacle traps acros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B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we argue that only the social consensu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careful selection, and positive guidance can avoid the tragedy, stride across a deadly trap, and realiz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pgrade.

(5) An analysis on the prob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rump ’ s econom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Gu Yuanyang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rump threw out a series of economic propositions, which were hotly discussed and responded differently.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cabinet members will base on the responses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of the party and from home and abroad to correct economic propositions put forward, and make tho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ideas gradually clearer, to form the economic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new government. However, actually it is not easy to implement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inherent differences in actual policy will emerge. Whether Trump’s several important measure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can achieve the desired goal depends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and conditions, which needs objective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by practice.

(6) Trade wa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Ke Jianfei and Yu Lixin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irreversible, and economic ties among countr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ose. At present the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is weak, trade protection forces gain ground, and trade frictions are escalating. From the operational loss theory of the Lanchester equation using the trade data between the two powers, we simulate the impact of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a trade war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bilateral trade with generally trade surplus countries to suffer the more, and considering the reputation incentive trade war, the trade volume of countries pursuing inclusive and open trade policy decreases and then slowly ri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bined with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f countermeasures on expanding the market, enhancing own strength, perfecting the system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7) A proposal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cyberspace governance system

Zhang Yingqiang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network space management system, this article suggests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national cyberspace strategic layout,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twork power" strategy; actively carry out the "digital diplomacy", have a clear - cut stance to put forward "Chinese multi - stakeholder governance model; 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nhance our country's network space influence; construct the new model of "you have me, I have you" for of Sino US network spatial relationship; establish the technology system of self - control network space and strengthen China's information security; establish new governance system for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to lead a new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new syste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 a unified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t up the "agenda" for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ystem for global cyberspace governance.

(8)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Li Di

In 2015 - 2016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new urbanization,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gradually improved,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leading role of city group for the new urbanization grew. But we should also see the problems accumulated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urbanization such as the non - integr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ity, "people" and "land" contradictions, 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lagging behi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other issues which have not been fundamentally solve and need solving imminently. In 2017, with the gradual release of policies and planning effect,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improve, but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still needs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design, developing city agglomeration economy, constructing intensive city, and promot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9)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Wang Riyue, Xu Chenyang, and Fang Zixian

The 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must be in the form of the city, which is a new form of the city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main function and the core mechanism. Beijing, Shanghai and other central cities still need improving in the creation of innovative space environment. How to address the uncertainties of cities,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the city major infrastructure and city space structure, and creating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 are priorities among priorities to establish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birth, transformation and radiation of innovation need not be completely confined with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city.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 cities, and whether a city is an innovative city depends on the innov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Editor: Huang Yongfu